

南 華 大 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全 球 化 與 後 殖 民 文 化 消 費

-- 以台北雙年展為例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Biennial



研 究 生：王 家 憲

指 導 教 授：吳 金 桃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南華大學
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全球化與後殖民文化消費 — 以台北雙年展為例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Taipei Biennial

研究生：王家憲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吳金桃

張仁厚

何之華

指導教授：吳金桃

所長：陳永昌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致謝詞

幾年下來，每當我為了論文搜索枯腸，咬緊牙關與惡靈苦戰的時刻，我總是想像著，與盼望著寫這些文字的時刻到來，那表示這份論文完成了，我將會置身在解脫的歡愉以及不知道會不會有但是現在已經不在意的成就感中。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有一次期末考前「苦讀」時，當時我衷心想像著，與盼望著考試結束後的解脫與玩樂。後來考試結束了，心情卻似乎未如預期般地「狂喜」，奇怪的是，還多了一些些莫名其妙的失落。不過當時我為了「堅持理念」，對自己負責，我仍然堅持自己以輕鬆愉快的姿態踢著小石子回家，然後立刻吆喝鄰居小朋友跑上屋頂放風箏，我堅持帶著失落感進行著屬於這個階段的快樂「儀式」。

現在的心情有如當年的翻版，明明「解脫」了，卻充滿了失落與感慨？長大後的我終於明白了那些失落感的由來，原來比起考試與論文完成的解脫，一段人生歷程的結束所帶來的失落感，更令人悵然若失。帶著失落，我要告訴這段歷程中一路陪伴的師長與朋友，你們才是我生命中最真實的收穫。感謝陳國寧老師在博物館學領域的用心教導、楊植勝老師溫暖細膩的友誼與令人折服的深厚哲學與美學功力、陳泓易老師在後現代領域的啟蒙與快樂的山海遊蹤、高雅俐老師認真的論文寫作指導、簡瑞榮老師對我的器重以及在文化行政上的教導，還有小賀(瑞麟)老師親切幽默與深入淺出的哲學啟發等。再要感謝亦師亦友的指導教授吳金桃老師三年半來給我的嚴謹敦促與教導，也讓我擁有最大的論文發揮空間。另外，還有兩位口試老師的關心與鼓勵，唐士哲老師在論文初審時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而何乏筆老師在我論文慌亂無頭緒的時候，那幾杯溫熱的好茶與懇切的討論教導，都是我論文得以完成的關鍵。

謝謝歷屆助理曉珊、晏如、作君的協助，以及同學們在生活上與學業上的關心與鼓勵。謝謝柳盤盈老師、一鳳、雅玲、俞安、韻婷、曉琦、俊臣、敏正、美珊、杰芸、達達、鵬揚大哥、**信宏**、珊珊、玉霜、如豐、彥琛、俊賢、佩芸、絹惠、繡芬、岱珍與徐榕，你們珍貴的友誼豐富了我在南華的這段歲月。還有不論我在那裡，不論混得好壞，都一直支持我的好友們，金瓊、阿敬、耀億、叔仔、崇剛、菁菁、博信、文生、綺欣、鵲鳳、緯古、雅玲、惠蜜、張簡、佩雯、恩誠。加上我最最重要的家人們，你們是我所擁有最真實的一切。

多年前從商學院畢業，重考美術系，再到南華美藝所，在這條人跡罕至的道路上迄今，我無從計算起這段過程的得與失，當然也無須再評價這份多年皓首，摻雜著腰酸背痛、胃潰瘍與精神衰弱的粗淺論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我擁有了一段豐富而充滿感激的歲月。

王家憲謹誌 2005/01/06

論文摘要

全球化意識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它並非既定的狀態，而是一種正在發生，且持續建構的過程。本研究嘗試對於各種全球化論述進行結構分析，考察並掌握今日全球化時代的知識圖式，以求進一步辨明今日全球化世界的真實權力面貌。論文發展將從考察全球化知識圖式的方向出發，藉由各種全球文化層面的批判論述，切入觀察全球化與在地文化的爭議，並進一步以台北雙年展的全球化策略作為檢視文本，深入探討全球化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意識。

台北雙年展是台灣當代藝術的代表大展，台北雙年展除了提供台灣藝術界與國際交流的機會，也同時成為台灣在世界當代藝術潮流與全球化文化消費場域的身份象徵。藉由台北雙年展的案例分析，嘗試辨明全球化權力技術下的身份認同政治。

本論文主要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以及文獻探討。第二章「全球化種種以及種種全球化」，整理當代全球化的知識圖式結構，呈現多元論述，說明全球化並非一種可以具體定義與指涉的現象。第三章「全球化下的後殖民與文化帝國主義」，指出後殖民主義在此以一種另類的文化全球化角色呈現。第四章「文化消費與想像的全球化共同體」，說明在全球化文化中，主體認同與共同體意識的辨認重要性。第五章「文化全球化與台北國際雙年展」以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策略」為例，說明在全球化浪潮下，台灣如何運用當代藝術與全球潮流的連結想像，以國際化文化消費策略運用，來建構與想像自己的身份認同。第六章「結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權力技術」，藉由前述理論與台北雙年展的舉例相輔，描述出一種屬於全球化時代的新權力技術。

【關鍵字】全球化(Globalization)、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認同(Identity)、文化消費(Cultural Consumption)、台北雙年展(Taipei Biennial)

目 錄

論文摘要.....	
目錄.....	
表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整理與回顧.....	3
一、全球化論述.....	4
二、批判論述、認同理論與文化消費.....	9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8
一、全球化文化部分.....	18
二、台北雙年展部分.....	19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預期成果.....	20

第二章 全球化種種以及種種全球化	22
第一節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貫徹	23
第二節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終結- - 內政界線的模糊與再定義	27
第三節 全球化是一種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	31
第四節 全球化是現代性/現代化全球擴散的代名詞	34
第五節 全球化作為一種先驗性的實踐	36
第六節 全球化是一種全球觀點/解疆域化的全球化	38
第七節 全球化是時間、空間關係的根本性變革	41
第八節 結語	44
第三章 全球化下的後殖民與文化帝國主義	45
第一節 全球化與全球現代化批判	47
第二節 全球化等於美國化/世界的麥當勞化	49
第三節 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	52
第四節 殖民主義的轉變	54
第五節 東方主義的啟示	55
第六節 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權力論述	57
第七節 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批判	60
第八節 結語	62

第四章 文化消費與全球化共同體.....	64
第一節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65
第二節 文化消費與身份認同.....	67
一、消費簡史.....	67
二、文化消費與認同.....	69
三、文化消費與布迪厄的資本場域理論.....	71
四、文化消費轉化為「社會身份」的資本.....	73
第三節 身份認同與全球化想像的共同體.....	75
第四節 文化消費形塑全球共同體.....	76
第五節 全球化文化工業與單向度的人.....	79
第六節 結語.....	82
第五章 文化全球化與台北國際雙年展.....	83
第一節 「雙年展」與「台北國際雙年展」.....	85
一、初試啼聲的「國際化」- - 第一(1992)、二屆(1994)台北雙年展.....	85
二、高舉主體意識的論述場域- - 1996「台灣藝術主體性」.....	87
三、以知名國外策展人突圍的策略- - 立足亞洲 放眼國際的 1998「欲望場域」.....	89
四、台外雙策展人首例- - 國際對話的 2000「無法無天」.....	92
五、雙策展人模式與參與世界- - 宣告全球化的 2002「世界劇場」.....	94
六、雙策展人模式與現實- - 強勢西方的獨角戲: 2004「在乎現實嗎?」.....	96

第二節 全球化身份認同策略/策展人與國際化.....	98
一、「跨界」、「交流」、「對話」、「融合」- - 策展人的角色象徵.....	98
二、「台外雙策展人」的形式策略與文化主體性.....	100
第三節 結語.....	106
第六章 結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權力技術.....	108
一、「同觀樓」的誘惑.....	108
二、「他者」身份卸除？.....	110
三、自我奇觀化的新後殖民樣態.....	113
參考書目.....	117

表 目 錄

表 2-1 數種廣受討論的全球化開始年代.....	31
表 2-2 福特主義與彈性生產模式的比較.....	43
表 3-1 十九世紀傳播主義者的世界觀.....	53
表 4-1 不同時期的身份認同建構模式.....	7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眾說紛紜的全球化一詞愈來愈廣泛運用，使用的過程不斷地解構、再現，以至於涵蘊與深度愈來愈淺層與片面；生活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全球化一詞朗朗上口，但又人人莫衷一是；全球化的未來有時被描述成有如上帝的應許之地，有時又聽聞言之鑿鑿曰洪水猛獸。全球化究竟是什麼？全球化一詞能否承載、描述歷史上的當代？或者只是個時髦的流行語，用來妝點令人無可奈何的資本主義天堂？身處甫邁入現代化的台灣，在一片政治正確的全球化樂音聲中，總覺得有些疑慮，是應該加以釐清的。

今日的世界，一片歌詠全球化的聲浪中，卻又看到世界紛爭、衝突不斷。全球化帶來的，除了全球經濟體系、全球市場榮景的許諾之外，全球化也帶給世界新的衝擊與失落。關於全球化而起的爭議，除了經濟、政治利益的分配外，有更多人的危機感來自於傳統文化、地方文化的快速消蝕。許多憂心忡忡的言論告誡著世人，人類將進入乏味的單一文化消費裡！文化究竟是全球趨同，成為麥當勞化的世界？還是這種觀察太以偏概全，言過其實了？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顯然是一種認同的對立。一般而言，許多反全球化的行動被定義成對抗強勢與霸權，被賦有某種程度上的道德解讀；另外，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把反全球化的人士視為利益結構改變後的失敗者，或某種宗教、生態等的狂熱份子等。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這兩者爭議是否真有焦點，還是只是各說各話？

後殖民主義是否能帶給全球化/反全球化更深刻的啟示？從人類歷史來看，世界上從來不缺乏野心的掠奪者。當全球化乘資本主義浪潮漫沒全球，在一片歷史終結的欣喜聲中，文明衝突的血腥卻同時濺灑開來。這些現象並非偶然，它正試

圖推翻資本主義的大敘事，用自己的方式寫往後的足跡。這不禁使人質疑，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真的結束了嗎？會不會他們換上了令人難以辨識的面具，一如馬克思所言的幽靈一般，正瀾漫遊蕩在全球？

全球化是否真正是歷史命定的前路？全球化的另一種批判，是這套機制存在著主導者，其身份與角色並不超然，是為自己價值與利益在進行操作的參賽者。以馬庫塞「單向度的人」與阿多諾「文化工業」這兩個論述借鏡，進行對發達工業社會，或說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分別探討世界文化與藝術趨同的成因與後果。

今日的消費者，進行的是一種社會活動；藉由文化消費，消費者得以標誌出自己的「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Robert Bocoock 著的《消費》一書指出，文化消費的模式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過程。¹藉由這些模式，一個身份團體可以在自己和社會中持有相同文化價值的其他人面前，定義他們的成員、維持他們的身份榮耀以及社會與文化自尊。在全球化裡的台灣，是否正是一如以名牌消費來確認身份的人，對於全球化的一切毫無選擇地汲汲企求？

台灣在今日全球化景況中，究竟是圓桌會議的一員，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在全球化文化藝術的浪潮裡，台灣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身份與處境的？從台北雙年展的諸多國際化/全球化策略為例來看，顯然對自己相當缺乏自信，所以一再墨守幾項國際化「形式」以為策略，企圖以這些「形式」建立自己在全局化藝術文化場域中的身份認同信心。在今日全球化當代藝術文化場域中，台灣究竟處在何種境地？在這個全球化的想像共同體裡頭，台灣如何想像與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台灣文化藝術如何反思自身的主體性？

班納迪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印刷 資本主義」的例子說明民族概念的成形，源自於一種陌生而又親密的群體想像。²在此啟發下，筆者認為，

¹ 見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玖等譯，《消費》(Consumption)，台北：巨流，1995。

² 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2000。

全球化正是一種持續建構中的「想像共同體」，全球化一詞是存在於當代特定知識權力結構下的產物，各式各樣的「全球化」，透露出背後特定知識、技術、利益與價值系統的立場。在各種全球化文化現象的爭論中，後殖民論述與文化帝國主義提供了「文化殖民」(Cultural Colonialism)的警訊，也帶出了弱勢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意識。薩伊德(Edward W. Said)說：「賦予東方的『可理解性』和身份認同的，不是東方自己努力的結果，而是被西方以豐富知識體系所操縱下，得到的身份認同。」³今日文化消費形塑出的全球化想像共同體，似乎已成為如台灣等許多國家身份認同的投射標的，隱然形成一種新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權力技術」。本論文將以此問題意識為發展核心，藉由整理及分析各式各樣全球化論述，考察其中種種特定權力結構面向，漸次深入探討身處在「全球化」文化霸權語言下，台灣身份認同的困境與盲點。

第二節 文獻整理與回顧

本研究所採取的角度，是藉由觀察各式各樣詮釋全球化的觀點，以及探討如後殖民主義等批判議題，輔以台北雙年展為例，切入對於台灣身份認同問題的分析研究。因此，主要取材的對象，鎖定在相關的全球化、後殖民主義與文化消費與認同相關文獻上。為求得今日世界知識圖式的解析，⁴本論文主要資料來源為大量的論述文獻；因為這些如學術界、藝術界，以及媒體等的發言，正是構築今日世界合理性與正當性的核心，因此若要解析今日知識權力論述的面貌，必須要從這些聲音最響亮的主流論述內部邏輯開始著手。

因為如此，為了呈現這個知識權力的真實面貌，這些資料與論述在論文進行過程中多所引用；避免援引文獻過程有斷章取義之疑，所以在論文進行之前，文獻資料的整理與探討，將佔有較多的份量，以作為論文正文進行的準據。

³ 愛德華 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台北：立緒，1999，頁 56。

⁴ 傅柯的「知識圖式」概念原法文用語為“épistémè”。

在資料選擇與來源方向，主要因應論文發展架構，範圍如下：

第二章：當代全球化的知識圖式結構整理，主要資料以近十年全球化相關重要著作與論文為主。

第三章：後殖民主義在此以一種另類的全球化角色呈現，主要資料以薩伊德相關重要著作與後殖民主義相關著作與論文為主。

第四章：主要整理認同理論與文化消費的評述。

第五章：以台北雙年展為例，主要資料為報紙、雜誌相關新聞報導，以及美術館相關出版品與相關論文為主。目的主要是藉由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整理，呈現出台灣社會對於當代藝術與全球潮流的連結想像，以及期待台北雙年展的文化消費任務運用。

其中由於第五章以台北雙年展為例的部份，是以實例的角色佐證論文的論述，因此相關的資料與報導，將直接在該章呈現，在本節文獻探討中不再贅述。

在文獻探討部分，將分成二個部分，配合論文的二個主軸進行。分別為：全球化部分，以及批判論述、認同理論與文化消費部分。

一、全球化論述

全球化的觸角之廣，幾乎可說是各形各色的領域都看得到全球化的身影。全球化的論戰風潮究竟啟於何時何地？目前尚不可考。不過，這並不重要；因為全球化一詞主要是被用來描述或指涉某些特定現象的用語，而並非一種新的律則或具體的協議規範。全球化的面向之廣泛與模糊，使得每每當研究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就能再掀起不同觀點的爭議與辯論。以全球化概念的源頭來說，許多學者、專家常會以蘇聯解體、東、西德合併等現象，作為全球化現象的起源。這個角度的全球化起始論，直接指涉的是人為障礙的去除，亦即昔日第一/第二世界、自由民主/共產集權等的人為壁壘，已經不復存在，自此全球得以自由流動。這個觀點為例，將全球化起始的座標標定在蘇聯解體等事件上，其間接指涉的全球化意涵，就成為全球化即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全球流通、或者再加上西方民主代

議政治的即將全球流通。

每一種試圖找尋全球化起點的論述，都隱含著一種特定的歷史觀。今日也有許多關於全球化的論述裡，將全球化概念的源頭指向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想像。在這種歷史觀中，全球化起源的追溯，隱約地將全球化意涵指向了某種技術決定論的關鍵中。

以全球化起源的討論與爭議為例，是為了說明，在觸及全球化議題時，尋求單一定義的複雜與困難，甚至於會因此而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為了解決這個困擾，除了放棄以外，還有一個較另類的切入途徑，就是改為探詢各種全球化論述的觀點，以各種論述的切入觀點的剖析，進行對於全球化論述的深入把握。因此，對於全球化議題的相關文獻，也將以「理解觀點先於定義」的切入方式，進行分析與探討。

在全球化相關議題的文獻資料上，主要來源有：一、各式各樣媒體相關的報導；二、與全球化相關的博碩士論文與學者專家的專業論文；三、與全球化相關的出版書籍。這三種類型的文獻資料，在本論文中主要以全球化的相關出版書籍為主，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針對第一類的媒體相關報導來看。這一類媒體的全球化相關報導，從某種角度來看，本身就是一種極佳的「全球化現象」，適合被當成全球化現象的特定研究文本；但在本論文的研究取向上，並非針對「媒體」的全球化現象；且這類媒體報導深度與廣度參差不齊，絕大多數片面且零碎，並不適合用以作為學術研究的嚴肅文獻資料，所以本論文未採用這類文獻資料。再者，第二類「與全球化相關的博碩士論文與學者專家的專業論文」一類，拜全球化議題在台灣的風行所賜，許多相關文獻在近十年來被以專書的形式在台大量出版，加上多數全球化相關論文，都是屬於特定學門領域所發表的，例如經濟、政治等，專門探討藝術文化的論文不多，反而是在以專書形式出版的學術作品裡，面向的考量較為多元。因此，在第三類的「與全球化相關的出版書籍」中，應已涵蓋了相當程度的第二類文獻。

對於相關的文獻資料，首先是廣泛地觀察與分析，以掌握現今全球化的論述

裡，各式各樣不同的出發點與論述角度。這裡所參考與引用的文獻，主要可以概略區分為：全球化論述的正面支持者、視全球化現象為歷史過程者、以及反對全球化論述者等三種。

首先對於全球化景況描述最正面，以及對全球化未來預期最為樂觀的論述中，最突出而廣受討論的代表，首推福山(Francis Fukuyama)與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論述與揭示的，認為自由民主主義將是全球人類歷史命定的終站。⁵福山以三個角度的觀察來支持他的歷史終結說：一、消費文化的全球擴散，使得各種文化衝突與價值差異，為之縮減；二、自由民主的全球擴散，使得各國差異與衝突縮減，更不易發生戰爭；三、全球市場的擴散，使得各國彼此更加相互依賴，加以生活水準的提高，能減少彼此的衝突意願。福山認為，全球化是一股引發國際關係重大變革的歷史力量，為人類歷史終極的和平與繁榮奠下基礎。大前研一在《民族國家的終結》一書，則是以其一貫的「無國界的世界」論點，樂觀地宣告了民族國家的終結。⁶大前研一在書中主要是以四個「I」(投資、產業、資訊技術、個別消費者等)、四種觀察角度來說明國界的作用正在消失，進而以民族國家的終結來預言一個世界大同的全球化榮景。⁷儘管大前研一在書中直言反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說」，認為歷史沒有終結(指的是意識形態的衝突)，而是進入了新的、全球經濟的時代。但這種論述中的小歧異，並不影響其論述同被視為是全球化的樂觀支持者。

再者，視全球化現象為歷史過程者，且將過程中種種變因與質素有系統地分析與預判者，主要有安東尼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 Beck)等。紀登斯的許多著作，如《第三條路》《第三條路及其批評》《超越左派右派》《失控的世界》等，⁸是一系列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審度全球化影響的文章。其基本的

⁵ 法蘭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台北：時報，1993。

⁶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台北：立緒，1996。

⁷ 四個「I」指的是：投資(Investment)、產業(Industry)、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個別消費者(Individual Consumers)。

⁸ 安東尼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The Third Way:

特色是：試圖找出在全球化影響下的衝突點加以分析調合，而非採取特定觀點的戰鬥位置。同時，與其它論者較不同的，是紀登斯關切歐洲社會體系的變化，顯然是其全球化論述發展的源頭與核心。貝克在《全球化危機》一書中，即以「第二次現代」(second modernity)形容當今的世代，在書中，貝克主要闡述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解中心化的性質，認為社會等同於國家這種觀念將不復存在，跨國社會空間紛紛形成，人們不論在實際或抽象的空間，都不再受限於疆界。⁹全球化導致民族國家的式微，然而地方卻在無疆界的時代再度興起。全球化與地方化同時發生，全球地方化的結果，不是全球文化的大一統，而是文化多元化與全球流行文化同時發展與並存。歷史過程論者如紀登斯、貝克等，亦可以概略地視全球化為「合理」的現代性發展趨勢，認為全球化是現代性在「反省」、「修正」、「揚昇」(sublimate)等「基進」(radical)地發展歷程過後，出現的某種新形態人類社會活動，因此廣義地來講，「後現代」仍然是現代化的發展，而全球化則是這個發展下的典型樣態。因此，在紀登斯與貝克等學者的觀點裡，他們接受這一切的到來，並認為這一切均有孕育其合理性的時空土壤，他們並非熱切的支持者與運動者，但認為全球化勢所必然，而不站在挑戰或反對的一方。

最後，是全球化的批判及反對者。反對的立場主要有兩種面向，一是反對正面全球化論述；二是直接批判與反對全球化現象。在第一種反對中，反對的對象正是樂觀預言者如福山、大前研一等人的論述，在許多與全球化相關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湯普森(G. Thompson)、赫斯特(P. Hirst)以及韋斯(L. Weiss)等人。其以對今日全球貿易流通現象，提出迥異於樂觀支持者的看法，質疑全球化的事實存在，並將其形容成是一種全球主義的誇大與錯誤。¹⁰全球化的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台北：聯經，1999；許家豪譯，《第三條路及其批評》(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台北：聯經，2002；李惠斌，楊雪冬譯，《超越左派右派：激進政治的未來》(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台北：聯經，2000；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台北：時報文化，2001。

⁹ 貝克(Ulrich Beck)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Was ist globalisierung), 台北：台灣商務，1999。

¹⁰ 湯普森(G. Thompson)、赫斯特(P. Hirst)著，朱道凱譯，《全球性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台北：群學，2002。

批判及反對者認為，今日的全球化現象實際上僅是國際化，在種種如貿易規模與總量的觀察下，並不足以支撐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描述。再者，許多批評認為全球主義者宣稱的民族國家與歷史終結，不但誇大，而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即批評福山為了宣揚歷史終結論，「一會兒把自由民主定義為一種實際的現實，一會兒把自由民主定義為一個單純的理想，這個事件一會兒是實現了的，一會兒是實現的先奏。」¹¹至於另一種反對者，則是跳脫他人論述的陰影，直接批判今日的全球化現象，進而提出反面的全球化描述。一般較為人知的是將全球化描述成世界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如喬治 瑞澤(George Ritzer)的《社會的麥當勞化》一書，其以韋伯的理性化理論來檢視社會，乃至於全球科層化的過度延伸，並表示，「希望藉由本書提供讀者新的觀點來觀察這個他們正在建構的世界。」¹²另外，更有進一步以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史觀為本，批判全球化的虛偽平等與榮景的，如 Jeremy Seabrook 的《階級》、Mary Kaldor 的《新戰爭》，以及麥可 哈德(Michael Hardt)、安東尼奧 納格利(Antonio Negri)的《帝國》等。¹³加以許多後殖民相關論述，全球化在許多反對者筆下，是一種新階級的定位，是一種新權利、利益的壯大與鞏固，更是一種更強大更全面的宰制。如此一來，全球化不但難以實現世界大同，反倒更孕育了許多未知的衝突因子。

藉由對於種種全球化論述的整理與瞭解，接著將進一步進入到文化與全球化現象的探討。在這個探討的角度裡，主要分為認同文化全球化與提出質疑批判者兩種。在這個對於全球化議題的延伸探討中，發現到討論的核心已經跨越支持或反對的爭議，進入了另一種層次的認同論辯裡；亦即，文化的全球化現象存在與

¹¹ 雅克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評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全球化時代與馬克思主義》，台北：創世文化，2001，頁 131-143。

¹² 喬治 瑞澤(George Ritzer) 著，林祐聖、葉欣怡譯，《社會的麥當勞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台北：弘智，2001。

¹³ Jeremy Seabrook 著，譚天譯，《階級》(Class, Caste and Hierarchies)，台北：書林，2002；Mary Kaldor 著，陳世欽譯，《新戰爭：全球性的組織化暴力》(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台北：聯經，2002；麥可 哈德(Michael Hardt)、安東尼奧 納格利(Antonio Negri) 著，韋本、李尚遠譯，《帝國》(Empire)，台北：商周，2002。

否，以及全球化一詞是不是恰當的用語等問題，僅僅是程度上的問題，似乎不再是爭議的重點，文化全球化的論辯焦點，出現在對於現象的觀察與對未來的預期，所抱持樂觀或悲觀的態度。

二、批判論述、認同理論與文化消費

在文化全球化的部分，許多文獻的探討，除了直接觀察現象之外，認同的意識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文化全球化的現象，並不像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等的全球化論述較具體，必要時可以在許多量化的證據上找到支撐。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同樣的一種現象，出現兩極截然不同的看法，對於這個問題，顯然可以觀察出，論述者在論述之初即抱持了互異的文化認同觀點。在本段中的文獻資料，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各種文化全球化的論述(傾向正面、直述的，不包含批判的)、批判的文化全球化的論述，以及認同理論。

首先，是各種文化全球化的論述(傾向正面、直述的，不包含批判的)，主要有尚-皮耶 瓦尼耶著《文化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John Tomlinson 著《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Thomas L. Friedman 著《了解全球化》、杭亭頓的《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為什麼文化很重要》等書。¹⁴

在尚-皮耶 瓦尼耶著《文化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 敘述的層面裡，文化全球化一詞意味著「文化產品」在全球層面中的流通。本書的特色是運用大量實例的觀察，闡釋了相關文化物品在全球市場的運作模式、背景，以及其衝擊的關鍵。瓦尼耶認為，從種種文化全球化的現象的衝擊看來，相當程度

¹⁴ 尚-皮耶 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著，吳錫德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麥田，2003; John Tomlinson 著，鄭榮元，陳慧慈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2003;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Olive Tree)，台北：聯經，2002;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柏格(Peter L. Berger)著，王柏鴻譯，《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台北：時報文化，2002; 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北：聯經，2001; 哈瑞森(L. E. Harrison)、杭亭頓著，李振昌，林慈淑譯，《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al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台北：聯經，2003。

導致了傳統文化的快速消蝕。作者雖不認為，文化全球化必然導致美國化，確也明白指出，當前的文化全球化「只是美、歐、亞洲三角地帶，受其所屬國家鼓勵的私人產業霸權式支配下的一種大型文化交融現象。」¹⁵而在 John Tomlinson 著《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中，雖然中文譯名與尚-皮耶 瓦尼耶著(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同名為《文化全球化》，但 Tomlinson 的著作內容與尚-皮耶 瓦尼耶不同之處，他不只探討文化全球化的議題，是採取全球化與文化議題探討兼備，針對全球化深入分析，至於文化則被視為是全球化面向的一種。¹⁶作者從「文化與全球化息息相關」以及「全球化與文化息息相關」雙向的交互論述，突破主客從屬的框架限制，進行對於全球化與文化的種種觀點解析。書中並以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角度，樂觀地預期全球文化包容、接納的多元前景。另外，《了解全球化》一書從大量的商業現象著手處理，較之前兩本書，《了解全球化》明顯偏向重視大眾商業文化的現象探討。一如原著書名(The Lexus and Olive Tree)所示，本書著重探討資本主義全球化(以 Lexus 為例)與國族主義(Olive Tree 為象徵)的衝突與衝擊。本書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看法較為正面，並批評諸多與國族主義情緒相連的反全球化現象，是少數直言今日全球化等同於美國化等同於經濟效益與效率的著作。本書並取材許多亞洲，特別是台灣的現象，其中包括社會、經濟，甚至於是政治面向等，是本書另一特別的價值所在。

在探討文化與全球化的範圍內，有一個重要的觀察面向，就是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說」。杭亭頓在 1993 年即提出，文明的衝突將是主宰未來世界的關鍵因素，並進而說明，為了避免戰爭，未來的新國際秩序必須建基在不同的文明之上。在近年來世界歷經波斯灣戰爭、911 等重大事件後，杭亭頓的觀察與預言更受到高度重視。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核心論點即是「文明衝突

¹⁵ 尚-皮耶 瓦尼耶著，吳錫德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麥田，2003，頁 92。

¹⁶ John Tomlinson 的《文化全球化》為 2003 年 1 月新印更名版本，之前韋伯曾出版過此書，中譯名稱為《全球化與文化》，前後版本內容並無任何更動。

說」，杭亭頓並提出全球政治將依文化重組的觀察；《為什麼文化很重要》一書是多位學者針對文化與全球化議題所發表的論文合集；《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一書則是集合十個國家的學者，分為四個主題、十個地區進行研究。書中提出一個特別的概念，即將全球化視為是個「複數名詞」，並以此作為開放的全球化研究平台。其中關於台灣的研究，是由蕭新煌教授所進行的「當代台灣的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

接著在批判的文化全球化的論述中，主要是由「後殖民主義論述」、「認同理論」及「消費理論」與「文化消費」等部分構成。

首先，後殖民主義論述方面，主要參考文獻有：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¹⁷以及 Valerie Kennedy 著《認識薩伊德》、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李有成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李英明著《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布勞特(J. M. Blaut)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Schech and Haggis 著《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等。¹⁸這些著作幾乎全是以東方主義為核心概念出發，進行後殖民主義論述引介的專書。

《東方主義》全書由一篇緒論與三大章構成。藉由檢視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正典，從文本中論證出西方習於人造(man-made)的東方主義。薩伊德認為這些基本假設都是西方先入為主的知識價值二分法，「東方完全是被西方的霸權用控制性的架構(dominating frameworks)所涵蓋和再現。」¹⁹(關於《東方主義》一書相關內容，另詳見本論文第三章。)在《東方主義》的概念發展裡，薩伊德開宗明義表示，《東方主義》一書的論述與方法論受益於傅科(Michel

¹⁷ 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台北：立緒，2000。

¹⁸ Valerie Kennedy 著，丘彥彬譯，《認識薩伊德》(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台北：麥田，2003；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7；李英明著，《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布勞特(J. M. Blaut)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Schech and Haggis 著，沈台訓譯，《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台北：巨流，2003。

¹⁹ 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頁 56。

Foucault) 的知識 權力論述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 說甚多，而且因為不同於以往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主要側重在指出西方文化層面的支配宰制，因此幾乎所有與後殖民主義相關書籍，也都對於傅科與葛蘭西相關論述有所著墨，所以在此有必要概要說明。²⁰

在取用傅科與葛蘭西的方法論上，薩伊德說明：「簡而言之，東方主義便是為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在此，我覺得引用傅科在《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的『論述』概念，將會有助於認清東方主義。」²¹而在葛蘭西的部分，薩伊德則運用了其所提出的一組分析性區分概念：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在任何一個非極權社會中，某些文化形式一定會壓過並支配其他的文化形式，就如同某些想法會比其他的理念更具有影響力一般，而這種文化上的領導統御(cultural leadership)便是葛蘭西所言的霸權，一個欲了解當今工業化的西方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概念。我現在所談到的東方主義之所以可以如此持久且強勢，便是由於霸權，或者說是文化霸權所造成的結果。」²²

其他相關後殖民主義著作裡，陶東風的《後殖民主義》一書提供了清晰的後殖民主義樣貌，包含詳盡的歷史來由以及相關的哲學背景論證。李英明著《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一書，明顯地將全球與地區的相對討論，設定在全球與中國的對照中；但其中的中國一語，既非政治上的中國，亦不知是否極廣義地包括台灣等的華人世界。或許可以為其設想，書中所擬作的是屬於文化上的象徵中國。但對於這部分的安排，令人有太概略、不夠深入之慨。後殖民主義相關著作中比較特別的是 Valerie Kennedy 所著《認識薩伊德》一書；正如其書名的副標題——

²⁰ 此部分主要參考書目為：傅科著(Michel Foucault)，劉北城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台北：桂冠，2003；劉北城等譯，《瘋顛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台北：桂冠，1992；于奇智著，《傅科》，台北：東大，1999；J. G. Merquior 著，陳瑞麟譯，《傅柯》(Foucault)，台北：桂冠，1998；James Joll 著，石智青譯，《葛蘭西》(Gramsci)，台北：桂冠，1994。

²¹ 薩伊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頁4。

²² 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頁9。關於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政治社會這組概念，市民社會指的是一種像學校、家庭和工會等自願性的親近結合，而政治社會則是指國家體制如軍隊、警察、中央官僚機構等，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是一種直接的宰制。

個批判的導論(a Critical Introduction)所示，書中不但詳細整理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等重要著作與論述，檢視薩伊德對於後殖民主義的主要貢獻，更加入了許多作者對於薩伊德的批評與見解，例如作者認為《東方主義》「這本書全然陽剛的架構、對階級與性別因素的同步忽視，以及把傅柯、葛蘭西與人文主義硬兜在一塊」等。²³透過這些批評見解，反而對於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能有更準確的掌握。另外，布勞特(J. M. Blaut)著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一書，雖然並不是直接講述後殖民主義的專書，但是其以歐洲十八、十九世紀文化傳播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為切入，介紹殖民主義的歷史與進程，對於研究後殖民主義一題，提供了可貴的歷史縱深面向。

麥克 哈德與安東尼奧 納格利合著的《帝國》一書，是一部對於帝國主義與全球化有著深入探討的著作。但不同於其他相關著作的是，兩位作者分別為哲學學者與文學學者，在學科分際日漸細膩的今日，這卻是本企圖包含經濟、政治或社會層面總成的著作。本著作招徠許多不同的解讀與評價，其中最特別的歧見，竟是出在各方對於《帝國》一書的企圖與用意，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批評者如南方朔認為：「《帝國》一書在它的深層問題意識上，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替美國所建構的『全球化』，做著合理化工作。」²⁴相反地，陳光興的評論則認為：「如果把《帝國》當成是作者要擁抱的新世界或是為美國帝國主義脫罪，那是完全的誤讀，帝國是作者的分析對象，論證過程中很清晰的保持了批判距離，他們企圖透過對於帝國運轉複雜原則的掌握，從帝國的內在邏輯裡找尋新的革命主體。」²⁵整體來講，《帝國》一書的大意大致上是指，二次大戰後的殖民政權衰微，加以 1980 年代後期冷戰結構的鬆動，使得資本主義與生產全球化直速前行，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出現，這個新世界結構的政治主體形式就是帝國。帝國形成的軌

²³ 丘彥彬譯，《認識薩伊德》，台北：麥田，2003，頁 46。

²⁴ 南方朔，讓樂觀的實踐從此開始，《帝國》，台北：商周，2002，頁 14。

²⁵ 陳光興，《帝國》與去帝國化問題，《帝國》，台北：商周，2002，頁 24。

跡是延著歐美現代性的內在張力來進行，透過殖民帝國主義及資本全球化的歷史運動，將屬於不同時空的地理區域吸納、統合到同一時空當中。

一如杭亭頓所言，在新的全球政治中，文化與文明，是決定衝突或和平與否的關鍵。後殖民主義的論述，也從文學文本的探討與線索中，擴展到成為在新的全球化語境下，民族主義、文化全球化，乃至個人身分與認同的批判論述。後殖民論述的啟示，提供了另一種角度，讓人們面對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時，能進行批判性的、抽離現實利害關係的思考。

「認同理論」的部分，主要文獻資料有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John Story《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以及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等。²⁶以上文獻雖然領域不盡相同，但都是從「認同理論」為核心，探討各種身份認同與主體性認知建構等問題。在安德森的論述中，以「想像的共同體」一詞，說明了民族是一種建構。民族主義與民族意識的形構過程，真正關鍵的，是在於從「想像」到「認同」的這個概念。各式各樣的共同體形態，並不純然都有具體的制約力量，最具體的群體如國家等，這個體系可以用武力、行政體制等劃歸出領域及範圍，讓人清楚地辨識出自身的從屬。但其中真正聯結共同體的關鍵力量，往往是一種「既陌生又非常親密」的群體想像。以及對於共同價值的認同。這對於本論文研究全球化的過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啟示與反省的作用。另外，在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一書中，雖然主題範圍是台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問題，但對於「認同理論」的普遍性概念，也提供了相當清晰的介紹。

「認同理論」在 John Story《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一書中，是跨接「消費」到「文化消費」的論述核心。John Story 以專章 文化消費、後現代與認同，詳細地將西方歷史上「消費」與「認同」的論述發展面貌整理分析，並說明在後現代的情境裡，「文化消費」與「身份認同」交互作用下，「自我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²⁶ 班納迪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2000；John Story 著，張君攻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台北：巨流，2001；王甫昌著，《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一種「演出的自我」；自我身份的認同無法單一完整，必須不斷地藉由「文化消費」，在多元的文化中進行建構。

在文化消費理論的部分，嘗試藉由透過消費與認同的概念辯證，切入探討在今日全球化強權邏輯下，進一步發展到，處理台灣的主體意識與身份認同的問題。今日的消費者，進行的是一種社會活動；藉由文化消費，消費者得以標誌出自己的社會身份。Robert Bocock 著的《消費》一書指出，消費的模式是一種認同的過程。藉由這些模式，一個身份團體可以在自己和社會中持有相同文化價值的其他人面前，定義他們的成員、維持他們的身份榮耀以及社會與文化自尊。²⁷而 John Story 著的《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一書，則是由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探討近年來有關後現代主義、消費和認同的理論。作者運用葛蘭西學派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消費研究，論據說明：文化消費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之一。透過這些活動，訴說了我們是怎樣的人，或者我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作者直言，對大多數人來說，消費就是文化的實踐。

其他重要全球化文化現象批判文獻，包括：葉維廉著 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²⁸、Naomi Klein 著的《NO LOGO》、《破窗》兩書²⁹、Toby Miller 著的《全球好萊塢》³⁰、Chris Jenks 著《文化》³¹、葉啟政著《社會學與本土化》³²、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³³、陳光興主編《文化研究在台灣》

²⁷ Robert Boc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Consumption)，台北：巨流，1995。關於「社會身份」、「身份團體」等用語，應是源自於韋伯的「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地位團體」(Status Group)等概念。韋伯在發展與運用“Status”一詞概念時，所指涉的範圍應是較為客觀具體的，近似於中文的「地位」一詞。而在本論文所參考的相關著作中，絕大多數都將“Status”一詞翻譯為「身份」，可能是此一詞語在後來漸漸被運用在更廣泛與相對的領域，所以如此運用。為了避免論文語意前後紊亂，本論文在接下來的內容中，一律配合引用文獻的中譯用語，並將「社會身份」、「身份團體」等詞語，視為是較廣義的形容用語運用。

²⁸ 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 《當代》，1990，52期，頁40-60。

²⁹ Naomi Klein 著，徐詩思譯，《NO LOGO》(No Logo)，台北：時報，2003；林淑媛譯，《破窗》(Fences and Windows)，台北：時報，2004。

³⁰ Toby Miller 著，馮建三譯，《全球好萊塢》(Global Hollywood)，台北：巨流，2003。

³¹ Chris Jenks 著，俞智敏等譯，《文化》(Culture)，台北：巨流，1998。

³² 葉啟政著，《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2001。

³³ 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

³⁴，以及馬庫塞(Herbert Marcuse)著《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³⁵等。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研究方式有二：分別為文獻探討與相關論述結構分析，以及對於例證對象「台北雙年展」歷屆以來的實際觀察。

論文研究發展結構為：先從廣泛的全球化論述著手，循序由後殖民主義、認同理論與文化消費等批判意識，分析出今日全球化同一與單向的文化消費進程；繼之以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全球化策略為例，檢視先前所發展的全球化文化消費理論。

本論文主題為全球化的知識圖式權力結構探討，主要考察角度是針對今日主流知識論述的分析，以辨明今日世界，新的全球化權力技術樣貌。論文發展中採用大量引文的理由，是為了要展現學術界、藝術界與媒體輿論界所建構的知識結構，突顯主流論述者，他們如何結構化今日全球化知識/權力圖式，引致今日的全球化權力技術面貌。知識圖式概念，是傅科 1970 年在《The Order of Things》一書中所提出。此詞語「指涉某個歷史時期，或是比較狹隘的知識年代，以及作為該年代之特徵，並賦予該年代系統性的流行認識論(認識方式)和判準。」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知識結構，並以此「支撐」起各式各樣的學科與論述。而重要的是，這些學科與論述所共享的特定知識結構，主宰了什麼才能算是知識或真理。³⁶因此由探究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結構為本，才得以嘗試解析各種全球化論述中的權力面貌。

³⁴ 陳光興主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2000。

³⁵ 赫伯特 馬庫塞(Herbert Marcuse)著，劉 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台北：桂冠，1990。

³⁶ 參見 Peter Brooker 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辭彙》(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台北：巨流，2003，頁 133-134。

在探討與理解全球化的部分，主要是將全球化視為(種種)現象，是一種受分析的客體。這裡所謂的「現象」有兩個重要層面；一是直接觀察與分析探討全球化現象；再是將種種全球化相關論述亦視為現象，加以分析與探討。在此研究方法中之所以標明將全球化以現象視之，是因為許多全球化的論述，往往因為背後有特定的想像投射對象，使得全球化在各式各樣論述中顯得形形色色，尤有甚者，許多全球化的詞語運用往往透露出背後特定知識、技術、利益與價值立場，是存在於特定知識權力結構下的產物。因此，本研究將種種全球化與論述均視為是考察對象，藉由整理及分析各式各樣全球化論述，考察其中種種特定權力結構面向，漸次深入探討台灣身份認同的困境與盲點。

其次，在論文中重要的研究個案「台北雙年展」，採取的研究方式為大量相關報導與論述閱讀整理，以及筆者自 1988 年以來歷屆的親自觀察。在論文中，「台北雙年展」是作為台灣追求文化藝術全球化身份認同的佐例，主要考察的面向是「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全球化運作「策略」，並非「台北雙年展」的審美論述，是從文化社會學與文化政治學的批判方式觀察。「批判」是為了揭露事物背後的基本假設，是為了找出權力技術的支撐架構。藉由「台北雙年展」運作「策略」的分析，本論文試圖揭示台灣身份認同被世界「新權力技術」控制的面貌。

在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論裡指出，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必須將社會現象視為一種雖然實際發生在我身上，但必須要將其超然視之，同時觀察受作用的個體，更必須觀察社會背景與環境，並將其視為是我們身外的一個「客觀的」(objective)行動。涂爾幹認為，所謂的以社會現象視之，是因為社會現象這個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即社會現象，「他是一種存在於個人身體以外的『行為』、『思想』和『感覺』，因一種強制力而施行於個人的。他並不同於『有機體』的現象，因為『有機體』的現象，其所存在的，只是一些『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動作』；他也不同於『心理』的現象，因為心理的現象，只存在於個人的軀體內，或因個人的軀體而存在的。他是一種新的性質，只有這『社會的』(sociaux)一個名詞，

可以概括他的大意。」³⁷在此將全球化論題視為是一現象，乃至於是一社會現象加以考察，必須將各方全球化論述視為現象加以探討，繼而深入探討各方全球化論述的出發點(觀點)，也就是深究各種全球化論述，是將全球化視為何物、以及如何假定其環境脈絡等，都是分析論述的關鍵。

以此方法論為出發，希望能儘可能跳脫身處的文化與環境的束縛，進行各種全球化論述的知識權力結構分析研究。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由後殖民主義、認同理論，以及文化消費所構築的全球化文化為主，並以台北雙年展的個案研究為例據。以下為兩種範圍分別說明：

一、全球化文化部分

在時間範圍上，主要以廣義的當代為主。無法明確界定時間範圍，是顧及到上述研究主題的特殊性，如果先行嚴格定義時間範圍，將影響到某些論題的開放性，例如全球化何時開始、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如何界定等議題。因此對於時間界定上，僅能以廣義的當代為概略範圍。

在空間範圍上，全球化的議題自然需要討論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但事實上，以本研究的取材文獻，發現今日對於全球化議題的發言場域，仍舊以昔日第一世界的現代化大國為主，而論述的對象，也大多環繞在這些國家以及與其互動的國家為主。嚴格說起來，空間範圍的限制有二；一是文獻來源以及主要論述者大多是來自歐美日等現代化大國，再是議題論及的對象仍舊以這些大國為主體，或是討論其自身的問題，至於討論到其他地區的內容，也大多是從與這些大國相關與互動的角度出發的。

在取材範圍上，本研究的主要取材，是以全球化相關文獻為主。進行全球化

³⁷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許德衍譯，《社會學方法論》(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台北：商務，2000，頁6。

的研究，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可以運用的材料也如同全球化本身一樣豐富。本研究所採取的角度，主要是藉由觀察各式各樣全球化詮釋的觀點，以及輔以後殖民主義等批判觀點，切入對於台灣身份認同問題的分析研究。因此，主要取材的對象，鎖定在相關的全球化、文化消費與認同理論相關文獻上。

這部分的研究限制主要在：

(一) 定義困難：在本論文的關鍵字中，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都是很難直接下定義，也很難直接界定範圍的。因此，必須要以考察「觀點」的方式，輔以相對定義的理解，才得以進行分析與研究，不至於因片面定義而以偏概全。

(二) 資料與文獻的局限：在許許多多的媒體報導中，充斥著各式各樣全球化的說法，這些可以說是最佳的全球化現象研究的文本。只是這些包括電視節目、新聞報導、報章雜誌等的資料，絕大多數片面且零碎，且不易從中找出足以具代表性的典型文本，因此，在顧及研究焦點與規模的考量下，這些人們生活中最常接收到全球化意識的材料，無法被納進入本研究中加以討論，是一件可惜的事。另外，在台灣的全球化相關出版品中，絕大部分以歐美譯作為主，極少見到其他地區或其他語系的作品與文獻，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對於全球化論述研究的開放性。

(三) 中文翻譯問題：由於筆者語文能力以及資料取得的限制，本論文大多採用中文翻譯資料與著作。這些翻譯資料或多或少存在著不同語文間的文意落差問題，在筆者能力所及已查證的部分，將附加註解說明，或至少交代筆者對原著用語的認知與理解程度，以盡量彌補翻譯問題可能造成的語意誤認。

二、台北雙年展部分

個案研究台北雙年展的範圍界定上，論文內容將台北雙年展國際/全球化策略的研究起點，定在自 1992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正式將「現代繪畫新展望」雙年展，易名為「一九九二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起，研究範圍至 2004 年底「2004 台北雙年展- 在乎現實嗎？」，共七屆。

這部分的研究原本有很大的限制,就是對於館方相關國際/全球化策略的運作內幕取得困難。「幸運」的是,直到 2004 年此屆,「台外雙策展人」因某些原因合作破裂,策略運作問題浮上檯面討論,本研究嘗試切入的「台外雙策展人」策略層面分析,才得以取得許多關鍵的公開資料。³⁸

由於 2004 年「台外雙策展人」策略的運作出現重大變化,預料將使本屆成為台北雙年展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此,雖然台北雙年展仍將繼續舉辦,但由於 2004 年的風波,在未來相信台北雙年展將會有很大的轉變,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圍(1992-2004),可被視為是一段具有特殊意涵的階段研究。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預期成果

本論文研究方向主要是由全球化相關論述切入,深入分析各種論述的觀點以及出發點,而不以追求定義為目標,希望能找尋其中的差異與可能性,藉此釐清支撐全球化論述的當代知識圖式,進而進行全球化裡的台灣身份認同問題研究。

本論文的架構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章緒論,說明此論文的研究動機、範圍與限制以及文獻回顧等。

第二部分:包含第二章全球化種種以及種種全球化、第三章全球化下的後殖民與文化帝國主義。第二部分主要是以考察觀點的切入方式,分析以及釐清各式各樣的全球化論述的觀點以及出發點。其中有各種角度的全球化面向考察,也將許多反全球化的見解如後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等論述,視為是全球化之一,一併加以分析討論。

第三部分:包含第四章文化消費與想像的全球化共同體、第五章文化全球化與台北國際雙年展。以前述的抽象理論分析,加上文化消費理論的觀察角度,佐以台北雙年展全球化策略為例,漸漸進入具體的全球化台灣身份認同現象觀察與

³⁸ 詳見論文第五章。

探討。

第四部分：第六章結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權力技術。將論文發展以來的論述方向與考察案例作一交流對照，並呈現觀察研究的成果與心得。

藉由此研究，本論文希望能達到的目標，包括：1.廣泛了解各種全球化的論述及詮釋角度；2.分析與掌握各種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爭議癥結點；3.探討文化消費理論作為身份認同方法學的可能；4.後殖民批判與全球化文化消費的關聯；5.解析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策略，以此作為台灣身份認同處境上的反思；6.全球化場域與個體身份認同的權力結構關係。希望經由此研究過程，能夠分析出今日全球化論述背後的知識圖式與權力結構，並指出全球化文化霸權論述下台灣的身份認同政治問題。

第二章 全球化種種以及種種全球化

這是個嶄新的新天地，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

馬奎斯³⁹

全球化是今日各式各樣論述中必要的政治正確。在經濟論述裡，全球化是全人類邁向共同榮景的想像；在政治論述裡，全球化是跨越冷戰後彷彿柳暗花明的美景；在生態環境的議題中，已經必須且容許進行全球性的思索；而在文化與藝術的前路上，全球化更早已鋪架了阡陌縱橫、難分涇渭的通幽曲徑。全球化一詞在各個領域論述中，如同是一款最時尚的裝扮，穿上後才能得體地參加盛裝晚宴。事實上在今日，全球化更像是一句上帝恩賜的神愒，跟隨祂，將引領著全人類邁向充滿了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許多試圖為全球化下定義的嘗試，都相當輕易就招來質疑或反對。是否全球化真的難以定位與定義？就如馬奎斯在《百年孤寂》開端所言：這是個嶄新的新天地，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全球化一辭今日俯拾皆是，讓人感到似乎熟悉、理解，但卻又難以言說。也許對於全球化是什麼，發問的方式才是關鍵吧。有一句話常提醒我們避免成為徒勞的無頭蒼蠅，它說：「問題問對了，答案就出來了。」與其嘗試在這一片渾沌之中，武斷地對全球化下定論，不如回過頭來，仔細環顧種種全球化的面向，重新追索發問的點點吉光片羽。

關於全球化

全球化是對於今日世界面貌的描述語言。許多普遍的理解裡，全球化的景況

³⁹ 賈西亞 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楊耐冬譯，《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台北：志文，2001，頁 25。

是歷史線性發展的當中一程，如同歷史上曾經有過上古時代、黑暗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工業革命時期等，全球化也被用來描述當代歷史的軌跡。所不同的是，上述的種種歷史段落命名，幾乎都隱含著一種時序上的中介身份，顯示某種程度上承先啟後的份量。全球化一詞則不盡然如此，全球化除了作為當代歷史進程的代名詞之外，更有進一步的說法，將全球化視為已是文明發展的終站了。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推演就是持續不斷地修正、突破，朝向理性邏輯下最合理的方向前進，因此許多人認為，全球化的面貌正是人類理性思考下，符合利益的合理發展。尤有甚者，進一步更樂觀的論述認為，也許全球化已是突破了種種非理性的障礙及藩籬之後，人類歷史發展的極致了。一如法蘭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歷史在冷戰結束後，重大的政治衝突已經落幕，一個和諧的世界正逐漸成形。福山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進展及西方自由民主普及，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終點。」⁴⁰「整體而言，自由民主體制已經獲勝。未來將不再致力於推動大型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會放在解決經濟和技術等世俗問題上。」⁴⁰雖然這樣的理解與預期並未直接指涉到全球化的現況，但是卻為現今經濟、政治、乃至於文化全球化鋪設了一條合於理性邏輯發展的歷史軌跡。

第一節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貫徹

發問全球化，一個最普遍、最單純但卻也片面的理解，就是從經濟領域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的問題。要說從經濟領域的角度是最普遍、最單純的原因，是因為全球化這個話題與名詞，幾乎已成為冷戰後全球資本流通的最佳代名詞。一般大眾媒體對於全球化一詞的理解與運用，往往不脫許多日常商業、消費現象的描述，以及從跨國企業、國際分工的種種，到全球各種金融貿易組織整合的討論等。全球市場經濟現象、全球規模資本流通等，的確是易於量化而極具說服力的一個

⁴⁰ 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2001，頁 17。

面向，不過許多論述者卻都認為，這是對全球化過於片面的理解。雖然許多時候，種種全球化現象幕後，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但並不能以此作為所有全球化疑惑的標準答案。畢竟，在資本主義邏輯高度合理化的今日，自由主義的「全球市場」經濟面詮釋，有時不但不是現象背後的主因，往往反而成為許多非經濟因素企圖的擋箭牌。⁴¹

首先從經濟面來看。所有的經濟理論架構，廣泛地說，都無法脫離一個封閉迴路體系的假設前提。微觀/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裡理性的決策主體，對應的是資源有限的特定客觀環境；宏觀/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的總合行為，更都必須將討論模型設計在具體的經濟實體範圍中。以往在經濟層面裡，看似突破封閉迴路體系的，就是「貿易」一詞。⁴²「貿易」是一個跨界的概念，是複數經濟實體間的交通，如雙邊貿易、三角貿易等；當跨越的疆界是國界時，就成為眾所周知的國際貿易了。事實上存在於人類歷史上的貿易現象，本身就已經是一部跨界交流史，而國際貿易更顯然是由來已久的國際交流；只是今日全球化概念下的貿易，又將討論的話語模式重新建立在一個新的封閉迴路體系之中，那是一個放大的、無法再跨界的「全球市場」體系。在這個「全球市場」的想像模型裡，「全球」是實驗同時實踐自由經濟邏輯的最終場域；在這個最普遍的解讀之下，全球化不但象徵的是全球資本的高度流通、全球勞動結構的高度分工、以及無壁壘障礙的全球市場分享等。更重要的，這樣的全球理解預示了一個全球共榮、真正自由經濟體系將得以展現的遠景。

現今全球化論述裡，自由經濟體系可說是等同於資本主義的論述邏輯。許多反對這種經濟片面論述的全球化支持者，提出許多更廣泛的全球化論述面向，試圖為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盤根錯節鬆綁。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強勢意識形態，在歷

⁴¹ 例如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曾言，許多重要的全球經濟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歐盟等，其決策基礎「相當奇特，攙雜了意識形態與壞的經濟學，有時教條之上好像還籠罩著一層特權的外衣」。Joseph E. Stiglitz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7。

⁴² 事實上不論是雙邊貿易、多邊貿易、國際貿易等理論，其假設前提仍舊是一個封閉的迴路體系；亦即貿易個體的界限雖說去除，卻是被包容在彼此的聯集裡。

史長河中所經歷的無數衝撞與征戰，累積了如剝削、侵略、冷酷無情等負面形象，也成為許多追索人道關懷面作品裡的頭號假想敵。⁴³ 試圖澄清全球化不等同於全球資本主義，言之成理的論述的確不少，但大都不離抽象、複雜，充滿哲思的學術語彙；而有更多說服力薄弱的論辭，長篇累牘說來更像是為了掩飾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面貌，讓人對於儼然是資本主義全球狂飆的全球化景況依舊心懷畏戒。對於這一點，福山不但沒有迴避，更直接指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普遍原理的合法性，以及資本主義即為經濟自由主義的論點。福山認為：

在經濟方面，承認以私有財產和市場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活動和經濟交易的權利，即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一辭在漫長歲月中多少含有貶義，最近「自由經濟市場」的表現卻很流行，但無論如何，它依然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代用語。目前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龐大的民間部門。凡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活動的權利，我們即視之為自由國家。反對這些權利或奠基於其他原理(如「經濟正義」)的國家就沒有這個資格了。⁴⁴

這種觀點直接將資本主義所扮演的角色指涉到管制與掌控的對立面，即以資本主義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精神的呈現；在此資本主義不但取代了經濟學領域中的自由經濟學派理論，更成為「自由」這個意念的具體代言人。福山以 1790 年到 1990 年對其所言的「自由民主的世界」規模列表統計，認為「以世界觀點而論，民主也反覆著逆境與順境的循環，然而其中的確存在著奔向民主的明確潮流。」⁴⁵ 對於這個「未來世界的美好圖像」⁴⁶，福山簡短結語：「自由民主的成長跟其伴侶經濟自由主義的成長相偕而行，已成四百年來最值得注意的鉅視現象。」⁴⁷

⁴³ 諷刺的是，這類題材最常見於高度資本主義運作的好萊塢電影裡。例如賣座全球的「電子情書」(You Got Mail)片中小書店與大型連鎖書店的描寫方式，即是常見的方式。

⁴⁴ 福山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1993，頁 54-55。福山在這裡指的「經濟正義」，應是別於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計畫經濟體系或計畫經濟理論。

⁴⁵ 福山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1993，頁 58。

⁴⁶ 福山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的標題用語，頁 56。

⁴⁷ 福山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1993，頁 63。

資本主義的邏輯基礎根基於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以一種較單純的理解，邏輯運作的目的在於排除錯誤，彰顯正確，以便建立起客觀、有效的知識形式；而理性邏輯的信心基礎即是得於人文主義(humanism)確立，得於人類掙脫了神權的先驗性規範與制約，受到這種思考權利解禁與掌握的激勵下，人類躊躇滿志地邁向一個海闊天空、積極實現自我最大幸福的新天地。在這個以理性邏輯運作的樂園中，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的思維與價值受到維護，甚至受到鼓勵；它的正當性正如同經濟學學理的基本前提所言——所有的經濟行為應當是一種理性的決策過程，以作為實現決策主體最大滿足為目的。資本主義的運作既然是理性的，合於邏輯的，應當早已運行無礙，據以實現了樂土的風貌，也說服了所有人才對。但現實世界裡，往往看到許許多多與經濟理論扞格之處；許多人認為未感受到最大滿足的實現，更多人不承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的「合理性」(rationality)，一種最根本基進(radical)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的邏輯基礎——西方理性主義，其「合理性」根本不應該架基為文明的主要普遍基礎。⁴⁸

要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與現實的落差進行辯護，當然拒絕接受對於理性主義「合理性」身份的質疑。(在此這也不是本論題的焦點，故不予深究)許多主張認為，現實場域中，有許許多多非理性的、非經濟邏輯的因素，造成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的運行障礙。首先，衡諸歷史，必須承認這些非理性、非經濟的干擾是存在的事實。站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人類的許多作為，往往違背了理性決策的前提；許多歷史情境的發生，也的確令人質疑其理性基礎。再者，一個更關鍵的條件因素——所有經濟理論架構的封閉迴路體系假設前提，無法在以往的市

⁴⁸ 韋伯的理性化理論描述的，是西方現代社會如何朝向理性發展，亦即如何被效率、可預測性、可計算性以及非人性技術的控制所支配；韋伯即曾以「鐵牢籠」(iron cage)來描述理性如何禁錮人性與扭曲人性。此外，現代許多文化多元論者反對以西方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作為觀看文明的基礎；在許多文化相關的爭論裡，尤其許多法國學界的理論裡，更多見質疑與反對人文主義的思想，這種反對主要是認為，人文主義與日益擴張的西方文化帝國主義關係密切，儼然如同為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論基礎，壓迫、抹殺了其他文化的差異性。例如貝克在《全球化危機》一書中討論到啟蒙以來的理性時所言：「後現代的哲學家已歡欣地給科學的理智和理性要求開了死亡證明。在他們眼中，所謂的西方啟蒙精神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us)和人權，不過是「死的、老的、白種男人」用以壓抑種族上、宗教上和性別上的弱勢族群的調調，在這些調調中，他們獨裁地設置了不公平的「後設故事」(metaerzählung)。」

場上真實存在，這更是造成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邏輯無法確實運作的主要原因。傳統的經濟模型中，對於「市場」的概念，其實只是一種語意學上的虛擬與想像，難以直接對照真實世界的具體環境。因此，對於自由經濟理論的支持者來說，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全球市場」體系想像，彷彿是個新天堂樂園，將會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更完美的實踐場域。這就好像理論家為了證明地球繞日說，所提出的黃道面軌跡方程式一樣；當首先提出的圓形軌跡出現了許多例外，難免不足以說服心存疑惑者，堅持「真理」而遭受誤解的理論家奮戰不懈，終於找到能完美含括所有行星運行軌跡的橢圓形方程式，才得以向世界證明自己理論的真實性。現在，對於自由經濟理論的支持者而言，在單純的經濟領域理解中，全球化一詞提供了一個樂觀的，作為實踐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的完整場域；比起以往經濟理論裡語意學式的「市場」一詞，「全球市場」體系成為一個更具體、更完整的實踐場域，也如同宣告了，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理性主義下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理論，其將邁向真正自我實踐的可能。

第二節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終結 - 內政界線的模糊與再定義

全球化時代等同於民族國家的權力結構質變與衰微，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經濟考量，一切的權利行使與再結構，都使得人類歷史步入全新的紀元 - 全球經濟的時代。大前研一提出一種觀察方式，即觀察其所謂的「四 I」流動情況，以驗證全球化的存在。大前論言：「投資(investment，第一個 I)已經不再受限於地理因素了，至於第二個 I (industry，產業)今天也比十年前更國際化了。不論是投資或是產業，都因為第三個 I (information technology，資訊技術)而變得容易流通。最後一個 I (individual consumers，個別消費者)也同樣變得更全球化了。」

⁴⁹今日世界，這些要素都是跨國界的，因此民族國家的統治及權力顯得日益薄弱，「疆界消失在無國界的世界中，在今天無國界世界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民族

⁴⁹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1996，頁 4-6。

國家喪失了參與者的角色。」⁵⁰接下來的全球化時代中，真正行使決策的，將是跨國企業與個別消費者。大前研一切入與關注的主旨雖然都是經濟面向，持此論者所在多有，但是因為直接挑戰與解構傳統穩固的權力系統——民族國家，而廣受矚目。大前研一這樣直接宣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與存在內涵的作法，所引起的許多討論與挑戰，是全球化議題與傳統國家主權議題相結合的重要關鍵之一。

針對這個論點，懷疑論者如湯普森(G. Thompson)、赫斯特(P. Hirst)以及韋斯(L. Weiss)等人，藉由許多歷史比較的方式，認為大前研一等這種宣告民族國家的終結論述，是一種全球主義的誇大與錯誤。⁵¹楊雪冬分析詮釋這三位的反對意見為：

第一，現在的所謂全球化實際上只是國際化，國家依然是經濟的主要範圍和管理者，湯普森和赫斯特提出要把全球化和國際化區分開來。事實表明，沒有出現向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強大趨勢，現在的世界經濟依然由主要的發達國家主導著。第二、全球主義宣揚的國家終結的觀點不但誇大了事實，而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韋斯認為，全球主義者不僅誇大了國家的能力缺乏，而且過於簡單化，對各個國家的情況不加區別。⁵²

如此以經濟現象的分析導入政治體制解構預判的論證，總是被質疑者自內部辯證中提出反對；同樣地，貝克(Ulrich Beck)也直指這種推論是一種「全球主義的謬誤」。貝克認為：「經濟(還)是國際化，而非全球化。全球主義不僅混淆了多面向的全球地方化與單面向的經濟全球化，還混淆了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國際化。

⁵⁰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1996，頁17，其中「無國界的世界」一詞，被視為大前研一全球化論述的核心觀點。

⁵¹ 全球主義(globalism)，泛指以單一經濟層面，甚或僅以新自由主義層面理解的全球化論述。若以貝克的說法，則全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依照單向因果關係、經濟主義運作，將全球化的多面向性簡化至經濟面向，而且即使這個面向亦被視為直線式的，至於所有其他的面向環保的、文化的、政治的、公民社會的全球化，就算被提起，也是置於世界市場體系的支配之下。」見《全球化危機》，頁12。

⁵²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11。

指標顯示：正確地說，在世界經濟諸區域內，(還)說不上全球化，而是國際化。」

53

從討論經濟全球化現象存在與否的這個論題爭議上，可以看出，引發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是因為全球主義者如大前研一、福山等，以經濟角度作為線索，所推論出來的鮮明且樂觀的全新全球權力結構所致。在這些全新的全球權力結構論述裡，彷彿有一個如幽靈般的核心角色——民族國家——受到討論與高度擔憂。樂觀的說法把過去霸權象徵的民族國家，描述成是被全球經濟新局給繳械的老兵，無論願意與否，早已時不我予。相對地，反對意見並未被這般經濟角度簡單說服，仍舊高度憂慮，認為民族國家的權力結構與影響力，不但沒有終結，全球化說法反倒成為民族國家霸權的轉進掩護，被用以延續一貫以來強勢民族國家的主導地位。許多懷疑論者質疑全球化一如過往的殖民主義，其以國家支持資本的海外擴張。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控制範圍，用各種手段支持本國資本的輸出。⁵⁴另外，紀登斯也從另一個角度提出看法，認為民族國家並非如大前研一所說的成為一種「虛構」，不過承認它們的形態確實正在改變。紀登斯認為：「全球化趨勢也從側面迫近創建了那些不時截斷民族國家之畛域的新的經濟和文化領域。全球化運動正在影響著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地位和能力。主權不再是一個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事物，國家邊界與過去相比，正在不斷地變得模糊。」⁵⁵顯然在這個論題上，更多人並不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爭議民族國家到底終結與否，而是更進一步追問，在全球化結構下，傳統權力形式如果改變，新的全球化時代權力結構將是如何。

進一步與民族國家權力相關的探討，同樣也常見的全球理解，是作為形容國際間共同事務組織或共同事務協議的描述用語。在這許多跨國的、區域性的，乃至於全球性的組織機構，存在許多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解讀面向。

⁵³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1999，頁157。

⁵⁴ 見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33。書中引用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對西歐政治經濟史的考察論述。

⁵⁵ 紀登斯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台北：聯經，1999，頁36。

其中，延續對於民族國家權力的角度探討，則這些國際組織機構的存在意義，可以視為是民族國家內政界線的模糊與再定義。而當這些被賦予全球化意涵的國際組織機構，被用來充實全球化的內涵時，卻也因助益全球化，而得以定義其自身，這是這些國際組織與全球化常被相提並論的主要原因。紀登斯論及全球化時代的這些國際組織機構，其與以往的跨國機構有何本質上的差異，舉出以往全球性的代表機構——聯合國為例，和現今全球化下的歐盟作為比較，指出「聯合國一如其名，是國家的集合組織。至少到目前為止，它絕少挑戰國家的主權，而且聯合國的憲章也主張不應如此。歐盟則不同。歐盟重要的地方並不在於它位於歐洲，而是它率先採用了一種跨國治理的形式。歐盟也不只是國家的集合組織。歐洲國家必須自願放棄部分的主權，才得以加入歐盟。」⁵⁶這種涉及以往民族國家內政界線的跨國聯盟，如同在參與及創造一個超越國界的社會，這樣的說法被描述為一種超國化(supranationalization)的現象。「這種現象被認為是歐盟建立以來形成的新概念。它強調的是出現了超越國家，並且能夠全面替代具體國家的政治經濟實體趨勢。歐盟是典型代表。」⁵⁷

這種理解的角度並不是直接把這些相關組織或協議事務稱為全球化，而是在論及全球化議題時，常常以這些「國際官僚機構」⁵⁸當作重點範例，用以證實全球化的現象事實存在。最常被提出與討論的相關國際官僚機構包括了：歐盟(European Union)、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全球性的經貿組織。這種全球化詮釋角度的普遍運用，某個程度上是因為在這些國際官僚機構推行運作的過程，全球化一辭廣泛地被作為政策宣示與願景描繪的官方用語，再加上發達的媒體高度關注報導，這樣的全球化面向成為一種強勢語言，投射出對這些「國際官僚機構」的樂觀與寄望。這種直接且自信的

⁵⁶ 紀登斯著，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82。

⁵⁷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10-11。「超國化」一詞被楊雪冬用來區分「國際化」、「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等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概念。楊指出，「國際化強調的是國家之間聯繫廣度和深度的加強」，「跨國化指的是非國家主體，特別是企業活動範圍超過國界」。

⁵⁸ 史迪格里茲語，出於《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史迪格里茲，世銀前任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全球化面向詮釋，除了將關注的焦點放在這些國際官僚機構的作為之外，顯然其中更是一種對全球願景的先驗性規範態度。譬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論及全球前途中，國際性機構的必要性時，即直言：「全球化不能走回頭路，因為它已是既成的事實，問題該是如何使全球化發揮功能。如果全球化要能發揮功能，就必須有全球性的公共機構協助設定相關的規則。」⁵⁹

第三節 全球化是一種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

除了全球化是否真實存在以外，另一個同樣熱門，且眾說紛紜的爭議，就是如果承認全球化是一種確實存在的現象，那麼，全球化究竟是從何時起？又因何而起？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這同樣涉及到全球化的本質與存在定義的關鍵；如果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時代產物，那麼對於追蹤其誕生的軌跡，就只是對於全球化作進一步定義的工作；但對於全球化的懷疑者而言，提問全球化伊始則像是拉長戰線，甚或另闢戰場。畢竟，如果追問的結果，全球化的歷史能被延長到某種難以被特殊化的程度，那麼，被填充進全球化的內涵與定義將顯得虛浮空洞；屆時，當人們需要以某個命名來描述「它」時，將會用更清楚的指涉用語如：全球資本主義、全球現代化等，因而間接地無法承認「全球化」。

表 2-1 數種廣受討論的全球化開始年代

學者	開始年代	主題
Marx	十五世紀	現代資本主義
Wallerstein	十五世紀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Robertson	1870-1920	包括多個面向
Giddens	十八世紀	現代化
Perlmutter	東、西陣營衝突的結束	全球文明

J.N. Pieterse, *Der Melange-Effekt,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97. ⁶⁰

⁵⁹ 史迪格里茲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 320。當然史文在此論及的「國際性機構」，不只是經濟領域的機構，也廣泛地提及生態、環保、人權、醫療等國際性組織機構。但整體而言，經濟領域與其他國際性組織機構篇幅比重懸殊，史文最關注的仍舊以 IMF、WTO、World Bank 為主。

⁶⁰ 本表格轉錄自貝克著，《全球化危機》一書，頁 32。

在許多採取廣義的解讀中，全球化不是一種歷史線性發展進程下的新階段，而是一種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見上頁表 2-1)。全球化現象的本質就是跨界交流，造成文化/文明互動的現象，差異只是交流的外顯面貌罷了。通商是一種交流，宗教傳播是一種交流，即使戰爭、侵略、殖民等不友善的種種現象，也都造成了跨界交流的結果。許多抱持著這種廣泛理解的角度，也許會例舉十字軍東征、蒙古帝國等的大規模跨國界現象，甚至於會從馬可波羅的文化交流說起；許多人就認為，現階段的全球化其實並無任何新奇之處；資本主義出現伊始就已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⁶¹這種定義底下的全球化一詞，不被認為是一個全新時代的象徵，而被視為是一個形容詞，或者說就是跨界交流的代名詞。這樣的解讀隱約透露另一種比較歷史觀，關注世界體系的牽扯互動，而不僅直線式地解釋歷史發展因果。以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觀點為例，世界體系論指出，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及征服新大陸，現代資本主義開始發展。⁶²自此人類始脫離在各地區封閉發展的階段，在歷史長河裡互不往來的政治單元亦逐漸形成今日的國際社會。在世界體系的論述架構中，殖民母國、邊陲、半邊陲國家三種階層相互間的依存與剝削關係，導致了帝國主義侵奪爭戰與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也導致了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衰落，以及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與民主化。依此觀點，從十五世紀開始，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可以被獨立於外部的世界形式來理解，也沒有任何國家的歷史可以被孤立的加以描述。⁶³

⁶¹ 見湯普森(Grahame Thompson) 赫斯特(Paul Hirst) 著，朱道凱譯，《全球性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台北：群學，2002。

⁶² 當然光是論及資本主義的源頭，本身就還有許多不同角度的看法，如最為人熟知的新教說，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主要的因素是十六世紀的宗教革命產生了一組宗教觀念，在這個新的宗教觀念中 主要是喀爾文教派，新教教義成功地將利潤追求轉變進入道德改革運動。正是這種道德體系的支持，在利潤追求上出現前所未有的擴張，最後更促進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

⁶³ 以華勒斯坦的說法，「世界經濟」指的是「 整個地球是在一個有約束性的、普遍的工作分配的架構及規則內運行，我們稱此一工作分配為世界經濟。」而據華勒斯坦的觀點，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有三個基本要素，分別為：一、起源於一個為利益最大化原則所統治的單一市場；二、一系列具有不同對內、對外強度的國家結構的存在；(國家結構的主要功能是「阻礙」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由」功能，好改善一個或多個團體的獲利前景。)三、對於剩餘勞動的掌握發生於三個等級的剝削關係中，這三個等級是：中心空間(zentrale räume)、半邊陲(semi-peripherie)和邊陲國家(peripherie-ländern)及地區。參見貝克著《全球化危機》，頁 47。

「在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圖像中，所有- - 所有的社會、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企業、所有的文化、所有的階級、所有的家計單位、所有的個人- - 都必須將自己定位並維持於一個工作分配體系中。根據華勒斯坦的說法，此一界定全球性社會不平等架構的世界體系，是藉由資本主義才得以實現。依他的觀點，根據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必須是全球性的。」⁶⁴這種看法將全球化視為僅是一個新名詞，本質上卻是存在已久的現象。或者，進一步地，將全球化視為一種新的意識，認為並不是前人沒有全球化的意識，只不過是沒有現今人們的「全球化意識」、沒有這種歷史文化態度罷了；換句話說，全球以往所經歷的種種交流，就算不是現在所理解的全球化一詞，也是一種有跡可循的「全球化意識」。

在所有否認全球化現實存在的說法裡，並非完全拒絕種種被稱為全球化的現象，而是反對將全球化一詞給定一種特定的歷史主義詮釋，其中也隱約包含著：反對全球化作為今日世界面貌的先驗規範。但是這種角度的全球理解，並不全然如華勒斯坦等，提出相對觀點的論述予以對抗，有時反而隱然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納態度，只是並不積極地為全球化進行合理化的辯護罷了。以經濟現象為例，許多全球化的「懷疑論者」，⁶⁵如湯普森與赫斯特等即批評「經濟全球化」的基進主張「顯得膚淺和證據不足。」湯普森與赫斯特認為，從歷史的深度來看，國際經濟的規模並沒有大規模增加的現象，而且各國、各區域經濟，其整體收入僅有一小部分來自於對外貿易。此外，今日世界的貿易、投資、金額流通等，仍然相當集中與掌控在歐、日、北美等三強(Triad)地區，因此不認為現今的世界經濟狀況與昔日的世界經貿有何根本的差異，足以支撐一個獨特的全球化現象描述。⁶⁶對此，支持者如紀登斯則以「流量」的觀察加以解釋；紀登斯認為：「如今，

⁶⁴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1999，頁 47。

⁶⁵ 紀登斯語，以形容質疑全球化現象真實存在者，並非特定指反對全球化者。

⁶⁶ 湯普森與赫斯特書中的關鍵論點：湯普森與赫斯特認為，「今日高度國際化的經濟絕非史無前例，它只是國際經濟諸多特殊時機或狀態之一。」因為若以規模來看，十九世紀晚期的世界貿易規模就足以媲美；再者「世界經濟遠未臻真正的『全球化』。相反地，貿易、投資與金額流動等，仍集中於歐州、日本、北美三強(Triad)地區，而且三強地區的領導地位似乎穩如泰山。」此外，「這些經濟強權 有能力向金融市場和其他經濟傾向施以強大的治理能力 由此可見，全球市場絕非不可管制和控制 。」因此 Hirst 與 Thompson 並不認為以今日的世界貿

世界貿易的程度已經遠高於從前，而且商品和服務的範圍更廣。但是最大的不同乃在於金融和資本的流動程度。當前的世界經濟得電子貨幣之助，遠為以往的經濟活動所不及。」⁶⁷先不論孰是孰非，從這兩種反對與接納的見解裡，可見到一個根本且概略的共同基礎，即全球化一詞被理解為，是對於人類歷史由來已久的跨界與交流的描述。

第四節 全球化是現代性/現代化全球擴散的代名詞

在各種全球化的論述中，不可避免地討論到許多相對概念的對照，其中「傳統/現代化」是其中一組重要的組合。在這個對照概念中，語意或定義比較不一的是現代化一詞。有的論述焦點著重在具體的經濟、工業發展層面，有的說的是文化與文明，有些則討論較抽象哲思的現代性(modernity)問題。但不論著眼的層面為何，也不論立場是贊成或反對，在「傳統/現代化」這組討論組合中，現代化這方都概括地統涉了進步、發展、效率競爭等意識。許多反對全球化人士的看法認為，全球化現象，或者說意欲進行全球化行動，是對於傳統的災難。當世界面貌愈來愈相似，傳統就愈來愈模糊，最後，世界只能成為一個單一的、美國化的樣貌。對此，許多全球化支持者紛紛以諸如多元文化論，或融合差異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論述等加以反駁或安撫。⁶⁸其中紀登斯的許多全球化論述中，更是特別重視對傳統價值的討論。紀登斯認為傳統不但不是全然相對於全球化的

易現象足夠來佐證全球化經濟的存在。參見 G. Thompson 與 P. Hirst 著，《全球性迷思》，頁 2-5。

⁶⁷ 紀登斯著，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 13。

⁶⁸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文化混雜(hybridization)認同描述。以《文化全球化》一書的譯者鄭榮元的譯者注解：以西方文明為主軸的「全球化」價值，是朝向西方市場化的道路，但不同國家有不同歷史背景和文化價值，因此面對全球化的趨勢，便興起「在地化論者」(localizationist)的質疑，他們要求國際經濟的整合應由在地國觀點出發，尤其須顧及在地勞工與企業的利益，並掌握自身的主體性，發展在地的認同與特色。據此，形成了「全球思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新趨勢。因此有鑑於「全球化」及「在地化」都有過度簡單化的傾向，所以一些社會學者認為，「全球化」與「在地化」應該雙軌並行，構成一個「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面貌。見《文化全球化》，頁 196。

建構，傳統在某方面更是全球化的重要價值所在。不過，在不討論價值，而直接觀察現實情勢時，紀登斯也觀察到，「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今天出現了兩個基本上的改變。在西方各國，不只公共機構漸漸脫離了傳統的束縛，就連日常生活也是如此。而世界其他仍然是比較傳統的社會也日益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se)。」⁶⁹在這組「傳統/現代化」的討論語境下，不論支持或反對，隱然都是將全球化視為是相對於傳統的前進角色。如此一來，這種理解或深或淺薄，相當程度地取代與承續了以往現代化的論題。

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性向全球的擴展，紀登斯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紀登斯認為全球化不過是現代性從社會向世界的擴展，它是全球範圍的現代性。⁷⁰尤有甚者，許多全球化論述則更直接地將其接續到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進程，以社會學家柏格(Peter L. Berger)的論述來看，全球化幾乎是被視為是現代化現象的代名詞；更進一步地界定，是指歐美以外的國家/地區現代化的現象。在柏格對世界各地的許多關於全球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其對於各地區現代工業化進程的重視，以及各地區參與全球市場分工體系深化與否的關心。在相當程度上，柏格直接將現代化的程度，作為衡量該地區全球化程度的關鍵因素。柏格說：「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持續不斷現代化的挑戰，只是情況更激烈，更快速。」⁷¹這正是許多人心中認為的全球化，但卻少見學者如此直言其與現代化的關聯。主要因為對於反對者而言，與其說是反對長篇累牘、諱莫如深的全球化論述，倒不如直接說是反對進行美式現代化之實的全球化。關於這點，柏格簡單明瞭地直接將反對者視為是在經濟重新分配過程中的相對被剝奪者，這樣的看法也顯示柏格將現代化作為衡量全球化條件的份量。柏格認為，「文化全球化的問題跟經濟與社會全球化問題息息相關，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管理』全球體系中的輸家，『西雅圖

⁶⁹ 紀登斯著，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47。

⁷⁰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16。

⁷¹ 杭亭頓、柏格著，王柏鴻譯，《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台北：時報文化，2002，頁36。

症候群』(Seattle Syndrome)就是基於文化上的理由，取得合法性。在這方面，法國反對麥當勞的行動是好例子，法國農夫在經濟方面的憂慮升高，變成保衛法國文明對抗美國野蠻文明的行動。⁷²在柏格的論述中，經濟因素與現代化，是全球化之所以值得受到討論的關鍵，相較之下，以文化為名的反全球化行動，在這個前提之下，都顯得虛假與形如託辭。

第五節 全球化作為一種先驗性的實踐

全球化也被當成是一種先驗的實踐。這種看法相當程度與線性發展的歷史主義觀點相符，在這當中的全球化一詞，已不只是對於今日全球交融面貌的現象描述，更如同指示出在歷史軌跡的辯證下，全球化在現今的世界裡，已經是一種必要的實踐。從歷史主義的觀點來看，在縱向的歷史發展裡，全球化的出現是一種實然(也是必然)，而在這種實然之下，全球化的實踐成了全人類的應然。也就是說，循著歷史發展的趨勢，今日作為別無選擇的「世界公民」，只有進行全球化、將全球化視為確認身分的先驗條件，才能證明自身的存在。這個全球化的詮釋面向，在各種利益的考量與糾結下，不但昔日第一世界國家作如是定義，更是許多昔日第三世界國家亦步亦趨的圭臬。正如同楊雪冬在《全球化》一書的序言裡，開宗明義地指出，全球化「這個大約在 1960 年才進入英語世界日常生活的詞，借助英語國家的強勢地位與英語詞組合的便利，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開始也逐漸侵入了其他語言文明，特別是發展中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開放性和世界性的標誌。而在主流媒體的宣傳和政治家的鼓動下，它甚至帶上了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啟蒙運動特徵。」⁷³楊在觀察全球化的觀念指導性角色時，即認為當論及全

⁷² 杭亭頓、柏格著，王柏鴻譯，《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台北：時報文化，2002，頁 35。文中「西雅圖症候群」，是指 1999 年 WTO 西雅圖會議，場外出現令人震驚的大規模抗議，自此以後，反全球化運動人士的態度日趨強硬，憤怒情緒更為擴散，往後只要有相關機構的重大會議，幾乎都免不了抗議與衝突的場面出現。此案例在 Naomi Klein 著的《破窗》(林淑媛譯，台北：時報，2004)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

⁷³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 。

球化時，常見的許多以「主義」(ism)作詞尾的表述方式，如全球主義(Globalism)、區域主義(Regionalism)、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這些觀念背後都牽連著一種指導性的態度。楊認為，例如「全球主義通常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問題上的代名詞，但是也有人把所有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天命趨勢的觀點稱為全球主義，世界主義強調的是世界如何在共同的價值規範和尺度下實現整合。這些與「主義」相關的概念很容易與某種意識形態混雜在一起，成為其對應現實的主要工具和手段。」⁷⁴這種指導性的規範態度，不一定只存在於強勢權威的一方，事實上，更多數實踐者的原始身份，可能是在這種論述結構下的相對弱勢者；而其處境並無涉參與這種先驗性規範的建構，但是卻將這些實踐當成一種如天命般的歷史必然在履行。

這種將全球化當成一種先驗性的規範態度，儼然成為今日主流的意識形態。許多蛛絲馬跡都可以窺見端倪；例如當政府官員在對人民宣示政策時、企業領袖在對股東說服願景時，以及文化、藝術、媒體界等等的發言裡，越來越多人直接把全球化一詞作為關鍵性的訴求。這個現象可以看出全球化的另一種理解，全球化被視為是一種合理的潮流、必須的趨勢，對於許多追尋現代化的國家與人民而言，全球化取代了以往現代化一詞，成為追隨與實踐的目標。情況在開發中國家是如此，而在歐美等已高度現代化的國家，也同樣廣泛存在這種對於全球化的認知。在推動許多國際性事務時，優勢地位的國家就如是地在訴求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以前 IMF 資深副總裁史迪格里茲為例，對於國際官僚機構與全球化關係的檢討時，他的一段話，就能看出這個全球理解的面貌。他說：「對世界上許多窮人，地球上許多地方的環境，以及全球的經濟穩定而言，今天的全球化並不成功。對某些人而言，答案很簡單：放棄全球化。不過這既行不通，也不是什麼好辦法。全球化改善了人類的健康，並且創造了一個積極的全球公民社會，也為爭取更多的民主與社會正義而奮鬥。因此問題不在全球化，而在於它的管理方

⁷⁴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 11-12。

式。」⁷⁵在這種形態的認知裡，明顯地，全球化已經被視為是一個內部邏輯明確，外部邏輯成熟的先驗規範。

全球化的權力意識滲透到社會的每一階層，世界的每一角落；全球化一詞已然成為某種合理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⁷⁶。在這個李歐塔(Lyotard)所言的敘事中，全球化一詞成為今日世界所有通往幸福、繁榮、和平的路標；合理發展就是實踐全球化，全球化成為今日世界在歷史處境中應然以及必然的面貌。在這個已然鋪架完整的知識地圖上，權利的運作一切順理成章，所有的人只要按圖索驥，已經不再需要任何存疑或討論了。事實上，從種種現象來看，在今日的世界局勢與全球的權力結構裡，這種全球化論述的確已取得合理化與合法性的地位了；主要的觀察角度是，作如是全球化解讀的，多是伴隨著權力與利益的運行。這與傳科的社會文化觀所描述的，權利與知識緊密結合的觀察不謀而合。在這個詮釋之下，全球化論述成為一套政治正確、歷史正確，甚至於道德正確的規訓(discipline)系統；在這套規訓體系中，規訓、指揮的一方，站在象徵進步與利益的高台上恩威並施，其他人包括追隨的相對弱勢者等，則早已將這份價值觀內化，並循著地圖亦步亦趨的跟蹤。這種先鋪設全球化論述知識架構，繼之以運行權力的模式，事實上依舊是傳科所言：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 Power)的面貌。

第六節 全球化是一種全球觀點(Global View)/解疆域化的全球化

對於全球化的反對與批評，許多言論直指全球化是一種霸權語言，本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化，或認為是美國化、美式資本主義化等等。這種種的批判主要

⁷⁵ 史迪格里茲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 309。

⁷⁶ 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以此術語指稱某種普遍的理論，譬如馬克思主義或黑格爾主義。這種理論主張能夠提供一種說明，使所有現象適用於其系統。」李歐塔對此站在一種反對的立場，如其「在《後現代處境》中主張：所有後設敘事現已不再為人所信；在後現代的世界中，適宜採取的是一種「不輕信」的態度。我們不再相信歷史的『後設敘事』，並且專注於去發展那些有助於打破這些敘事之權力的新『知識』。」參見斯圖亞特·西姆(Stuart Sim)著，蔡偉鼎譯，《德希達與歷史終結》(Derrida and the End of History)，台北：貓頭鷹，2002，頁 93-95。

是將全球化描述成為某種單向的價值灌輸，某種主客分別、強凌弱的，如同流體般，從高壓向低壓流動的情況等等。基本上在這些理解中，全球化的模型裡存在著一方強勢的價值詮釋主體，藉由建構與論述這個模型運作，這一主體成為遂行私願的得利者；通常遭受指控的對象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特別是美國。在這種二元模式的指控中，另一方則是一群無從參與論述建構的被論述的客體、被壓迫的服從者，或者是渾然不察的跟隨者。從這種指控的角度裡，可以看到，反對者攻擊的目標，是藉由指明全球化存在著論述的主體/主導者，進而將全球化的運作，推論與連結到特定個體的利益或價值觀。這種觀察角度，與其說所關心的是全球化結果的好壞，毋寧說更在意的，是認為全球化就是以西方/美國的眼光在看世界，以特定利益主體的眼光在描述與規範今日全球結構。這樣的爭議使得全球化討論的焦點，從各種國家發展、現實利益等問題，被引領到另一個關於價值、倫理，甚至於尊嚴的層面。

對於此一質疑，全球化的支持者自然無法完全接受。在這個指控全球化的角度上，許多正面論述的以一種「共同體」的說法來回應，即指出在全球一體，攸戚與共的現實處境下，全球化已是一種全球觀點的描繪；以往種種特定視野、觀看主體如民族國家、西方文明等，今日都無法再佔據絕對的優勢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觀點，任何個體或價值單元的考量必須以全球架構為判準。紀登斯即表示，全球化就是這樣一種全球觀點，並進一步以此全球觀點來探尋傳統、家庭、政府、民主價值在新世紀的定位。對於西方主導等指控，紀登斯認為：

民族國家，乃至國家政治領導人仍然強而有力嗎？還是他們與形塑這世界的力量愈來愈沒有關連？民族國家的確還很有力量，政治領導人在世界上依然舉足輕重。然而，民族國家也在我們眼前重塑，國家的經濟政策無法像過去一樣有效。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地緣政治逐漸式微，國家現在必須重新思考其定位。⁷⁷

⁷⁷ 紀登斯，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

也就是說，對於全球化是否存在著主導的主體，紀登斯認為在全球化的景況下，每個國家都不具有絕對掌控的地位，甚至於，國家自身傳統以來的權力與能力，都因全球化的趨勢而面臨重構的要求。對此，貝克也持相同的態度，貝克認為今日不再能用以往的國界或疆界來解釋權力互動的範圍，這些理解方式在全球化底下已不再是有效的原則。因為「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為民族國家間交互關係與作用的增強與頻繁，事實上，全球化持續改變了社會的內在性質：約定『社會』、『政治』之架構，本身就有了問題，因為疆域原則成了可疑的原則。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的貿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於依國家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容器」中進行。」⁷⁸

在這樣的說法之下，對於許多全球化的負面指控如新的帝國主義、新形態的殖民主義等，回應的方式是直接宣告，這些主與從、優與劣的判別基礎的不合法性；這些指控仍試圖以民族國家為基礎，指出世界秩序裡的階級關係。全球化的支持者則認為，諸如民族國家界限等這些架構早已不是一個有效的概念，今日是「一個全球國際社會，我們是生活在這社會的第一代，但其輪廓樣貌仍渾沌未明。它動搖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不論我們置身何處。」⁷⁹這些較正面的說法以「共同體」的處境回應了對於全球化的新霸權指控；反過來看，就這個角度而言，其實也存在著一個弔詭的陷阱，即這些負面的帝國、殖民等指控，因為指控的現象不再像過去那麼單純，為了處理今日全球現象的複雜牽扯，不得不承認今日的階級是以全球為鬥爭場域，民族國家的階級利益也有賴於大企業與全球經濟體系為手段，以至於相當程度上也必須將論述放進「全球觀點」的語境中處理；而且，也無法直接否認如紀登斯等人所言的強國自身的處境問題。因此，對於批評與理解的兩方而言，也許看法互異，對於今日全球化現象顯得忿怒或欣喜，但都面對了一種新的全球觀點的觀看視野。

頁 20。

⁷⁸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北：台灣商務，1999，頁 4。

⁷⁹ 紀登斯，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 21。

第七節 全球化是時間、空間關係的根本性變革

許多運用全球化一詞所指涉的現象，與傳統距離觀念的解構有關；不論是日常生活中全球訊息的流動，還是產業結構裡國際分工的運作等，今日世界的確在空間距離的觀念上，與昔日任何時代皆有著極大的不同。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對於媒體的理論，預言了人類溝通方式的重大變革，其對於媒體形態變遷及影響的論述，從而引導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想像，是許多探討全球化起源與背景論述的啟發。⁸⁰在這種被泛稱為技術決定論的歷史觀中，許多重大的技術發明與改變，被視為是人類歷史時期轉折的關鍵因素。印刷術的發明，促進了宗教推展與改革；蒸汽機的發明，開啟工業時代到來；貨幣的發明與其後金融體制演化，影響人類根本的生命需求認知；收音機、電視、電腦等等電子傳播工具，在技術決定論的歷史觀中，更是麥克魯漢關注與論述發展的焦點。在技術決定論裡，這些工具的出現，如同開啟歷史新時代的神秘鎖鑰，揭開一段段歷史舞台的序幕。被稱為第三波工業革命的資訊與通訊技術的發展，普遍被視為是形塑全球化現象的關鍵要素。以大前研一的說法：「技術的影響力道之強勁，就宛如全球資訊洪流這個被錮鎖已久的精靈，一旦從瓶中被釋放出來(現在我們很確定這個精靈的確已經脫身而出)，就永遠都不可能再將它禁錮回去了。」⁸¹

「地球村」的概念，主要建立在時空距離的變革上。以相對論的觀點來看，兩地之間的距離會因為往來速度的增加而顯得縮短；人類各式各樣交通工具的發明與進步，使得地理上的距離隔閡限制愈來愈小。但更關鍵的是，電子通訊工具的發展，直接突破實際的地理限制，進而超越過溝通彼此兩方的限制；首先，電子通訊工具幾乎達到瞬時傳播的方式，「電腦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不僅大大加速了

⁸⁰ 麥克魯漢(1911-1980)，加拿大傳播理論家。1967年提出「媒體即訊息」論述，認為媒體本身，以及其手段等，對宗教、科學、社會、文化及藝術等，有著深刻強烈的影響；主要指出媒體並非是中性的載體，對於訊息、知識與內容等均可積極介入。參見 Christopher Horrocks 著，楊久穎譯，《麥克魯漢與虛擬世界》(Marshall McLuhan and Virtuality)，台北：貓頭鷹，2002。

⁸¹ 大前研一著，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台北：立緒，1996，頁 20。

資訊的流通速度，而且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資訊爆炸」。這些變化使世界一體起碼在視覺中成為了現實，不僅縮短了時空距離，而且減少了時間間隔。這不僅是空間感的革命，也是世界觀的改變。」⁸²再者，各形各色的電子通訊工具，提供了許多傳統溝通方式兩造限制之外的新形態：電報、電話是一對一的溝通，收音機、電視是一對多的溝通，及至近十幾年來電腦的發展，包括了所有傳統溝通模式之外，更突破了所有模式限制，進而有多對一、多對多等方式產生。⁸³這些關鍵性的技術與工具，造成人類歷史一再跨大步邁進新的境界，其中電子通訊時代的開展，是進入全球化想像的一個重要因素。

紀登斯在許多有關全球化的論述裡，描述電子通訊與全球化進程的關聯，直指「通訊革命與資訊科技的廣泛傳播同全球化進程有著深刻的聯繫。即使是在經濟競爭的領域之內，情況也是如此。全天候的資金市場建立在人造衛星技術與電腦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礎之上，而這種技術融合也同時影響著社會的許多其他方面。一個瞬時電子通訊的世界——是那些生活在最貧窮地區的人們也能參與到這個世界之中——正在打破各地的地方習慣和日常生活的模式。」⁸⁴顯然在這樣的全球化理解裡，比起一般的經濟角度，電子通訊技術的進步可能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畢竟，如紀登斯所言，若不是電子通訊技術的發達，今日全球的市場規模與國際分工模式，是無法實現的。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與人類生活方式的關聯，是一顯例。受到資訊技術革命的影響，改變了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模式，進而也將人們帶入到更細微與更深化的消費認同情境中。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工業生產中，泰勒主義(Taylorism)的科學管理方式，與福特主義(Fordism)運用標準化 規格化方式的生產線(the assembly line)模式，兩者共同造就出西方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高度發展的優異根基。泰勒

⁸² 楊雪冬著，《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頁 35-37。

⁸³ 電腦對溝通方式的影響，除了在時間與主客對象的方面，更在資訊的本質上起了關鍵的變化，這個角度將在之後章節作重點敘述。

⁸⁴ 安東尼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台北：聯經，1999，頁 36。

化的科學管理理論(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ory)，藉由科學化控制與設計單位勞動力的效能，有效地提升整體生產效率；福特主義的生產改革，則成功地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以及大規模生產完全一致的標準化產品。規模遠勝以往的大量低成本工業產品，造就了其後「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

及至 1970 年代，交通與通訊技術革新，工業生產的另一效率型態——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順勢而起。⁸⁵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模式中，有了資訊科技的助益，以往大規模生產線的空間集中條件，已不再是必要條件。工業生產空間問題解決之後，資本家可以選擇在不同地點彈性生產，在不同地點加以組合，在不同地點提供消費。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概念中，考量的因素可能是原料成本、人力資源成本、運輸成本、土地成本，甚至於生產地的稅制優勢與消費市場規模等。同樣是降低成本與提升效率，早期泰勒化與福特主義的效率方式使得生產距離趨於集中，而後福特主義卻導致生產空間益形擴散，乃至於今日所見的全球分工體系面貌。這種現象的發展一如 J. Tomlinson 所言：「從資本主義的工具性功能來看，網路助長了功能性鄰近感的產生。雖然它並未使所有的地方看來都一模一樣，但在某一程度上的文化『壓縮』，創造了全球性空間和連結管道，配合網絡的時空壓縮，使資本(包括財貨和人員)的流通更加容易。」⁸⁶

通訊技術的發達，除了直接改變了工業生產的技術之外，電子媒介的發達所

⁸⁵ 下列表格為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差異對照表。若只從表格中理解兩者的意涵，怕理解會有所侷限，恐會誤以為兩者是二元對立的不同產物。事實上較細微的地方在於：1.後福特主義是福特主義的本質在加入了彈性生產條件之後所產生的變化；2.以及兩種工業生產模式分別與其所對應的消費時代之間的交互作用等。

表格來源：(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頁 295。)

表 2-2 福特主義與彈性生產(flexible production)模式的比較

	福特主義	彈性生產(後福特主義)
1.生產模式	大經濟規模企業；標準化產品	中小型企業；彈性且專門化的生產
2.競爭關鍵	相似產品的價格競爭	創造性；產品多樣化；高附加價值
3.技術	自動化	電腦整合製造
4.投資	生產設備	知識，想像力
5.勞動力	大量同質性勞工；低自主性	小規模的團隊生產；高自主性
6.工作組織	層級化分工	水平的整合
7.組織環境	個別公司之間進行市場競爭	互動密度高，組織之間合作，形成協力網路經濟體系

⁸⁶ John Tomlinson 著，鄭榮元、陳慧慈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8。

造就的是一種最鮮明的全球化想像。許多探討全球化問題的文章或書籍，或是許多專家學者的演說等，喜歡用一種「世界各地遠距離的串聯」來作為全球化的開場白。例如，某人身著來自於中東布料、越南加工製造、日本品牌、法國設計師手筆的衣服，坐在南非一家美式咖啡全球連鎖店裡，隨手翻著義大利設計雜誌，喝著巴西咖啡，一邊使用韓國製的衛星電話與台灣製筆記型電腦上網，與地球另一端的朋友們(也許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或者是埃及)聊著最近一部描寫全球氣候變遷災難的好萊塢電影。這種商業消費色彩濃厚的全球化想像背後，同樣緊密地結合著工業分工的模式；通訊媒介促進全球生產分工的可行，同時也成就了通訊媒介商品自身的重要性。通訊媒介的發達使得生產的觸角擴大到全球，再把全球的質素拉近到每一個日常消費行為上，也就是這種時間、空間關係的根本性變革，造就出每一個消費者的全球化文化消費與體驗想像。

第八節 結語

本章內容在形式上，主要是以與全球化相關的各種面向進行探討與瞭解。所分析出來的各種面向，包括有「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貫徹」、「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終結」、「全球化是一種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全球化是現代性/現代化全球擴散的代名詞」、「全球化作為一種先驗性的實踐」、「全球化是一種全球觀點/解疆域化的全球化」、「全球化是時間、空間關係的根本性變革」等。從這些觀察可以看出，其中概略包括有經濟層面的、政治層面的、歷史層面的、社會學及哲學與文化研究等，甚至於滲雜其中的，更有許多隱然的權力運作面向。

透過多元的全球化現象與論述的觀察，企求摸索出全球化概觀的形貌。本文並不以定義為主，而是希望透過分析「種種全球化」面向與觀點，以及「全球化種種」的影響與爭議之後，可以一窺今日全球化「知識圖式」與權力論述結構。希望藉由本章內容的探討成果，能在接續的章節裡，以這樣為基礎，發展與發現今日全球化世界裡的知識/權力考察，進而進行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的論題。

第三章 全球化下的後殖民與文化帝國主義

全球化的面貌竟然是一副很顯著的美國臉孔：兩耳是米老鼠的耳朵，食物是麥當勞麥香堡，喝的是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計算時使用的是 IBM 或蘋果膝上型電腦，而電腦使用的作業系統是視窗 98，電腦的中央處理器是 Pentium，電腦接通了思科網路系統。

Thomas L. Friedman⁸⁷

美國人殖民了我們的潛意識。

Wim Wenders⁸⁸

瞭解了前述「種種全球化」面向與論述，以及「全球化種種」的影響與爭議之後，我們大約可以窺見屬於今日全球化的知識圖式一貌。但第二章對於全球化的探討，有一個面向是不足的，就是關於整體全球化現象反命題的部分。雖然在上一章，關於各種全球化的討論裡，已經提到許多反對的意見，但主要都集中在對於某些特定全球化論述的反對，換句話說，這些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並非提出一種直述的反全球化概念，而是構築在許多正命題上頭的反對面，某種程度而言，扮演的是一個命題辯證的過度前緣。

前一章節中所提及的種種反全球化議題，其中有一較具體獨立建構的，是華勒斯坦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描述。華勒斯坦以資本主義的歷史脈絡發展成為世界體系論，以殖民母國、邊陲、半邊陲國家相互的依賴與剝削關係，說明資本

⁸⁷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Olive Tree)，台北：聯經，2002，頁 380。

⁸⁸ 溫德斯，歐洲著名導演。轉引自《全球好萊塢》，頁 1。原始出處：Wim Wenders, *The Logic of Images: Essays and Conversations*, trans. Michael Hofman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1)。

主義與世界歷史的辯證關聯，是一種相當敏銳的批判性史觀，也是今日全球化論戰中被用來對抗資本主義的厚盾之一。而本章所欲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則是另外幾個對於「全球化現狀」進行批判所建構出的反全球化論述；不同於華勒斯坦的經濟/資本主義歷史縱深取向，以下這些反全球化論述不但較偏重現實層面考察，而且對於全球霸權文化以及全球文化趨同的角度著墨甚深，直接建構出屬於自己的另類全球化面向——一種反全球化文化霸權的論述。

傅科的知識/權力論述常提醒我們，一切「理所當然」的現實背後，操弄的往往不只一隻「看不見的手」。傅科認為，權力反映了種種關係，因此需要尋找並分析權力關係。于奇智詮釋道：「權力創造知識，權力利用知識，權力依賴知識，權力與知識相互包含。不是認識主體的活動創造了知識，而是權力知識和權力鬥爭滲透並組成知識，決定認識的形式和可能領域。」⁸⁹這段繞口令似的語句，如同用另一種方式說明了知識與權力間的糾纏難分。本文試圖將傅科的權力/知識論述，導入作為觀察全球化的檢視面向，看看是否能夠發現到，全球化現象背後的權力技術面貌。

關於全球化的理解，承上一章的討論之外，如欲一窺屬於當代全球化的知識圖式，則必須兼顧到許多反全球化論述的角度，才能大概呈其全貌。或者換另一種說法：當我們看到許多全球化的正面論述之後，接下來探討的這種種反全球化論述，就如同打開了另一張知識圖譜，上頭為我們描繪了清晰易見的權力運作軌跡，這些截然不同於一般熟悉的全球化描繪，所提供的不僅是另一種見解，也不只是批判意識；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清楚發現到，關於全球化的種種，並未存在著真理，反而一如傅科所言，是權力的運作牽引了我們的思考方式。

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下列各種反全球化文化霸權論述的整理，除了作為廣義的全球化面向探討之外，還有更積極的作為，即對於今日許多全球化與在地文化主體認同的爭議，可以提供接續與批判的啟發。

⁸⁹ 于奇智著，《傅科》，台北：東大，1999，頁156。

第一節 全球化與全球現代化批判

第三世界國家，約略指稱開發中國家，以之區別第一世界的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第二世界，如前蘇聯與東歐地區。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是非洲、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區。在資本主義發展史裡，這些國家大多經歷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成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紛紛脫離殖民統治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當昔日第三世界國家掙脫殖民主義的桎梏，企圖快速發展以迎頭趕上的同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也進行了快速的轉型。西方工業社會在 1960 年之後逐漸轉型，進入後工業社會型態。「所謂後工業社會是指工業發展已經不再是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被服務業所取代，大量消費形成，白領階級取代藍領成為最主要階級，知識和資訊成為社會生產力的源頭。而後工業社會的型態透過全球化的過程，正逐漸擴散到其他新興工業國。」⁹⁰

殖民主義之後至今，全球仍面臨著發展不均以及許多地區發展遲滯的問題。⁹¹雖然殖民主義的帝國強權看似過去，但全球性的不平等狀況並未解除；全球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在現今資本主義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下，愈加的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窮國的處境也面臨了不同的壓迫窘境。單以全球經濟的發展來說，西方先進國家看似擺脫過去強取豪奪的殖民主義方式，高舉全球化論述中自由主義的共榮理想，但實際上，在西方先進國家所制定的種種全球化方向中，卻可以發現到許多看似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但實際上卻處處以西方先進國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措施。例如在全球金融體系扮演關鍵角色的世界銀行(IMF)，宣稱維繫世界金融秩序之際，往往招徠各式各樣假公濟「西」與政治脅制之議。關於這點，前世銀資深副總裁史迪格里茲即不諱言：「就算不把西方國家視為偽君子，

⁹⁰ 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頁 448。

⁹¹ 在此所言的「發展」一詞，大致上以下列指標衡量：1.國民所得、2.經濟成長率、3.產業人口結構、4.健康狀況等。相關先進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的差距描述，可參見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

它們在過去推動全球化方案時，的確比較重視確保自己能攫取大部分的利益，而犧牲開發中國家。」⁹²

對全球化的不滿之情，並不只是因為經濟學凌駕於所有事情之上，而且是因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特定觀點——市場基本教義，凌駕於所有觀點之上。就如史迪格里茲即認為，許多反全球化人士並非反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一套特定的教條，也就是國際性機構強迫推銷的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常會覺得被剝奪了自行做決定的權利，甚至還得被迫接受美國等國家曾拒絕過的選擇。」⁹³今日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其自身利益考量出發，將全球納入生產體系與市場體系，繼之以諸多全球化正面論述，來強化全球資本主義的正當性；但是儘管各式各樣論述支持著全球化的美景，卻不能解除全球發展差異日大的狀態。全球化不但不代表所有國家都已經一致，相反地由於科技水準、資本規模等的差異，加上種種遭受批評的偏頗措施，不但落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難趕上這個趨勢，更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到經濟之外的文化、社會，乃至於全面性的衝擊。

許多衡量全球化的看法與論述，與國家發展程度的衡量有直接關聯，並且相當程度上即是把全球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進程畫上等號。就不同文化地區歷史演進的相對性觀點來看，人類的世界與其文明確實有著「全球化」的趨勢。無疑的，近世紀以來主導這樣一個「全球化」現象的基本結構性理路是「西化」的「現代化」。在此所言「現代化」，主要與演化式的功能論(Evolutionary Functionalism)有密切的關連。這些理論有以下共同的假設：1. 社會是演化的，是從低度開發的農業社會逐漸演化到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2. 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或低度發展的原因是由於社會文化的內在因素所致。3. 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以西方社會的發展為基礎，並以此參考架構來討論其他地區的發展。⁹⁴對此，葉啟政在《社

⁹² 史迪格里茲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 26。

⁹³ 史迪格里茲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 318。

⁹⁴ 參見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頁 451。

會學與本土化》一書中，對於今日全球化的西方知識結構批判，也作了類似描述：

就其內涵而言，「西式現代化」指涉的相當廣泛，相對地，也是深具多元性的。但是，它所以搶得先機而成為形構「全球化」的主導歷史動力，有一個基本關鍵是不容忽視的。簡單地說，這個關鍵即在於它以「知識」的形式被展現、且高度地予以體系化，而這正是西歐啟蒙理性表現其以「理論論述」帶動「行動實踐」之歷史特質最為顯著的地方。經過至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導引，這樣一個來自於西歐世界的，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在整個人類的世界裡撒下了天羅地網，形構成爲一套龐大無形、且極具自我組織、自我再製、自我衍生和自我指涉等等特質的「體系」怪物。⁹⁵

第二節 全球化等於美國化/世界的麥當勞化

如葉文所言，在「西式現代化」的知識體系裡，西歐啟蒙理性以「理論論述」帶動「行動實踐」，具體地展現在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政治論述上。今日全球化現象普遍招致的美國化譏評，正是因爲不滿美式資本主義的自利取向以及高傲的文化正確姿態。這種高傲姿態在今日各種全球化論述中唾手可得：Friedman在《了解全球化》一書中舉了一個「五個加油站理論」的例子，以之描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高度競爭。⁹⁶他認爲在全球化之下，唯有接受美式資本主義的完全競

⁹⁵ 葉啟政著，《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2001，頁 174-175。

⁹⁶ 「五個加油站理論」內容概述：1.日本加油站。汽油每加侖五塊錢美金。四個身穿制服，手戴白手套的工作人員為你服務，他們都有終身雇用合約。他們給你加油、換機油、洗車窗，你心情平靜地駕車離開時，他們臉上帶著微笑向你揮手。2.美國加油站。汽油每加侖一塊錢美金。但要你自行加油，車窗也得自己洗，也得自行爲車胎打氣。你開車轉個彎時，四名沒有房子住的人設法要偷走你的輪胎圈。3.西歐加油站。汽油每加侖也是五塊錢美金，但只有一名服務人員上班。他一股不樂意地給你加油、換機油，並且不斷提醒你他的工作合約規定他只能給你加油和換機油，他不洗車窗的。一星期只工作三十二小時，每天有一個半小時吃午飯，午飯時間加油站暫停營業。每年有六星期年假，週遭長期失業人口眾多，因爲國家失業保險給付相當高。4.開發中國家加油站。因爲國家有補貼，汽油每加侖只要 0.35 美元。在加油站上

爭模式，才能使消費者得到最大效用的滿足。Friedman 並以此為全球化下了一段結語：「最廣義的說，現在世界上發生的是，透過全球化，所有人都被迫跑到美國加油站加油。在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化是要把英美式的資本主義以及黃金約束衣全球化，把美國文化和文化象徵全球化，現在也把美國革命和美國加油站全球化。」⁹⁷

除了上述對於美式資本主義批判之外，另一方面，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已經對世界多元文化造成嚴重威脅，擔憂的聲音多指向所謂全球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基本上，對於文化全球化與美式全球化的許多討論，常用麥當勞化來取代美國化一詞；以麥當勞化來指涉美式消費文化，主要取麥當勞企業高度象徵美式資本主義文化之義。在社會學或經濟學上，麥當勞化一詞大約可分為兩面詮釋：較不涉及價值判斷的內涵，是指高度理性化及科層化的效率(efficiency)、可計算性(predictability)、可預測性(calculability)以及透過非人科技的控制(control through nonhuman technology)等層面；⁹⁸另一方面，麥當勞化的負面詮釋，就像是指控全球的美國化一詞，是指麥當勞如同扮演美國資本主義的開路先鋒，為美式文化價值與樣態，挾強勢資本侵襲其他地區文化，因而造成全球文化面貌的同一。

許多反對與批評全球化的聲音，直指麥當勞、可口可樂、星巴克、迪士尼，乃至於好萊塢與 CNN 等，這些充斥全球每個角落的美國強勢文化消費，將帶來全球文化的壟斷與同一化。批判的聲音指出，透過強大資本主義運作，以及冷戰後世界獨大的國勢後盾，美式文化消費正如凱撒征軍，全球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對此前法國總統密特朗即言：「世界已遭受單一文化侵略，今日的這個威脅，是

班的有十五人，他們彼此是親戚。他們忙著聊天，沒有人理會你。六具加油機具只有一具能用。加油的顧客大部分不是開最好的寶士車，就是騎機車。5.共產主義加油站。汽油每加侖 0.5 美元，但加油站沒有汽油供應，原因是加油站的四名雇員把汽油拿到黑市賣，每公升五塊錢美金。四名雇員中其實只有一人上班，其餘三人在地下經濟中有別的工作，每星期只來加油站一趟領薪水。(內容摘自《了解全球化》一書，頁 377-378。)

⁹⁷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2，頁 378。其中「黃金約束衣」一詞，是指全球化時代限制政治經濟規範的衣著。作者以此比喻全球化時代最適當的就是遵循美式資本主義規制的自由市場。

⁹⁸ 參見喬治 瑞澤著，葉欣怡等譯，《社會的麥當勞化》，台北：弘智，2001，頁 17。

盎革魯 薩克遜文化假借經濟自由主義之名所造成，誰能無視於此？」⁹⁹藉由這些強勢美式消費的全球行銷，美式資本帶來了美式飲食、美式習慣、美式娛樂、美式風俗、進而以美式思考、美式方法，進入到美式社會模式。全球化反對者憂心忡忡地認為，全球化基本上是西方工業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所主導的全球秩序中全面地主宰全球的經濟、文化，以及政治、軍事等，如此的全球美國化將為全球文化帶來危難。就如 Friedman 所言：

全球化的面貌竟然是一副很顯著的美國臉孔：兩耳是米老鼠的耳朵，食物是麥當勞麥香堡，喝的是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計算時使用的是 IBM 或蘋果膝上型電腦，而電腦使用的作業系統是視窗 98，電腦的中央處理器是 Pentium ，電腦接通了思科網路系統。所以，也許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全球化和美國化有很明顯的界線，對於其他人來說，這界線可就沒有那麼明顯了。在大部分社會，人們看不出來美國力量、美國出口、美國的文化衝擊、美國文化輸出和最基本的全球化有什麼分別，現在這一切都混合在一起了。¹⁰⁰

綜上所述，在冷戰後美國獨大的全球秩序下，目前的全球化儼然是一種屬於今日政治正確的時代知識圖式。在這個全球化知識圖式裡，西方現代化發展理論與美式的理性化效率概念是基本架構；以此，西方/美式的價值觀與文化得以鋪架出名為全球化的前路，使資本主義與西方利益順暢運行到全球每個角落。這樣的觀察角度常與西方殖民主義歷史相提並論，對於這種種全球地位與角色的不平等，的確貌似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且其觸及層面甚至於更深更廣。對此，以下將從資本主義殖民史的歷史觀察，審視殖民主義的面貌，並從後殖民主義的論述角度，分析屬於今日全球化時代知識圖式裡，全球性的不平等狀況。

⁹⁹ 轉引自 Toby Miller 著，馮建三譯，《全球好萊塢》，台北：巨流，2003，頁 209。

¹⁰⁰ Thomas L. Friedman 著，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台北：聯經，2002，頁 380。

第三節 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意識形態

十六世紀西方資本主義伴隨著大航海時代，開啟了世界殖民主義的地理版圖。在達爾文物種進化論的理論支撐下，帝國主義者將殖民行為的道德論述以之合理建構，將殖民主義描述為是西方先進國家進行了對非西方地區的「文明化」任務。在昔日殖民主義的論述中，人類的進化、發展是「合理」的邏輯，而基本假設前提則是：西方是現代的、文明化的與已啟蒙的，而「非西方」則是傳統的、野蠻的與愚昧無知的。因此關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係，資源奪取是物競天擇，對於被殖民地的文化建構則成為一種恩賜。

布勞特(J. M. Blaut) 解析殖民主義的內涵，說明基於「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殖民主義是關於當代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種強而有力的信仰。布勞特認為；

這一信仰的概念是，歐洲文明-- 即「西方」-- 具有某種獨特的歷史優越性，某種種族的、文化的、環境的、心靈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質。這一特質使歐洲人群在所有歷史時代直到當今時代，永遠比其他人群優越。這些信仰既涉及歷史又涉及地理。歐洲人被看做是「歷史的創造者」。歐洲永遠是先進的、進步的、現代化的。世界其他各地或者進步緩慢，或者停滯不前：屬於「傳統社會」。因此，世界有一個永遠的中心和一個永遠的外圈：一個內圈，一個外圈。內圈領先，外圈落後。內圈創新，外圈模仿。¹⁰¹

除了「歐洲中心主義史觀」之外，布勞特認為「地理傳播主義」是構成殖民主義世界模式的另一知識支柱：當文化在人群中發生變革時，可能是在這人群中有了發明創造，也有可能是由其他地區或其他人群，傳來了某種思想或物質影響所致。第一種事件稱為「獨立發明」，第二種則稱為「傳播」。這兩種情形在各地

¹⁰¹ 布勞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頁 1。

發生，影響交互作用。但是有些學者認為，人類文化的變革起因於獨立發明的情況不多，人類大多數是模仿者，不是發明者。因此，他們認為傳播是主要的變革機制。在這類布勞特描述的「傳播主義者」的學者眼中，世界上存在著程度不一的群體，其中僅少數是優越的，具有發明創造力，而其他大多數都是資質有限的跟隨者。因此當發現到某地區一項文化發明時，他們總是極力地試圖從其他地區找尋文化傳播的過程，尋找最初的痕跡。¹⁰²在十九世紀的世界地理圖式裡，傳播主義者的世界觀可見如下：

表 3-1 十九世紀傳播主義者的世界觀

核心地區的特點	外圍地區的特點
富有創造力	沒有創造力
富有理性、智慧	沒有理性、感情衝動、本能
理論推理	經驗主義的推理、實際的推理
心胸	體軀、物質
紀律	自發
成年	少年
理智	非理智
科學	巫術
進步	停滯

引自布勞特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頁 19。

殖民主義在歐洲中心主義與文化傳播主義的核心思考下，將所有「非西方」一體以「他者」目之。在「西方」的眼中，資本主義的運作伴隨著歷史天命般的殖民主義，不但成就了帝國的功業，更進一步解放了反智與窮困的「非西方」。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對於被殖民地與被殖民者而言，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於種族與人口等，均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全面性影響。

¹⁰² 關於十九世紀文化「傳播主義者」，布勞特提出兩點基本指責：a.文化傳播主義者關於人類的創新能力的觀點過於苛刻；b.文化傳播主義者都是精英主義者。此部份論述詳見布勞特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一書第一章 歷史淵源。

第四節 殖民主義的轉變

接續殖民主義而來的，是二次大戰後新的世界局勢的演變，所謂的新殖民主義。一般而言，二次大戰前的殖民主義，是指西方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上與非西方國家間的互動與相處模式，這種「互動與相處模式」，主要是以軍事武力所形致。而新殖民主義指的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上的互動情形。在舊殖民主義時代，非西方國家在主權的行使上是被西方國家透過以武力或軍事力量徹底或部分取消或替代的；而在新殖民主義時代，西方國家雖然放棄了以武力來挾制非西方地區的主權行使，並且使非西方國家取得形式上的主權獨立，但卻透過另一種政治力或經濟力的行使來制約第三世界國家，使其在政治、經濟上並未獲得實質上的獨立狀態，換言之，主權在實質上並未獨立。¹⁰³

總的來說，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雖然在殖民手段，以及主權的掌控方式上有所差異，但約略可以被視為是一組概念。在這組概念裡，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各種殖民方式，其重要目的都是透過政治、經濟的掌控，行攫奪資源以利益殖民母國。對於殖民主義的批判與辯證，也衍生了許多相關論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即是一例。¹⁰⁴歷經國際局勢與全球環境變遷之後，殖民主義研究者開始將關注焦點由為殖民政治服務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轉向集中到文化向度的研究上，薩伊德是重要代表。薩伊德將殖民者/被殖民者二元論述與批判西方啟蒙理性相結合，分析道：「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還有一種承諾，一種不斷循環與再循環的承諾，它一方面允許有教養的男女接受偏遠領土與其土著民族應該被統治的觀念，另一方面為了使這類高尚人士可以將之視為是一種長期的，且幾近形上義務的去統治附屬、劣等或不進步的民族，所以重新補充宗主國的能量。」¹⁰⁵

¹⁰³ 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頁 1-4。

¹⁰⁴ 關於對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批判，描述西方與非西方不對等的政治、經濟互動關係，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有關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論述內容。

¹⁰⁵ 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0，頁 43。

第五節 東方主義的啟示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引用了馬克思(Karl Marx)的話為開端：「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這句引言即已點明了薩伊德開啟後殖民研究的核心企圖。薩伊德企圖藉由對於《東方主義》的研究，指示出既存已久，西方文化霸權下的人造(man-made)產物——一種名為東方的「他者」。關於《東方主義》書寫的任務，薩伊德試圖以傅科與葛蘭西的理論作為出發，進行西方文化霸權的知識 權力圖譜檢視。其中啟示取自「傅科在《知識考古學》中強調西方近代知識建構與權力獲取之間的關聯，葛蘭西則是強調知識建構與統治正當性基礎之間的關係」。¹⁰⁶對此薩伊德自述：

我的計畫是，描述一套特殊的思想體系，但絕不是要用一套新的來取代這套體系。此外，我也嘗試著提出一整組在討論人類經驗問題時的相關質疑，即：一個人是如何再現其他文化？另一個文化是什麼意思？對於一個不同文化(或種族、宗教、文明)的觀念是有用的嗎？或者它要不是永遠伴隨著沾沾自喜(當一個人對自己品頭論足的時候)，要不就是與敵意、侵略性(當一個人議論「他者」的時候)有關嗎？文化、宗教以及種族上的差異，比起社會經濟的分類範疇，或者政治歷史的分類範疇更加要緊嗎？思想觀念是如何獲得權威 正常化，甚至是「本然」的真理地位呢？¹⁰⁷

一般認為，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是開啟後殖民批評的濫觴。儘管有些不同的意見認為，《東方主義》式的研究方式其實由來已久，這樣的研究方式早已見諸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不過如《東方主義》這樣起源於文學與文化研究，

¹⁰⁶ 李英明著，《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頁 73。

¹⁰⁷ 薩伊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頁 474。文中粗體字為原著標示。

繼而產生跨學科且深具批判意識的特定論述，卻是少見。總的來說，學術界仍然普遍肯定《東方主義》的特殊貢獻。Valerie Kennedy認為：「《東方主義》在英美學界英文文學研究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覷，為從未涉足於政治與經濟現實的傳統文學研究開啟了一個更為周延廣博的觀照視野。」¹⁰⁸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形式上是以考察西方古典文學文本的方式，進行西方霸權知識論述的檢視。內容主要是：首先，薩伊德所謂的東方主義，「即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層面，將這一部份表現與再現為一種論述模式」；再者，「東方主義是一種思想的風格，它是基於一個對『東方』與『西方』二者之間作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區隔的思想風格」；「東方主義可被分析討論成一個為了處置東方——透過陳述對東方的看法、提出有關的權威觀點、描述東方、教授東方、安頓東方並統治東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團制度(corporate institution)。簡而言之，東方主義便是為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¹⁰⁹基於上述觀察，薩伊德認為，必須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加以檢視，才能使我們理解到，歐洲文化自啟蒙時期以降，即是透過一系統性的規訓系統(discipline)，對「非西方」進行政治性地、軍事性地、社會學式地、意識形態地、科學地甚或想像式地管理東方，或甚至生產東方。

關於《東方主義》對後殖民主義的論述貢獻，乃至於對於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控訴，雖然薩伊德並未採取直接進行的寫作方式，但薩伊德從西方文學作品深入探討，而非循批判具體的政治、經濟途徑，反而更能直接戳刺西方統治架構背後深刻牢固的主僕二元意識。對此 Valerie Kennedy認為，在後殖民主義描述的場域裡，異文化間的宰制現象，正可說明殖民主義的身影不但未曾消逝，更有如幽靈般盤桓未去：

¹⁰⁸ Valerie Kennedy 著，丘彥彬譯，《認識薩伊德》，台北：麥田，2003，頁 42。

¹⁰⁹ 薩伊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頁 2-4。

雖然薩伊德並沒有在《東方主義》裡定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我們還是可以了解他所謂的殖民主義指的是一個西方宗主國中心對一遙遠地域的統御，這樣的統御意味著在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的層面上進行程度不一的管控和宰制；而帝國主義指的是在帝國主義的網絡之下各個領域所發展出來的論述——這些領域實則包含了貿易、旅行、探險、科學以及教化與傳教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上述的領域看似並非帝國主義活動的核心部分，但事實上它們在帝國拓展上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一旦一種文化想要宰制另一種文化時，其間所需的帝國修辭(imperial rhetoric)和表述泰半便是由這些領域來做供輸。¹¹⁰

《東方主義》研究帶來的啟示，讓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本質研究不至於因為形式結束而告終。《東方主義》的論述使得世界殖民史得以接續書寫，以後殖民主義之名揭示世界既存的宰制面貌。在帝國與殖民地之間，除卻武力橫奪之後，事實上並未解脫統馭宰制的鎖鏈。西方殖民主義並未結束，當二次大戰後亞、非，以及拉丁美洲各個被殖民地紛紛政治獨立之際，西方殖民主義旋即換上面具，以間接而幽微，但是更加深刻與廣泛的方式，繼續宰制與攫奪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殖民地。

第六節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與全球化權力論述

以上的說明清楚地揭示出，作為反全球化論述的發展，有幾項趨勢是明顯的。第一、今日的全球化，相當程度上等同於更進一步的「西方現代化」，甚至於更清楚的說，幾近於「全球資本主義化」甚或「全球美式資本主義化」。第二、今日的全球化，所賴以順暢運行的根基架構，是西方啟蒙理性以來所奉行的主流倫理與價值。如同近一世紀以來，整個人類世界在這套來自於西歐世界的、鋪天

¹¹⁰ Valerie Kennedy 著，丘彥彬譯，《認識薩伊德》，台北：麥田，2003，頁 49。

蓋地的知識體系土壤裡，「現代化」文明開枝散葉聚木成林。今日全球化現象的遮蔭，正是這一套強勢的知識論述系統，或可稱其為「全球化時代的知識圖式」。

第三、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作為檢視全球化時代的權力面貌，具有一定的啟示性。因為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論述，主要就是一種揭示霸權論述的方法論；再加上世界殖民主義的具體前鑑，所帶來的歷史感與啟示，都是支持從後殖民主義論述檢視全球化現象的重要理由。

後殖民主義，它探尋的是過去的殖民統治給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文化帶來的影響，以及這種殖民關係的衍生品和它在現今的表現形式和實際情況。它是一種跨學科而且具有批判性的觀念。後殖民主義起源於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和文化研究，而後來後殖民主義的發展則更傾向於批判西方的人文主義。¹¹¹根據阿旭克羅、葛立福斯、迪芬(Ashcroft, Griffith, Tiffin)在 1998 年所著《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一書為「後殖民」所下的定義，指出「後殖民」所包含的五種元素：

- a. 關於歐洲版圖征服的研究與分析；
- b. 歐洲殖民主義的制度建立；
- c. 帝國的論述操作；
- d. 殖民論述中的主體建構；
- e. 對殖民主義的抗拒。¹¹²

從上述五項要素中，可以發現到後殖民主義是一種無法缺乏歷史縱深的實證歸納，而且後殖民主義的基本結構指向西方霸權知識論述，以此檢證過去殖民史中深層層面，並以此推測未來。在後殖民主義對主觀世界的啟示方面，陶東風認為，就如同女性主義的策略一般，後殖民主義試圖以「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sing Europe)的方式消解西方中心霸權論述。後殖民主義批判的矛頭，指向傳統西歐

¹¹¹ 參見李鵬程主編，《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詞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 133。

¹¹² 本部份轉引自 Schech and Haggis 著《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一書，書中註明原始出處為 B. Ashcroft, G. Griffith, and H.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87.

知識的文化霸權，由於這個霸權的作用，非歐洲世界的知識就成為「被制服的知識」或「被剝奪了資格的知識」。後殖民主義論述「嘗試重新肯定非歐洲世界的認識論價值。後殖民主義對於非歐洲世界的『知識領土歸還』要求，其實質是拒絕把歐洲文化特權化、普遍化，指出歐洲的哲學與文化在提出普遍性要求的時候，從來沒有考慮非歐洲世界的知識，以及自己對於非歐洲世界的無知。」¹¹³

為了解釋後殖民條件下「殖民世界」的複雜性，有必要對於權力運作的複雜機制作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同於以往殖民主義的政治層面，後殖民主義主要側重在指出西方文化層面的支配宰制，因此許多後殖民主義相關理論均受到傅科權力論述的啟發。傅科的權力知識論述指出，雖然權力的內在本質是強制性的，但是權力的運作方式與過程卻往往是隱諱不明、無法輕易窺見的。對此陶東風進一步的論言是，關於後殖民主義裡的權力運作，「常常經過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自我包裝』。雖然權力可能透過強力的展示與實施而表現自己，但它更可能透過似乎超越的、無功利的文化啟蒙的面目出現。透過這一包裝，權力既作為政治的限制又作為文化的可能性而把自己呈現出來。」¹¹⁴

綜上所述，可以從後殖民主義論述印證到今日全球化的權力論述批判。許多理由顯示兩者有著一定的關聯，主要理由有關於歷史人類學、地理學的，以及身份認同政治等面向。在歷史人類學方面，殖民主義以後至今的殖民研究中，總不難發現以特定成見的人類學詮釋作為合理化殖民統治的案例，而這種類似的偏見不但在《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研究中唾手可得，更可以在許多全球化的「發展」論述(西方進化論價值)中得到呼應。此外，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問題在地理政治上也有著一定的關聯。在該領域中，本土化和全球化始終貫穿於嶄新動盪的地理學中，而全新的複合身份、流動性和邊緣性也在建構當中。¹¹⁵最後，在身份認同政治這個面向，不但是後殖民主義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在各式各樣全球化論

¹¹³ 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頁 51。

¹¹⁴ 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頁 14。

¹¹⁵ 參見李鵬程主編，《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詞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 133。

述中，例如文明衝突、生產與消費文化等，也同樣是論述的關鍵。整體而言，從後殖民主義所啟示的全球化權力論述，本身就是一道「去中心化」的途徑。這道途徑是從後殖民主義的批判角度，檢視今日全球化的種種面向，繼以透過檢視這些背後的基本假定，進一步描繪出全球化的知識圖譜，才能從當代特定的知識圖式中，窺見權力運作的斧鑿痕跡。

第七節 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對於全球化中的後殖民主義與新帝國探討，有其深刻的歷史感與批判意識，這項討論不應只是依循既往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層面，否則即容易落入如柏格等學者所言，成為了全球經濟重分配失敗者的託辭。¹¹⁶今日全球化「超越的、無功利的文化啟蒙的面目」，正遭受到「全球美國化」，甚或文化帝國霸權的嚴厲批判。類似的觀察和批評與日俱增，而且越來越多指控，直接將新帝國的惡名指向美國。南方朔即言：「大體而言，無論保守的右翼或國際主義的左翼(即所謂自由派國際主義)，都主張在這個美國獨強的時代，應儘速建造全球霸權。美國是個「例外」(exceptionism)，美國愛好和平，是普世人權價值的國家，因而美國霸權對全球是福祉；因而美國應實施「新威爾遜主義」(New Wilsonism)，做世界的良善主宰。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當今所謂的「全球化」、「全球秩序」、「大美國統制下的和平」、「美國單邊主義」等始可能被理解。」

117

除了傳統殖民主義的手段指控之外，今日探索全球知識與權力的面貌，必須針對資訊傳播與操控之工具——跨國媒體——進行研究。對此薩伊德一脈從古典文學中解析「東方主義」身形，到探討知識份子自身角色與使命等，可以看出薩伊德所關注的是權力運作的結構環境，以及中介角色對於權力散播與施為的作用

¹¹⁶ 詳見杭亭頓著，王柏鴻譯，《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台北：時報文化，2002。。

¹¹⁷ 南方朔著，讓樂觀的實踐從此開始，《帝國》，台北：商周，2002，頁16。

等。薩伊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論及今日全球權力面目時，以「美國勢力的勃興」一文，探討造就今日全球權力結構與中介角色的樣態。薩伊德批評強勢的媒體，為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扮演「製造共識」的特殊角色，促使訊息接收者感覺，該由美國人來矯正世界的錯誤之處，排除矛盾與不一致之處。這種權力運作的中介角色，薩伊德以歷史深度描述：

權力與合法性這對孿生兄弟，前者使人獲得對世界的直接支配，後者則在文化領域運作，兩者是古典帝國霸權之一大特色。在美國人的世紀裡，不同點在於其文化權威的成就上有重大躍升，這得歸功於資訊傳播與操控之工具有前所未見之快速成長。一世紀之前，歐洲文化伴隨白人的來到，事實上，其個人必須直接以君臨天下的態勢出現，現在我們則有國際媒體之展現，經常性的潛入意識認知之底層，涉及心靈的不同面向。若以全球性觀點來看，則「文化帝國主義」頗為中肯。

...無人可否定此種電子媒體權力的最大擁有者是美國，這或者是因為一些美國跨國公司控制新聞之生產、分配與篩選，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均頗依賴之，或者因為以美國為中心輻射出來的不同形式的文化控制以無可匹敵的方式擴張，創造一種合作與依賴的新機制，並以此強迫與降服不只美國國內社會，也使弱勢文化被迫屈服。¹¹⁸

薩伊德特別推崇幾位批判理論學者的某些作品，特別是馬庫色的單向度社會的概念，以及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概念等；並認為這些批判理論釐清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以壓制與容忍交互作用，以為安撫人心工具的真實面貌，同時這些批判理論也指明了，在社會美學的開展上，造成了文化單向度發展的結果。今日全球文化帝國主義批判，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正是全球文化同質化現象。同質

¹¹⁸ 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0，頁 546-547。

化理論(Homogenization Thesis)認為強權國家透過當代大眾媒體的文化生產，以及標準化的消費文化全球行銷，使世界各角落看起來都大同小異，同時也導致了全球化。若以此同質化理論來進行文化帝國主義批判，今日的全球化實則是強權國家挾政經勢力與科技革新，將其本身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散佈於世界各角落，並創造了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化經濟依賴。簡而言之，今日的全球化面貌，代表了帝國的再現，以及殖民經驗的再生。¹¹⁹

透過文化帝國主義的警語，全球化彷彿浮現出另外一個讓人憂心的面目：是否將如馬庫色所言，人類將同一在難以察覺的資本主義宰制裡，成為「單向度的人」？文化帝國主義所對照的是文化認同的問題，特別是身份認同的政治問題。置身在全球化下的後殖民景況中，為了解脫「單向度」的牽引力，這是必須覺察與省思的核心議題。

第八節 結語

許多人直接將今日全球化的文化消費與經濟流動，比擬成有如昔日世界的殖民主義一般。歷史上距今不遠的殖民時期，的確與今天全球化景況有許多容易聯想的地方；例如，兩者都是在一種歷史上相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背景下，為了實現更多、更高的商業利益需求而進行的行動。所不同的是，昔日殖民時代，看得到鮮明二元的殖民母國與被殖民地，說得出清楚的利益剝削面貌，以及具體的武力脅制與不平等的明文條約等，而在全局化語境脈絡下，這一切不平等的面目，今日卻是模糊不清，成為爭議與論辯的戰場。事實上，這種全球化與殖民主義的類比，當然無法令所有人滿意。觀察許多全球化現象，以及經過許多全球化論述的辯證之後，必須承認將全球化與殖民主義作如是直接且高度化約的指摘，並不是一種完美的說法。但無法否認的是，證諸今日世界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全球化的今日與殖民主義的過去，確實令人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對應想像，加以後殖

¹¹⁹ 參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榮元等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7。

民主義的啟示，使得全球化倒影出另一種曖昧不明的身影。

致力於考察今日文明的知識圖譜，是為了揭露全球化政治正確背後的基本假設；只有清楚地分析這種種基本假設，才能真正辨明全球化權力場域中，權力的面貌與運作軌跡。全球化對於各地固有與在地文化有重大的影響，是無論何種立場者，都無法否認、或視而不見的。曾經經歷長久殖民歷史的台灣，在經濟發展有些成績之時，懵懂中正以期待身份確認的熱望敞臂迎接全球化。誠如蔡源林所言：「薩伊德 所提出的議題不只對學術研究有價值，也在世紀之交觀察全球化的大局勢時，提供台灣社會一個另類而重要的參考點。」¹²⁰事實上，台灣的世界身份，不僅無法單以全球化世界分工體系的角色呈現，更應該藉取後殖民主義的啟示與反省，進一步關注真正身份認同的核心 文化內涵。本章內容藉由對後殖民主義的探討，為全球化的見解帶來較多元層面的反省與啟發，並將在接續的章節裡，進一步探討全球化下的文化消費與身份認同，俾使在台灣一片全球化歌詠高聲中，能細聞到全球文化霸權的征馬蹄音。

¹²⁰ 蔡源林著，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0，頁16。

第四章：文化消費與想像的全球化共同體

等待被消費的物品和經驗早已包裝完畢，早就做好分門別類了。只等著消費者的回響。

Robert Boccock¹²¹

虛構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

Benedict Anderson¹²²

從後殖民主義等論述的啟發裡，可以發現到在全球化的權力場域中，的確存在著知識權力的不平等，以及中心/邊陲的文化失衡狀態的。許多後殖民理論家，甚至直接將後殖民主義稱為「文化殖民主義」(Cultural Colonialism)，來指稱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狀況。¹²³在許多關於全球化的憂慮中，最常被提及的「文化霸權」、「文化帝國主義」等，所引發的恐懼主要來自於文化主體性及自我認同的模糊。樂觀的支持者將全球化訴說成一個人類共榮的全球共同體，是一個世界大同的美景；擔憂的人則害怕在世界大同的全球化文化裡，將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認同。

真正聯結共同體的關鍵力量，往往是一種對於共同價值的認同，以及對於自身與群體間所想像的共通處的投射，或是對這種所想像的共通處的嚮往與追逐。從這個概念所延伸的，是關於「全球化」這個語詞的深入思考，只要從這個角度稍加審度，就不難發現，全球化正是一個「想像」建構的「共同體」。全球化一

¹²¹ Robert Boccock 著，張君玖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81。

¹²²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36。

¹²³ 見陶東風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第一章。

詞，讓人們找到一種突破國家、民族的方式，找到一種新的認同。如同冷戰時期，世界被種種諸如自由民主、共產主義等因子「凝聚」成幾個共同體一般，而這個新的全球化「共同體」，究竟是凝聚在什麼因子之下呢？又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是怎樣的建構過程呢？

全球化無法是一個特定、客觀與量化的具體存在，相反地，全球化一詞真實地存在詮釋學中，是一種特屬於全球化權力的語境與脈絡。全球化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一如民族主義的情境一般；而在全球化時代，取代了血液與語言，扮演起凝聚文化共同體的因子的，卻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的文化消費。在 John Story 的分析中，當代的文化與身份認同是一種多元與流動的認同(multiple and mobile)，而文化消費正是用來闡連文化認同感的關鍵。¹²⁴本章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重點，分別是全球化文化消費與全球化身份認同。結構上由前述章節對於全球文化霸權的質疑，進入探討全球文化消費所帶來的身份認同政治問題——新的全球化權力技術，吸引人們追求新的身份認同，並以此新的認同反身確認自己的價值。

本章內容將以此為論據，說明文化消費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與遊移的個體之間，扮演牽繫身份認同的關鍵質素。

第一節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當代的通訊與種種科技進步，將世界帶進到全球一體美好想像裡。全球化的許諾，最動人的是彷彿人類擺脫了階級與種族的桎梏，邁進到共榮的境地。但不論全球化可以許諾給世界什麼，有一件最真實的事實，那就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00年，右派的加拿大聯盟(Canadian Alliance)候選人貝蒂·嘉蘭格(Betty Granger)一番「亞洲人入侵」(Asian Invasion)的言論，讓人憶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黃禍」(Yellow Peril)一說，事件發生之後，她被迫辭職。在她這場演說中，有一句與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結構高度相關的重要用

¹²⁴ 見 John Story 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1。頁 173-201。

詞，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當提到在卑詩省外海被攔截的中國移民船時，她說：「我們領悟到，從這些船上下來的人，並不是我國最想要的客戶(clientele)。」¹²⁵

如同上例所示，有一種我們熟悉的全球化，講的是一種全球的分工與銷售體系，那可能是歐、美、日等國企業投資，東亞國家代工生產，全球各地銷售。事實上最赤裸真實的，可能是：用美國來行銷身份認同、用中國來壓縮成本、用通訊新科技來擴大全球市場。在這種全球化中，世界上的人被依地區、國家等領域，區分為低廉的勞動力、高技術性的勞動力、高科技產品的消費市場、大宗物資的消費市場、以及具有潛力的待開發市場等。這和現代化大眾消費時期當然不同，但卻又隱隱約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消費史上的大眾消費時期，最大特色是生產的勞工脫離了生產者單一角色，同時也被視為是行銷的主要對象。那是一個相對單純的階級模型，簡單地說，就是改造勞動力大量生產、納入勞工階層以擴大市場。事實上，勞工階層經由消費能力的改善，也漸漸地模糊了原本清晰的階級意識，進而融合進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更加速轉動資本主義的邏輯運作。

在當代的全球市場體系裡，歐美工業發達國家積極開發世界各地的勞動市場。這些原本消費能力有限的勞動市場，近年來可以吸引到世界上龐大資本家的青睞，除了其低廉的勞動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資本家眼中，這將會是最具潛力的消費市場。如同二十世紀初，亨利·福特(Henry Ford)運用生產線、專業機器，以及提高工人的工資，就是為了要把汽車賣給一般勞工家庭。從消費史上大眾消費時期的思考邏輯，以及其後種種現象，對照到今日複雜的全球化理論，似乎可以看到一絲簡單的脈絡。

¹²⁵ 本案例轉引自 Naomi Klein 著，林淑媛譯，《破窗》(Fences and Windows)，台北：時報，2004，頁 87。

第二節 文化消費與身份認同

一、消費簡史

在現代化的早期，消費者的身份主要被界定是身屬某種團體的一員。在團體中的消費者，消費模式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得各種社會身份團體¹²⁶得以區隔。在這個階段中，「消費的過程也可以提供他們一定的社會認同感。這種消費者團體，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在十九世紀末的西歐和美國。」

¹²⁷

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觀察到一個獨特的消費現象出現，那是早期的現代都會模式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造就許多城市以工業發展為中心快速成長。城市中的一切，舉凡食衣住行，皆是為了滿足這些新興城鎮居民而生。其中特別的是，別於以往，這些新興的城鎮居民是更消費得起育與樂的消費團體。為了滿足這些新興消費者的社會需要與心理需求，出現了許多消費場所如劇院、音樂廳、運動場與電影院等。這些新興的消費行為與消費場所，漸漸形成趨似今日高度資本主義世界的熟悉面貌。

在城市生活發展之際，個人與個別團體已漸漸藉由消費能力，從早期的宗教或階級團體的刻板形象裡脫胎而出，不再拘守於身份團體的固定模式。這時消費有更特別的意義，藉由消費，消費者一方面可以投射對特定對象的認同，另一方面也追求個別的獨特性。舉例來說，中低階層與勞工階級有能力在某些方面仿倣上流社會的消費方式，以取得階級越界的滿足；而上流社會身份團體的人士只好一再地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以維繫自身階級身份的獨特性。對此，社會學家的詮釋是：「為了扣合一種認同感，為了想成為自己所希望的人，大城市的個人投入消費。同時，個人用以標示自己特點的身體裝飾和服裝，必須接受別人的詮釋與理解。所以，唯有當一個人和別人共享了某些文化符號，他才可能藉由某些方

¹²⁶ 有關「身份團體」與「社會身份」等詞語的翻譯與運用，請參見第一章緒論註釋 27。

¹²⁷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28。

式去突顯自己的獨特性。」¹²⁸

二十世紀前葉，工業發展的技術與規模，使得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大行其道。新興資本家從工業生產中致富，資本家將財富再投入工業生產，經過獲利、投資、市場規模擴大、再獲利、再投資。這個古典經濟學式的乘數效果，出現了新的「大量生產與大眾消費」的新消費模式。這個模式以美國的福特汽車為顯例。在這個「福特主義」的模式中，消費最大的轉變是，消費者不僅是消費者，同時也是消費品本身的生產者；當然這樣的描述是象徵性的，並不是說所有的福特汽車買主都同時也是福特汽車的員工，而是指廣大的生產勞工，已經被「鎖定在一個新興的，尚未分眾的大眾市場。」¹²⁹

歷經 1950 年代那個大眾消費的年代之後，尤其是在 1970 與 1980 年代期間，出現了一些強調「生活風格」的新消費者。這些新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並不受到年齡、性別、種族或職業等的限制，而是以「對外的認同」為消費依據，並據此形成所謂的「生活風格」，例如青少年族群認同的衣著、娛樂或體育活動等。「這些內在動力的影響所及的是：團體成員的認同感的社會建構。認同感的建構，可以說是一種運用消費品的過程，這種消費模式可以成為判別自己人或外人的主要手段。」¹³⁰

在社會學家的研究中，1970 與 1980 年代迄今的當代消費社會，是一段獨特與複雜的新階段，有一種較普遍的說法是「後現代」的消費情境，以區隔前述的「前現代」、「現代」等大眾消費傾向。對此社會研究者費勒史東(Featherstone)描述：

¹²⁸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33。

¹²⁹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37。

¹³⁰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47。

「生活風格」一詞最近正流行。在當代的消費文化中，它所指的是個性、自我表現，以及風格的自我意識。一個人的身體、衣服、話語、休閒消遣、飲食偏好、住家、車子與假期去處等等，都可以說標示了擁有者/消費者的風格與品味的個體性。我們正邁向一個沒有固定身份團體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選擇生活風格(展現在你所選擇的衣服、休閒活動、消費品與身體裝飾)不再需要配合固定的身份團體。¹³¹

因此，各種社會身份團體已不再足以決定消費的模式，某些消費模式也不再特定歸屬於某些特定階級。消費失去穩固的階級象徵，反之，成為了不同身份、階級間遊移流動的載體，不同社經階層身份的人士，只要有錢，人人得以藉由消費，展示自己的生活風格，用自己的「身體、衣服、話語、休閒消遣、飲食偏好、住家、車子與假期去處等」體驗自我的想望與認同。在許多社會學家的觀察，當代的處境是：「結合資本主義之經濟型態與強調自由的民主政治體制，將繼續成為主導整個世界發展的基調。在這樣的歷史格局裡，特別是促動符號消費的結構性力量日益茁壯之際，我們看到，社會理路的基調已逐漸從『生產』面轉到『消費』面。」¹³²

二、文化消費與認同

在傳統的觀點裡，認為「認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是生物性與血緣的，例如種族、宗族等。還有另一種看法，認為「認同」是一種天生命定的特質，例如階級或性別地位等。這裡頭有生理的，也有社會層面的，但最大的特點，是固定的與無法選擇的。

自「大眾消費」時期以降，消費行為就開始成為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如前段「消費簡史」所述，工業高度發展後的大眾消費時期，消費提供了階級跨

¹³¹ 轉引自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玖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51-52。

¹³² 葉啟政著，《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2001，頁 179。

界的可能，此時消費與認同已經有了聯繫，藉由消費，以及其他的各種因素，身份認同漸漸脫離了傳統以來的命定範疇，形構過程「從存有到化成」(being into becoming)，身份認同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演化過程。¹³³

及至當代，出現了第三種身份認同的面貌，John Story 稱其為「演出的自我」(performative self)：「根據此一看法，認同並不是固定一致的，而是在不斷化成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但永遠處於未完成的狀態，無論就未來或過去而言，都不完整。」¹³⁴當代的身份認同模式，除了突破傳統認同的生理與環境固定範疇，也不只拘限在一元的發展路徑；其不但隨著社會脈絡變動，而且是多元變化的「演出」過程。相關上述身份認同的階段，以簡表分析於下：

表 4-1 不同時期的身份認同建構模式

傳統認同	現代認同	後現代認同
固著或限定的自我 (Fixed or Limited Self)	從存有到化成 (Being into Becoming)	演出的自我 (Performative Self)
只有開展，而沒有改變		自我是一個變化的過程
獨特的		多元的
中心的		去中心的
完整的		不完整的
在文化之外建構		在文化之中建構的
普同的		歷史的

引自 John Story 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1，頁 183。

身份認同在當代與文化消費息息相關，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內部邏輯中找到印證。在高度工業化的環境中，所有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務，都成為工業化下的產品，也就是資本主義裡的商品。透過消費，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喜怒哀樂、人生幸福與否。同樣地，今日的身份認同，也是透過消費，特別是文化消費，來取得自我的認同，也取得他人與社群的認同。John Story 在討論到文化消費與認同的關係時，如此說明：

¹³³ 見 John Story 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1，頁 182-183。

¹³⁴ John Story 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1，頁 183。

文化消費如今已是一種存有方式(a mode of being)，一種獲取認同的方式(a way of gaining identity)。我們的認同有部份建構自我們所消費的東西——我們所聽的、我們所看的、所讀的、所穿的等等。如此一來，就像舍瑞普所觀察的，「市場 提供了製造認同的工具」。¹³⁵

「市場提供了製造認同的工具」，這句話點明了現代社會消費與認同的關聯，也可以看到，今日全球化下人們所面臨的身份認同處境問題。全球化的市場結構面向，必然使得身份認同問題無法逃離消費面向的討論，特別是文化消費，一種將文化以工業生產的方式在中心生產，而邊緣消費的「新大眾消費」模式。

三、文化消費與布迪厄的資本場域理論

當代全球化環境中，文化消費品的擁有者/消費者藉由文化消費來展示自我的風格與品味，更以此來累積與標示自己的社會身份。這個在昔日必須以具體血統或階級證明的特質，在當代只要經由文化消費，就可以做得到；換成以布迪厄的資本理論來說，就是將現有或將來的「資本」，藉由文化消費的方式轉換運作，以成就自己想望的社會身份。¹³⁶

許多學者的研究認為，在分析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結構時，包括分析消費文化與文化消費等，「資本」是必要的基本概念。

早期的資本主義，將資本定義在生產面的結構角色探討，「資本」等同於生產機具、場租、原物料等成本的代名詞。另一方面來看，也就是說，「資本」不論是以貨幣、股份或債券等形式存在，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裡，它可以經由轉換成

¹³⁵ John Story 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2001，頁 185。

¹³⁶ 「社會身份」(social status)，是韋伯在現代資本主義分析裡所發展出來，用以區分經濟階級分析的社會學概念。依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詮釋，Status 一語與 Class 不同，class 一詞包含三種主要的社會意涵：group(群、組或類)、rank(階層、階級)、formation(形構群)。Status 不具有明顯的 group 或 formation 的早期意涵；它是一個新的、現代化的語詞，只具有「階層」(rank)這方面的意涵，而與「世襲的階級」沒有正式的關聯。這種用法可以追溯到韋伯對馬克思的階級觀念之批判。參見威廉斯著，《關鍵詞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一書，頁 379。

生產製造的原素，來展現其重要的存在價值的。因此，「資本家」與「勞工」是單純二元區分的概念。在這個階段裡，「資本」的價值在生產層面展現，而勞工則在生產邏輯上被區分為某種生產成本，這時的勞工若說與消費有關，也僅僅能夠扮演以薪資購買基礎生活用品的消費者。

後期資本主義的變化，漸漸複雜且模糊了「資本家」與「勞工」二元區分的概念。一方面勞工收入較之以往有效提高，擁有資產的勞工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企業股份公開發行的制度，也讓勞工的身份有了跨界流動的機會。整體而言，早期的「資本」與生產成本的等同歸類分析，以及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勞工的二分法，如果仍一派延用，在現實環境中容易流於片面且刻板武斷。

布迪厄的「資本」理論與「場域」(field)概念可以是跳脫單純的經濟結構面，有效地解析當代「社會空間」結構裡各種利益價值的方法。布迪厄的資本概念大致上可區分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而「場域」則是一個被結構的社會空間，布迪厄所用的「場域」概念並非四周圍以籬笆的場地，也非「領域」(domain)的意義，而是一種「力場」(a field of forces)。¹³⁷在這個力量的場域裡，存在著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每個人為了轉移或保持在場域中的位置，「在這個圈子的內部，每個人在他和其他人的競爭裡投入他能掌握的力量，而且，這個力量定義了他在場域裡的位置，也相應地，定義了他的許多策略。」¹³⁸這些力量的投入與征逐，也就是布迪厄的「資本」概念運作。

傳統以來，「資本」一詞慣於被放置在市場運作的架構之下運用。而在布迪厄的「資本」理論，則是以「場域」概念作為資本運作的基礎架構。「以概念的發展而言，場域乃源自「社會空間」(social space)的概念。布迪厄以「社會空間」來指涉社會世界的整體概念。在布迪厄看來，社會空間就像市場體系一樣，人們

¹³⁷ 邱天助著，《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2002，頁120。其中布迪厄的「場域」概念原法文用語為“champ”。

¹³⁸ 皮耶·布赫迪厄著，蔡筱穎譯，《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élévision)，台北：麥田，2000，頁92。

依據不同的特殊利益，進行特殊的交換活動；而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的，這些場域如同市場一樣，進行多重的特殊資本競爭。包括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在布迪厄看來，人類活動的目的在於各種不同資本的累積和獨占，以維護或提昇在場域中的地位。」¹³⁹

四、文化消費轉化為「社會身份」的資本

同樣一組概念，也許有許多種意義，主要在於詮釋者的角度不同，以及所對應的理論架構互異所致。在跨國企業家的眼中，全球市場裡確實存在著許多種屬性的消費市場，如同金銀銅鐵等礦脈，靜待挖掘開發。相對地，在社會學家的分析裡，現代的消費者所進行的文化消費行動，是一種「欲望」的對應關係，而非僅關聯到供需、生產、貨幣等基礎經濟問題。今日的消費者，進行的是一種社會活動；藉由文化消費，消費者得以標誌出自己的「社會身份」：

一個社會身份團體的定義是一群以某些特定方式行動的人，包括群體內的通婚，以及接納某些人、排斥其他人的社會機制，以便維持他們獨特的社會群體。這不僅包括了餐桌禮儀或說話方式之類的瑣事，反之，為了捍衛一個身份團體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動用武力。在定義上，一個身份團體有其特有的生活、飲食、穿著、娛樂的模式，簡言之，就是消費的模式。藉由這些模式，一個身份團體可以在自己 and 社會中持有相同文化價值的其他人面前，定義他們的成員、維持他們的身份榮耀以及社會與文化自尊。¹⁴⁰

比如傳統的皇室身份、貴族階級的生活品味，乃至於近代以來的政界高層等等，都可以看出這種種階級結構底下，不同社經階層的人如何藉由消費，清楚地

¹³⁹ 邱天助著，《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2002，頁 121。

¹⁴⁰ 轉引自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等譯，《消費》，台北：巨流，1995，頁 15-16。

界定出「社會身份」的差異。事實上，消費除了可以用來定義自己的階級所屬，更可以在必要的時候，作為跨足不同階級界域的觸媒工具。比方說，當皇室，乃至於政治領袖想表現親民、爭取人民認同時，往往會藉由進行一些中低階級的象徵性消費，來達到目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政治領袖刻意在媒體前身著平民服飾、在路旁小店消費小吃飲食、到球場消費屬於中低階級趣味的棒球或美式足球等。當然，無時無刻的另一種跨界消費也在發生，平民百姓藉由消費(或做效)貴族階層等的消費品，例如標榜皇家享用的御膳品、購買貴族名人偏愛的汽車品牌、或是進住與政界名流為鄰的豪宅等，來達到晉升較高階級的渴求。

當代的消費者以自身的經濟能力消費各種商品，這些消費品除了提供某些基礎的功能性用途之外，更重要的賣點，是這些消費品具備有文化消費的特質，它能夠提供給消費者象徵某種社會身份的「附加價值」，甚至於許多時候，這些「附加價值」反客為主地成為消費行為的主要動機。以許多社交場域為例，這些「附加價值」可以讓一位中等收入的受薪階級，經過一身名牌服飾的妝點，自己充滿著自信與想像，也得以在晚宴派對裡受到稱意的對待，雖然這可能需要付上一段時日的信用帳單。名牌服飾在許多社交場域起著「象徵資本」的作用，而且身著得體名牌服飾，更能襯托即將展現的「文化資本」，例如優雅的品味與豐富的學養等。在許多社交場域中，這些「資本」將可能有效地轉化換取如人脈等「社會資本」，而經過各種資本模式的累積與轉換運用，假以時日，正是在特定「場域」中獲致更多「經濟資本」的能源。如此看來，文化消費作為界定當代「社會身份」的重要質素，幾乎等同於布迪厄的資本理論運作模式，即布迪厄所言：「所有資本雖然皆以經濟資本為根基，但資本的最大效力是彼此的可轉換性；而功能的發揮，卻有不可完全取代性。」¹⁴¹

¹⁴¹ 轉引自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2002，頁 130。

第三節 身份認同與全球化想像的共同體

在行銷的概念中，打造商標/品牌與廣告宣傳常常交替使用。商標/品牌除了是一件商品、或一家企業的核心意涵，而廣告宣傳則可視為是一種工具，被用來推動與普及這項意涵。廣告宣傳的任務，主要有兩件事，這同時也是打動消費者的關鍵：首先，廣告宣傳必須做到建立商標/品牌的認識與認同，繼而，運用任何手法進行宣傳，使人們相信假使用 A 取代 B，生活會更加美好。

基本上，全球化下的當代，我們消費的其實正是商標與品牌，這種消費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身份與處境的認同與想像。安德森用「想像的共同體」一詞來分析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意涵。在探究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時，指出「印刷 資本主義使得迅速增加的越來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並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連起來。」¹⁴²在這個角度的觀察中，安德森以書籍與報紙兩種印刷形式為例，說明在時間的理解上，如何轉化出對於一種「共同體」的想像。以報紙來說，當一件訊息或一種觀點，被刊登在報紙上，人們在閱讀的同時，也知道並想像著數以萬計(也許更多)的其他人也正在接收這樣的訊息——就如同是宗教裡的儀式一般，每一個參與者都很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儀式在同一時間正被為數眾多的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依樣進行著——「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髮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植根於日常生活當中，虛構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¹⁴³一如安德森所舉的例子，當某一人早晨拿起當天的報紙，瀏覽報上的新聞時，她/他所產生的認同感，來自於想像中「真實」存在著一個共同體，也來自於一種自身處於這個共同體的信心。從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形成，除了外在環境對個體的影響或統攝之外，更重要的，大多數的共同體的一份子，反向地由個

¹⁴²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37。

¹⁴³ 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36。

體自身向外找尋認同的投射對象，如此形成一個交互影響的循環，漸漸形構出日益穩固的共同體意識與認同。

在安德森的「共同體」論述中，真正關鍵的，是在於「想像」這個概念。安德森以「想像的共同體」一詞的概念，說明了民族主義與民族意識的形構過程。在這裡，共同體一詞較無疑義，它可以用來指涉各式各樣的群體，從族群、宗親、幫派、民族、乃至於世界與全球，無論大小，都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共同體形態。這些種種的共同體形態，並不純然都有具體的制約力量，最具體的群體如國家，這個體系可以用武力、行政體制等劃歸出領域及範圍，讓人清楚地辨識出自身的從屬。但其中真正聯結共同體的關鍵力量，往往是一種對於共同價值的認同，以及自身所建構與想像的團體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在今日早已超脫命定的血液與階級，成為可以爭取與被爭取的認同場域。今日當我們消費時，消費已不只是消費，更是一種文化消費，藉由消費而達到自己想望的文化認同與歸屬。全球化下的當代，我們進行的文化消費，提供給我們的就是一種全球化身份認同與歸屬，使我們能與「全世界」一起沉浸在全球文化之中。

第四節 文化消費形塑全球共同體

把布迪厄「場域」的結構概念放大來看，文化消費在當代許多不同的場域裡，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現代化」場域裡，消費是關鍵的衡量指標；例如一國的國民平均所得，就是國民購買力的展現。另外，一國的醫療支出比例、教育支出比例、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支出比例等，這些總體消費的衡量，都是在「現代化」場域裡必須展現的條件。

及至當代的「後現代」情境，一種擺脫固有社會身份團體主宰的社會，後現代特屬的變異流動突破了原本的穩固身份團體歸屬，卻在更強大的世界資本主義牽引之下，漸漸地凝聚在新的強大磁場裡。「全球化」一詞取代了「現代化」，成

為「消費主義」(Consumerism)最新最時尚的依歸。¹⁴⁴在「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得到根本的確認，而這種文化消費的過程，本身也是異化與疏離的過程；原本想藉由消費「被接納」、「成為」現代化與全球化，質變為就是在消費「現代化與全球化」。

「全球化」場域的重要現象是全球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而全球化的關鍵動力則是因科技而致時空壓縮，使得人類感受到世界成為一個互動緊密的歷史新境。今日的全球化場域裡，一方面，文化消費的流轉與運用，也必須緊密扣合住這些特性，才能有效地累積成立足的資本。另一方面，文化消費本身也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部份，許多文化消費本身早已別無選擇地被嵌合在「全球化」場域的脈絡裡，「等待被消費的物品和經驗早已包裝完畢，早就做好分門別類了。只等著消費者的回響。」消費「全球化」如同一種身份認同，推促人們說英語、穿耐吉、吃麥當勞、喝星巴克，用 MSN、上 Internet 全球化對文化是一種認同宣傳，它讓人們相信假使用 A 取代 B，生活會更加美好。

筆記型電腦的廣告明星，在羅馬的古競技場上無線上網，感受世界的每個角落，告訴消費者無論身處何處，都隨時能與世界溝通。星巴克咖啡裡的紐約都會意象，使消費者感受中產階級的品味質感與波希米亞的寫意個性。麥當勞叔叔總是把歡樂帶給全世界各種族孩童，一起快樂地分享。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商標，不但總是出現在各式各樣國際體育賽事與娛樂事務場合，更成為服飾、文具上代表年輕活力的圖騰。最重要的是好萊塢，好萊塢電影工業輸出的美國文化影響之深與廣，對於消費者不但已不再造成文化衝擊，更使得消費者無法分辨全球化與美國化的界線何在了。

這些文化消費現象搭乘著資本主義與訊息科技革命的巨大雙翅，降臨在「全球化場域」裡的每個角落，建構成緊密的全球化共同體。這種「與全球為伍」的

¹⁴⁴「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一詞被用來指涉一種意識形態，在現代資本主義中，生命的意義被認為是在於購買東西和成品的經驗。在這樣的生命經驗裡，消費物品和經驗的美夢就是他們生活的動力。

文化消費認同，就是和安德森的「新聞報紙讀者的想像」例子相同，真正聯結共同體的關鍵力量，是一種「既陌生又非常親密」的群體想像，以及對於共同價值的認同。消費者的文化消費行為，夾帶了全球化的想像，更因此而成為了特定想像共同體的一份子，因此不只是咖啡，而必定要星巴克咖啡；只要是說英語的洋片(好萊塢的代名詞)，就是時尚與品味的休閒。這些文化消費會讓消費者感覺到，自己是身處在全球化裡的。文化消費成就了消費者晉身全球化的想像共同體殿堂，全球化共同體的認同於焉成形。

對於地區或國家的個體處境，其實亦是如此。倘若將全球化視為一個自由競爭場域，則其中的成員可以是個人、團體、地區、國家乃至於國際區域等。將全球化解讀為一個場域是合理的，因為在布迪厄對場域的定義範圍可以廣闊到文化、科學等。布迪厄認為每一個場域都有其自己的邏輯與規則，因此，在全球化場域中，小至個人，大到國家或國際區域等，也都是在某種對於全球化場域的認知下，累積與運用資本，進行競逐與策略運用。

如同個人藉由文化消費，印證自己的社會身份一般。群體、地區或國家為了證明自己在全球化共同體場域裡的社會身份，同樣也必須要進行許多文化消費，來換取自己的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以文化與藝術的消費為例。個人以經濟資本消費文化藝術，或多或少，將會轉換成象徵性與文化資本，可以幫助在某種特定場域內搭配其他資本，達到競爭的優勢。而地區與國家，對於這類的消費同樣也如出一轍；許多說明都指向，藉由這些文化消費，可以提昇國家整體形象，有助益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地區與國家也需要向自己證明，自己是身處在全球化共同體當中的。除了在現代化時期的經濟實力指標，更需要在「文化全球化」、「藝術全球化」的場域中消費，以證明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五節 全球化文化工業與單向度的人

對於全球化的質疑，有一種說法，即認為標準化的全球消費文化，使世界各角落看起來都大同小異，同時也導致了全球化。這是被稱之為「同質化理論」(Homogenization Thesis)的見解，這同時也引致「文化同質化」的聲浪，認為「全球化代表著帝國的再現、殖民經驗的再生。強權國家挾政經勢力和科技革新，將其本身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散佈於世界各角落，並創造了其他地區、國家的文化經濟依賴。」¹⁴⁵對此，反對全球化「文化同質化」說法的人並不以為然，而質疑「同質化」論者的觀察常常失之片面、武斷。也許定義並不容易，因為顯然雙方看到的與爭議的面向，並不盡相同。暫且撇開依此全面定義全球化的爭議，就當代的生活的諸多消費面向來看，「同質化」這樣的觀察確實有它難以完全否定的地方；如果說這樣的「同質化」理論在全球化場域中是虛假的，為什麼在現實經驗中，全球消費者的消費選擇會越來越相同？

全球消費者的選擇為什麼會越來越相同？葉維廉在一份分析香港消費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值得反思的觀察。在這篇由「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組成標題的文章中，葉維廉分析道，香港的殖民文化深植人心，即使沒有高壓統治，某種殖民者的價值體系是香港人心之所嚮的身份認同標的。葉認為，在有形與無形的殖民文化交相作用下，慢慢「整合出一種生產模式、一種階級結構、一種社會、心理、文化的環境，直接服役於大都會的結構與文化。」¹⁴⁶由此看來，這種結構過程，促使人們的「原民意識」漸漸弱化，起而代之的，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取代了大都會的結構中的身份認同「規劃」工作，規劃人們依文化消費所取得的新身份。透過物化、商品化等資本主義的價值交換邏輯，「文化」成為高度「工業化」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的結構環境中，宰制與規劃人們的生活，使人們融浸在認同焦慮與身份表徵的消費欲望裡。

¹⁴⁵ 參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榮元等譯，《文化全球化》，台北：韋伯文化，2003，頁 7。

¹⁴⁶ 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當代》，1990，52 期，頁 45。

葉維廉在這份研究中，以「文化原質的失真」(cultural inauthenticity)一語慨嘆人們不自覺的被同化，進而不自覺的被消費，也被迫消費：

為大眾消費而剪裁的產品，其本質由消費所決定。高度商業化所帶動的文化，是由上而下的一種統制，把利益的動機轉移到文化的領域，假文化之名，製造一種意識形態，作文化的一種內在消滅或變質。照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說法，文化的真義並不只在向人調整，必須同時對僵化的人際關係提出抗議。文化工業，以「進步」作為一種說詞，但事實上是「相同性」、「重複性」、「均質性」的一種偽裝。「進步」的說詞，是告訴我們：商業，在現代工業和技術的支援下，作了高度迅速的發展，給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享受，帶來了我們日夕追望的「幸福人生」，告訴我們現行社會就是「幸福人生」的體現過程，要人相信它，對現行社會的「秩序」不質問，不分析，要人遵從。遵從代替了自覺。¹⁴⁷

當代全球化的消費者，消費的行為與範圍隨著資本主義擴散而擴散，隨著社會身份的開放而日益繁複。但這種社會身份的「開放」，並非真正的「開放」；在高度資本主義的結構體中，種種社會身份就如葉文所言，是「為大眾消費而剪裁的產品，其本質由消費所決定。」因此，當代社會環境日益「開放」，「幸福人生」卻更顯得趨於「同一」。文化消費所換來的「符碼」，造就消費個體種種社會身份的資本，也同時牽引著消費個體自我認同。馬庫塞(Herbert Marcuse)以資本主義的結構層面觀察，指出結構中的消費個體如同浸淫在一種被結構所統攝的幸福意識(The Happy Consciousness)中。馬庫塞說：「幸福意識，即相信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並且相信這個制度終會不負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種新型的順從主義

¹⁴⁷ 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當代》，1990，52期，頁44-46。

(Conformism)，這種順從主義是已轉化為社會行為的技術合理化的一個方面。」¹⁴⁸馬庫塞用這樣的話來說明，在發達工業社會極權主義下，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在一切合理、封閉的俗化趨勢(desublimation)裡，甚至於不再有能力去想像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成為「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¹⁴⁹馬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或說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是一種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的發展，而非經濟學的論證方式，因此切入的層面更廣，而不會只拘限在效率、福利等部分。在政治上，當代發達工業社會成功地消除了對立的政治派別，實現了政治的一體化；從生活領域來看，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同化，在大家都分享了制度的好處之後，連提出抗議的基礎都不復存在；再看看文化領域，原本與現實疏遠的高層文化(Higher Culture)，不再能表達理想，而與現實同一起來。因此，在馬庫塞的眼中，這個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生活於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

在後殖民主義的批判中，阿多諾的「文化工業」論述，以及馬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權「進步」、「發展」面貌的兩項重要啟發。全球化文化工業將「文化」納入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邏輯中，生產出屬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一種名為「全球化文化」的產品。因此，在全球化的消費時代，若是為了追尋身份認同，只有跟隨全球化文化的腳步「進步」與「發展」，才能成為「全球化中的一份子」。

¹⁴⁸ 赫伯特 馬庫塞(Herbert Marcuse)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台北：桂冠，1990，頁 89。

¹⁴⁹ 首先要澄清的詞語是：「發達工業社會極權主義」一語中的「極權主義」，其與現今用法有所不同。在馬庫塞看來，「極權主義」的共同特徵主要不是表現為是否施行恐怖與暴力，而是表現為是否允許對立派別、對立意見、對立向度的存在。因此，馬庫塞在此指出的是，從政治領域來看，發達工業社會成功實現了政治對立面的一體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會繼續存在的政治派別。(參見馬庫塞著，《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頁 2。)另一個詞語是俗化趨勢(desublimation)，在此延用中譯本的翻譯。若從原文理解，馬庫塞的語意應是指一種大眾文化「去昇華」的概念，並非如中譯「俗化」一語較直接負面的傾向；馬庫塞以此作為「高層文化」(higher culture)的對照概念，並指出，「文學的某些重要觀念，重要形象及其命運 因其技術合理性，它們事實上屈從於流行在當代工業社會發達地區的俗化趨勢。」(參見馬庫塞著，《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頁 63。)

第六節 結語

全球化中廣受批評的特點之一，就是全球文化消費面貌的趨同，而且是大量的西方文化消費品入侵，淹沒了許多非西方的在地文化；而少數的非西方質素，若要在這個全球化浪潮下生存，則必須換裝成另一種「全球化」面貌，以饗西方口味。正如阿多諾的說法，這是「以『進步』作為一種說詞，但事實上是『相同性』、『重複性』、『均質性』的一種偽裝。」看似花樣百出的全球化文化，實則是在西方資本運作邏輯下的文化工業產品；單向度的生產邏輯大量生產，以提供全球化市場的大量文化消費需求。

全球化文化是否是歷史命定的前路？從今後全世界人們是否將成為全球化文化工業中，依靠文化消費確認身份的「單向度的人」？再由布迪厄的場域觀點分析來看，或許可以清楚辨明這個迷思。若是說「全球化文化是歷史命定的前路」，對於全球化場域裡的每一份子而言，這個說法並不公平。從許多角度觀察，今日的「全球化」裡頭存在著主導者/主宰者、跟隨者/被動配合者，以及許多間接或直接不受接納的局外人。主導者掌握資本，在已然有利於己方的架構下，修訂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對於主導者來說，自然傾向於將全球化文化論述成歷史命定的前路。對於跟隨者而言，一旦踏上了跟隨的腳步，只能亦步亦趨地，循著主導者所鋪架的軌跡前進。從這個角度來看，全球化文化並非是一條歷史命定的前路，但有時卻是因身份與處境而不得不然的生存選項。

今日全球文化帝國主義批判，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正是全球文化同質化現象。為求生存，許多人認為在全球化場域中競逐，消費屬於全球化共同體的認同，是必要條件，因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與文化場域中，全球化是一種強勢且時尚的社會身份；同時全球化身份也是當代經濟、政治、文化與藝術場域中，所不能或缺的象徵性資本。為了生存與「發展」，只有掌握各種必須的資本，才能在全球化共同體中爭逐身份與感受認同。

第五章 文化全球化與台北國際雙年展

明星策展人來到這個城市，帶著他的通訊錄，展覽作完時，也帶走他的通訊錄，藝術家在雙年展所建立的關係，是和策展人的關係，而不是和這個城市。

2004 利物浦雙年展執行長 Lewis Biggs¹⁵⁰

在地策展人從同台演出變成了「暖場歌手」，甚至到最後，連「唱自己的歌」的權力都喪失了。

2004 台北雙年展策展人鄭慧華¹⁵¹

借用一位台北雙年展策展人舉的例子。我們所買的 DV 等錄影器材，都會附上一份厚厚的使用手冊，教我們如何使用許多套裝的功能，讓我們能一個指令，就拍出一種看起來很「專業」的特定影像效果。這位策展人說：「你說它在控制你嗎？它也不是，它只是告訴你怎麼樣好操作。但是相對來講，我們就不斷地在被『馴化』，在被馴化的過程中，我們慢慢地習慣於對影像的看法，有沒有辦法開啟另一種新的觀看方式，讓我們更知道我們平常所看的，其實是有特定關聯在操控我們。」¹⁵²這個聯想非常有意思，的確，我們不就是處在不斷被「馴化」的過程嗎？我們一套一套地「消費」西方漸次演進的「現代化」，漸漸地失去了自己變花樣的信心與樂趣了；因為不待我們玩透，西方就會生產出更多、更新的模式，吸引焦慮落伍的我們去購買。西方自己生根，自己發酵，然後生產出新的

¹⁵⁰ 吳金桃，「打造一個根植於城市的「雙年展」 - 專訪利物浦雙年展執行長路易士 比格斯」，《典藏今藝術》，2004，147期，頁97。路易士 比格斯(Lewis Biggs)，本屆2004利物浦雙年展執行長，曾擔任英國泰德畫廊利物浦分館策展人(1987-1990)、館長(1990-2000)。

¹⁵¹ 鄭慧華，「我們如何面對現實？」，《典藏今藝術》，2004，146期，頁67。

¹⁵² 王嘉驥語，「2002台北雙年展- 世界劇場」座談會記錄，《現代美術》，2003，108期，頁46。

「套裝模式」，我們就不斷地 update，不斷地消費接下來的「升級版」、「加值版」，以及「全新改版」。

文化消費可以帶給個人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感受，也同樣是提供國家或地區全球化身份建構的消費品。台灣與其他昔日第三世界國家等，都面臨到今日全球化下的新競爭態勢。而在這個新的世界競爭場域中，台灣採取的策略是積極爭取西方主流論述下的身份認同。為了取得全球化身份認同，台灣必須要積極地與國際「接軌」。「接軌」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的西方主流文化消費，來「採購」自己的各種身份認同「資本」。如同陳界仁所言：「今天這個時代不管我們用『世界』或者是用『全球化』這樣的名詞，我們都很難去迴避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天的整個世界其實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掌控之中，我們其實就在這個消費世界的內部裡面。」¹⁵³而在這個世界的內部裡面，文化消費是取得社會身份的關鍵「策略」。

台北雙年展是台灣藝術界的盛會，也是台灣在世界當代藝術界的代表。二年一度的台北雙年展，自從 1998 年轉變形態以來，在藝術界與館方人員的努力耕耘下，漸漸地受到國際當代藝術界的注目，使台北雙年展成為台灣當代藝術全球化的指標性大展。當然歷屆以來，台北雙年展的成績與評價，各方見解或有不同，但在有限的資源之中，能累積到這樣的成績，是相當值得肯定的。本研究將以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與全球化「策略」為分析對象，以作為台灣身份認同在全球化知識權力技術中的角色佐據；因此在下述內容，並無涉及評價台北雙年展的展演美學成績，而是將焦點鎖定在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與全球化「策略」，以這些「策略」作為分析文本，進行台灣全球化權力技術下的身份認同政治解讀。

¹⁵³ 陳界仁語，「2002 台北雙年展- 世界劇場」座談會記錄，《現代美術》，2003，108 期，頁 39。

第一節 「雙年展」與「台北國際雙年展」

一、初試啼聲的「國際化」-- 第一(1992)、二屆(1994)台北雙年展

台北國際雙年展的沿革與由來，必須延伸到 1984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開辦的「現代繪畫新展望」雙年展。依照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說明，自 1983 年開館以來，「於揭櫫現代美術『前瞻性』、『國際性』以及『原創性』的理念下」¹⁵⁴，相繼舉辦了「中華民國現代雕塑展」、「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以及「中華民國抽象水墨展」等「雙年展」競賽活動。其中「現代繪畫新展望」雙年展，屬於不設限媒材、給予參賽創作者最多元表現空間的競賽項目。

1992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正式將「現代繪畫新展望」雙年展，正式易名為：「一九九二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繼之於 1994 年，舉辦「一九九四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以館方的說明，這項轉變的目的，是「針對原來的新展望競賽作一階段性的調整與突破。一方面期能鼓勵更多執著的藝術工作者參與，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呈現國內外當代美術發展風貌。」¹⁵⁵

就展覽的本質及內容而言，「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較之歷年來的「新展望」，並未有太大的根本性變化，其轉變也未如館(官)方說法般，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氣象。某些評論認為，「由『雙年展』這幾個字所產生的聯想，叫人在事後有些失望。但如果把它看作是『新展望』的局部改革，我們比較能對它有一些正面的評價」¹⁵⁶。的確，延續「新展望」以來的 1992 與 1994 兩屆雙年展，其實本質上與「新展望」幾無二致。至於上述評論中所謂的「局部改革」，指的應是雙年展在評審形式上的改變。自 1992 年起，台北雙年展將評審作業修改為初審與複審兩個階段，並將之定義為「國內審」(初審)以及「國際審」(複審)。「國內審」言下之意，自是表示初審一律由台灣的評審評判；而在「國際審」-- 複審的階

¹⁵⁴ 黃光男，館長序，《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

¹⁵⁵ 黃光男，館長序，《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

¹⁵⁶ 黃海鳴，談第一屆雙年展，《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 8。

段，則加入相當比例的外籍評審委員，與國內評審一起進行最後的評判。¹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以競賽作為展覽前提條件的階段，儘管參賽者與評審都有些外籍名單，形式上有了某種程度的「國際化」，但針對競賽與評審的制度，已開始出現檢討的聲音。這項競賽形式被質疑為；它成為許多創作者的目的，轉而限制了各種發展以及更多可能性。因此在這個階段已陸陸續續出現一些聲音，批評競賽制度，並進一步呼籲以「策展」形式，期能引起改變與擴大開放。比如1994年的「雙年展」複審委員林惺嶽即直言：「基本上，北美館的『現代美術雙年展』是頗具爭議性的展覽，以最保守的評審運作模式去應付充滿前衛性試探的參展作品，其矛盾及流弊自然造成源源不絕的後遺症。」¹⁵⁸1992年的「雙年展」初審委員黃海鳴更早一步已倡議「策展」，他說：「社會巨大改變是創作的絕好契機，此時我們沒有將伏流突顯出來，在廣泛層次上觀察不同思潮間的衝擊、辯證，或單純的消長，反而依據公平原則，在評審作業中，將那些可貴的『不和諧』掩蓋掉。我對『雙年展』的建議是，針對臺灣與國際互動的具體處境，討論出一些重要問題，及可能方向，並依此探訪、調查實際創作狀況，確立展覽主題，確立名單，邀請為下屆雙年展參展藝術家。」¹⁵⁹類似以「威尼斯雙年展」為本的「策展人」建言，也具體地出現在1994年的複審委員漢姆 斐利德筆下：「這一位特定的策劃人士，可以是美術館本身的展覽策劃者，但也可以由獨立藝評家、學者、或其他美術館專業人士擔任。甚至邀請一位來自國外的局外人來擔任亦未嘗不可。」¹⁶⁰

「國際審」與國際參賽者，顯然不足以代表台北雙年展的蛻變。經過兩屆求新但「乏變可陳」的台北雙年展，不但無法呈現出「國際化」，反而反對競賽評審制的聲浪四起；代之而來的，是另一種「國際潮流」的「策展人」模式興起。

¹⁵⁷ 事實上以往「新展望」並非清一色本土評審，也曾在1986年評審團中出現過一位國外評審名單，但亦僅此一次。

¹⁵⁸ 林惺嶽，評審後話，《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4，頁12。

¹⁵⁹ 黃海鳴，談第一屆雙年展，《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9。

¹⁶⁰ 漢姆 斐利德，一九九四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評審感言，《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4。

二、高舉主體意識的論述場域-- 1996「台灣藝術主體性」

較之以往，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有兩項值得重視的大轉變。分別是將台北雙年展的體質從「競賽評審」改變為「策劃」式展覽；另一項則是提出雙年展的主題論述。嚴格說起來，並不是北美館在本屆雙年展「做」了上述兩項改變，因為一旦北美館將雙年展改為「策劃」式展覽，隨之而來的，必定是要有展覽的主題的。¹⁶¹

本屆「1996 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除了是首屆轉型為「邀件參展」的當代藝術官方大展，最主要的焦點是其所標舉的：「台灣藝術主體性」。解嚴之後，台灣政治浪潮風起雲湧，蓄積經年的台灣主體性訴求，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躍上官方美術館殿堂。許多跡象顯示，本屆雙年展的「形」與「質」，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直接的關聯性。1994年底，台北首屆直轄市市長直選，在野黨候選人陳水扁挾高漲的本土意識，執政首都。其後數年，台北許多相關的文化改革措施，都伴隨著1990年代節節高升的本土政治氣氛，亦步亦趨。

先說「形態」上的轉變。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從「競賽評審」到「策劃」形態上的改變，除了對於競賽評審方式累積的批評與檢討之外，許多呼籲「策展」的聲音早已此起彼落。當年新任北美館館長張振宇多次提出，要辦「真正的雙年展」，在繼任代館長劉寶貴手中落實，將台北雙年展由「競賽評審」制改為「策劃」展覽。¹⁶²依前後兩任館長的說法，改變是由於「伴隨著八七年政治解嚴，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面臨空前快速的開放與自由化，整個社會洋溢著前所未見的活潑能量，這股力量也同樣呈現於台灣的當代藝術創作中。事實證明，以單

¹⁶¹ 翻閱此時大量相關文件與坊間出版品，尚未出現「策展」、「策展人」等中文詞語。以北美館當屆雙年展的出版品為例，都將curator一詞譯以中文「展覽策劃人」，因此，此處的「策劃」一詞，亦與後來習用的「策展」同義。

¹⁶² 張振宇謂：「真正的雙年展」一語，在許多出版品曾被公開引述。（例如：台灣藝術主體性《藝術家》，第254期，1996.7，頁238。）此外，在此要強調張振宇前館長對於本屆雙年展的重要性，是因為種種跡象顯示，這位本土意識強烈，行事作風爭議亦多的前館長，才是本屆雙年展風格與變化的主導者。例如此屆雙年展的館方出版品《1996 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代館長劉寶貴在館長序文中，即強調：「於是在前北美館館長張振宇先生的倡議之下，『一九九六雙年展』，正式轉變型態改採以訂定展覽主題的策劃邀請展形式展出。」另外，當時因政治風波爭議匆促下台的張振宇館長，在雙年展之後出版的北美館《現代美術》第64期，仍舊是本屆雙年展主題的主要論述作者。

一標準評審給獎的展覽形式，確難符合目前雖略顯紛雜但卻異常豐富，完全不拘形式的藝術表現。正式轉變型態改採以訂定展覽主題的策劃邀請展形式展出。」

163

再就展覽的內涵、「質」而言。本屆台北雙年展，以「台灣藝術主體性」為展覽主題，並在主題展覽下設三大子題：(一)系譜與檔案；(二)當代議題(包含「認同與記憶」、「視覺思維」、「環境與都會」、「情慾與權力」等四個項目。)；(三)市民美學。¹⁶⁴有別於一般的美術展覽，只展出作品以及簡要說明，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更企圖以全面性的歷史、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價值論述，為台灣藝術主體性作一次清晰的論據。以子題(一)系譜與檔案為例，內容是一些以往不常出現在美術展覽場合的資料與歷史圖表等文件，它的作用顯然不是審美，而是展覽主題建構過程的一環。「以圖表方式呈現的歷史與回顧部分，希望能透過對文化歷史傳承的認識與尊重，來突顯建立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¹⁶⁵

解嚴後的1990年代，「本土意識」高漲，無論在政治、人權、經濟、環保等議題上，宣告自主與主體性的聲浪不絕於耳。這一波的「本土意識」較之1970年代提倡根植土地、回歸鄉土的「鄉土意識」更為複雜，其中的爭鬥也更具策略，更參雜政治利益糾葛。一項對於1990年代的文化「本土意識」研究指出，「1990年代的『本土意識』反映出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評論家表現文化民族主義，通常會採取『對立認同』的論述策略。在政治方面，『本土意識』反對官方的大中國意識；在藝術場域上，『本土意識』則反對由西方文化霸權下的藝術語言，並想找尋或建立美術中的『台灣風格』，作為文化民族主義的認同標的。」¹⁶⁶

這項研究絕大部份說明正確，但對應到1996年的台北雙年展個案身上，則

¹⁶³ 劉寶貴，館長序，《1996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4。

¹⁶⁴ 本屆為首次採「策展人」型態的雙年展，但與一般雙年展習見不同，本屆在各門各類子題中，均由不同的「策劃人」負責，分別是：1. 系譜與檔案，由(蕭瓊瑞)策劃；2. 當代議題——「認同與記憶」(蔡宏明)、「視覺思維」(李俊賢)、「環境與都會」(路況)、「情慾與權力」(謝東山)；3. 市民美學(羅智成)。

¹⁶⁵ 劉寶貴，《1996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4。

¹⁶⁶ 陳玉燕，台灣美術本土化批評意識之研究：1990-1999，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顯得有些單薄。因為 1996 年的政治環境，正是處在國內統獨論戰頂盛之際，社會上許多人並無法細分「台灣藝術主體性」與「台灣主體性」有多少差異，對於「主體性」一詞，大多數人難免都會聯想到反對大中國意識的「對立認同」上。事實上，我們也無法證明本屆「1996 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是否有些許是偏獨的民進黨執政的策略運作。只是，隨著台北市政治版圖易色，1996 年的台北雙年展也成為唯一一屆帶來「台灣主體性」想像認同的雙年展。

三、以知名國外策展人突圍的策略-- 立足亞洲、放眼國際的 1998「欲望場域」

「『一九九八台北雙年展』是台北市立美術館，同時也是台灣第一次舉辦國際雙年展。」¹⁶⁷當北美館館長如此驕傲地宣佈，這是台灣的第一次時，回顧過去，的確，自北美館『新展望』開展到 1996 年雙年展以來，不論就參展人數，還是指策展人等的國際人士，都遠遠不及本屆。光憑這點，就足以支持這是台灣第一次「國際性」的國際雙年展。

1998 年的台北雙年展--「欲望場域」，是台北雙年展一次重大的轉變。1996 年雙年展雖然已經改為「策展」方式，但基本上仍是以館方主導展覽議題，再交付各個策劃人執行。本屆台北雙年展則是以「敦聘」一位策展人，並將整個展覽內容交由策展人來負責。套用許多藝評家的說法，這就像是請來一位導演，由這位導演來選擇劇本，來安排角色、人選，以及取景運鏡等。南條史生就是由北美館請來執導本屆雙年展的「國際級大導演」。南條史生在此之前，早已有過多次的策展資歷，在國際藝術界享有好評。¹⁶⁸因此，此次台北雙年展請來南條史生擔任策展人，自然是希望能藉由這樣一位具有高知名度、國際藝術圈關係良好的人物，來為 1998 年台北雙年展打響國際知名度。

¹⁶⁷ 林曼麗，「一九九八台北雙年展」突顯亞洲觀點，《現代美術》，1998，78 期，頁 2。

¹⁶⁸ 根據南條史生個人資料顯示，南條在 1998 年策展台北雙年展之前，就已有多項重要國際資歷，包括有：1988 年擔任第四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Aperto 88」主席；1991 年擔任英國泰得美術館利物浦分館「符號列櫥展」策畫人；1995 年擔任第四十六屆威尼斯雙年展「超文化」特展策畫人與主席；1997 年擔任第四十七屆威尼斯雙年展「日本館」主席等。（見《現代美術》，1998，78 期，頁 5。）

南條史生邀請參展的藝術家，主要來自韓國、中國大陸、日本與台灣。雖然藝術家都來自東亞，其中不乏已享譽國際的知名藝術家，例如中國大陸的蔡國強、日本的荒木經惟、草間彌生等。這次展覽另一項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參展作品出現大量比例的裝置、攝影、錄影藝術等方式詮釋相關主題與議題。若從台北雙年展的歷史來看，1998年台北雙年展的特殊之處，除了前述人物的「國際化」之外，對於日後台北雙年展(乃至於台灣各地的當代藝術展)的表現手法與媒材的「國際化」，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大轉折。在此之前，台北雙年展參展作品大多以平面作品，如繪畫等為主；自此之後，參展藝術家紛紛將作品「撤離」台北雙年展的牆面。¹⁶⁹

1998年台北雙年展的「國際明星」策略成果如何呢？在一場名為「台灣當代藝術的國際空間」座談會上，曾出現這麼一段對話：

梅丁衍：我覺得這次雙年展，南條的確帶來所謂亞洲的熱潮。至少讓國際知道台北有這項雙年展而且是可以成為國際性的。

陸蓉之：所以這點就值得反省，如果台灣的策展人辦展覽，是不是就沒有這樣媒體的關注？

梅丁衍：當然這就看我們台灣策展人對亞洲的了解，選擇什麼樣的藝術家。

陸蓉之：所以當美術館給台灣策展人相同的機會、條件，「你做得到嗎？」能不能夠邀請重量級的藝術家、引來國際媒體？¹⁷⁰

的確，南條史生不但邀請到許多重量級的藝術家參與，同時也為 1998 年的

¹⁶⁹ 例如陳瑞文即語：「1998年的『慾望場域』和2000年的『無法無天』兩個雙年展對台灣藝壇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它們打亂主要是在藝術性質上的打亂，【原文如此】特別是在媒材跟科技，還有對藝術的看法。」見「2002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座談會記錄），《現代美術》，2003，108期，頁32-33。

¹⁷⁰ 黃寶萍記錄/整理，台灣當代藝術的國際空間（座談會記錄），《藝術家》，1998，279期，頁356。

台北雙年展引來國際媒體的注目。據報載：「這項由日本著名策展人南條史生總策畫的國際性現代藝術盛會，除了攫獲台灣美術界人士和一般民眾的目光，也廣泛受到美國、義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國家新聞媒體的注目，許多報紙、雜誌和電視台均予以報導，其中又以日本新聞媒體報導最多。」¹⁷¹當時台灣本地的報紙標題是這樣下的：「美、義、日、星等國爭相報導『台北雙年展』-- 台灣藝術盛宴 國際媒體注目」；¹⁷²以及「台北雙年展 紐約時報高度肯定」等。¹⁷³

紐約時報的「高度肯定」，除了肯定了南條史生是「知名的日本評論人」之外，同時在介紹台北雙年展沿革史時，以及讚美本屆雙年展之際，也都順帶地推銷了台灣此時的民主與開放形象；

大約同時在 1980 年代初期，民主與雙年展雙雙降臨到台灣。最近一次的台北雙年展，也是第一個東北亞區域雙年展，包括了來自日本、南韓、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等地的藝術家作品。作品的範圍從正式合儀到嚴肅誨訓，從詼諧滑稽到十足政治化的。如此意義深遠的多樣性與大膽誇飾的展演方式，所展現出來的全然藝術自由，令人難以置信竟然出現在這個兩年多前才完成首次全面公開選舉的國家。¹⁷⁴

從「媒體宣傳成果」這個角度觀察：1998 年的台北雙年展，無論是對外、對內，在取得「國際性」這項身份的想像認同上，挾知名國外策展人突圍的宣傳策略，可說相當成功。

¹⁷¹ 張伯順，台灣藝術盛宴 國際媒體注目，《聯合報》，1998 年 9 月 1 日，14 版。

¹⁷² 張伯順，台灣藝術盛宴 國際媒體注目，《聯合報》，1998 年 9 月 1 日，14 版。

¹⁷³ 鄭麗園，台北雙年展 紐約時報高度肯定，《聯合報》，1998 年 9 月 1 日，14 版。

¹⁷⁴ Andrew Solomon, 'As Asia Regroups, Art Has a New Urgency', *New York Times*, 23 August 1998, pp. 2, 31. (在此所謂「首次全面公開選舉」(first fully open elections)應是指 1996 年台灣首屆的總統直接民選。)

四、台外雙策展人首例-- 國際對話的 2000「無法無天」

「『2000 台北雙年展』是台北市第一次真正的國際雙年展。」¹⁷⁵新上任的北美館館長又一次驕傲地宣告，這是「第一次」、「真正的」、「國際」雙年展。無庸置疑地，下列數據說明了北美館館長的這份信心：參展藝術家共 31 位，分別來自 18 個國家；台灣 6 位、日本 3 位、中國 2 位、韓國 2 位、泰國 2 位、德國 3 位、南非 2 位，以及義大利、法國、貝寧(非洲)、加拿大、美國、英國、丹麥、瑞士、喀麥隆、以色列與奧地利等各一位。

此屆台北雙年展--「無法無天」(the Sky is the Limit)，由法籍策展人傑宏尚斯(Jérôme Sans)與台灣策展人徐文瑞合作，共同策展本屆 2000 台北雙年展。報導讚譽：「來自世界各個角落不同的文化與人種，正在台北市立美術館進行一場無止盡的连接與溝通，「無法無天」提供了一個大混合的文化場域，來自廿多國三十多位藝術家，在這裡創造一個充滿奇想的實驗室。」¹⁷⁶法籍策展人傑宏尚斯則說：「上屆的台北雙年展中，南條史生將亞洲的焦點帶到了台北，今年我們冀望能將台北雙年展從區域推向國際格局。」¹⁷⁷

2000 年台北雙年展的策展風格，兩位策展人都強調要「展現國際展的『無邊無界』」。台灣策展人徐文瑞表示，「『無法無天』是一個描述性的主題，試圖點出我們對當代文化的想像。我們比較在意如何透過融合與越界，創造出新的東西。」¹⁷⁸在展演內容上，此屆台北雙年展主要表現為全球交誼的輕鬆、娛樂、年輕、互動，其中也包括了失落虛無、無聊等後現代性格，展演氣氛相當符合當時國際上對全球化的樂觀想像構築氣氛，也同時帶有些世紀末的未知與虛無。大致而言，輿論給予的整體評價是：「『2000 台北雙年展』不論在組織架構或是藝術視野上，都充分顯露了任何一項國際當代藝術大展所具有的開放氛圍、國際

¹⁷⁵ 黃才郎，前言，《2000 年台北國際雙年展：無法無天》，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0。

¹⁷⁶ 宏莉，無法無天 奇想世界，《星報》，2000 年 9 月 26 日，19 版。其中國家數目字應為誤報。

¹⁷⁷ 余小蕙，藝術無邊無界--專訪 2000 年台北國際雙年展策展人之一：傑宏 尚斯 Jérôme Sans，《CANS 藝術新聞》，2000，36 期，頁 74。

¹⁷⁸ 徐文瑞，以「小而精」策展理念展現國際展的「無邊無界」--台北雙年展「無法無天」《藝術家》第 305 期，2000.10，頁 306、308。

視野與當代風格。」¹⁷⁹

在「國際接軌」的目標前提下，除了參展藝術家的組合更加國際化之外，許多藝評家與媒體，包括館(官)方，對於此次台北雙年展的的論述重點與評價，紛紛聚焦在北美館- -「台外雙策展人」¹⁸⁰- - 這項新的重要策略上。這項台北雙年展的創舉，在當時廣被視為是台灣與國際的接軌象徵，而且把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策略，進一步從「參與」提升到「對話」的平等位階。較諸以往，如 1996 的台灣主體性、1998 的外籍策展人「個人秀」，本屆台北雙年展「台外雙策展人」制，成功地增強了台北雙年展「國際身份」的主體信心。一段典型的報導內容指出，「對於一個扮演溝通在地(local)與全球(global)的場域/契機，本屆台北雙年展對促進本地參展藝術家與國際專業藝術圈，在地藝壇與國際間尖端實驗性質的藝術創作，或是在地觀眾與全球藝術潮流之間的接觸與溝通，都發揮了正面而積極的效用。」¹⁸¹

外界對於台北雙年展「國際身份」的認同期許與疑慮，在「台外雙策展人」制與全球「重點取樣」的國際藝術家們充實之下，相當程度地被成功說服了，也證明了「『2000 台北雙年展』是台北市第一次真正的國際雙年展。」這句館方自信之語。但質疑台北雙年展國際化「形式」的空間消解了，並未就此滿足了台灣這段後現代多元的「身份認同」之旅。隨之而來的討論，更進入到主體性、在地性、全球化的認同辯證上。

¹⁷⁹ 余小蕙，「2000 台北雙年展」從亞洲躍入國際化格局，《CANS 藝術新聞》，2000，37 期，頁 79。

¹⁸⁰ 「台外雙策展人」一詞並非描述此現象的慣用語。一般較常見的說(寫)法，是諸如「中、西雙策展人」、「一中一西雙策展人」、「中外雙策展人」等。為何本論文如此使用，實是因「一位台灣策展人搭配一位外籍策展人」的策略，從 2000 年台北雙年展起，歷經 2002 年與 2004 年，迄今已沿習三屆，成為描述台北雙年展的重要現象。考量對此重要現象的清晰表達，避免以「中、西」等用語的含混籠統，因此，本論文均以「台外雙策展人」為此現象名之。

¹⁸¹ 余小蕙，「2000 台北雙年展」從亞洲躍入國際化格局，《CANS 藝術新聞》，2000，37 期，頁 79。

五、雙策展人模式與參與世界- - 宣告全球化的 2002「世界劇場」

2002 年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Great Theatre of the World)，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三十一位藝術家參展，並且延續 2000 年廣受好評的「台外雙策展人」模式，由西班牙籍的巴特繆 馬力 (Bartomeu Mari) 和台灣的王嘉驥出任。據媒體報導：「曾任荷蘭鹿特丹『White de With 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的馬力，年僅三十六歲，卻有十年策展資歷，主要活動地點為歐洲，這次接下『台北雙年展』則是第一次跨出歐洲所策畫的展覽。王嘉驥現任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除了撰寫藝評外，也曾策畫過台北當代藝術館『再現童年』等多項展覽。」¹⁸²

繼 2000 年台北雙年展之後，這是第二次和諧成功的「台外雙策展人」運作。此屆雙年展展演規模與上屆相近，展演內容素材較之上屆，更明顯地偏向採用科技時代的錄像器材，包括電影影片、以及許多的視聽用具與電子媒體等。而在展演風格與氣氛上，前屆 2000 年台北雙年展所呈現的世界文化交融歡愉景象，在此屆則轉而為具有深沉哲思意涵的面貌。在一篇針對此屆雙年展所做的研究認為：「『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以與 17 世紀西班牙宗教劇《世界大劇場》同名，來期許自身對於台灣現代藝術所面臨的困境，能夠提供一種去除奇觀化的方法，進而破除其背後與社會、傳播媒體互為運作的操縱體系。」¹⁸³對此，策展人王嘉驥也說：「我們在一開始策劃『世界劇場』時，明顯就是以『去奇觀化』作為我們的基本姿態。換言之，我們雖然將美術館視為劇場，將藝術家的作品展出看成戲劇的腳本，然而，我們並不想製造華麗炫惑的喧囂，甚至刻意避免讓雙年展淪為僅是另外一場國際藝壇的影像奇觀。」¹⁸⁴

在政治操作層面上，此屆台北雙年展除了一慣地以「國際化」為「策略」之外，更進一步地將訴求提高到「全球化」的層次，一如館長所言：「全球化時代

¹⁸² 李玉玲，2002 台北雙年展 西國馬力台灣王家驥策展加入全球觀，《聯合報》，2002 年 6 月 18 日，32 版。

¹⁸³ 高子矜，《間隙中的否定性思維- - 評「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¹⁸⁴ 王嘉驥，從影子魔術到傳媒奇觀，《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30。

的來臨，國際疆域模糊，當城市不再是獨立個體，而是全球網絡的一個轉接點時，駐立在台北這輻輳點上，北美館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應是文化藝術的信差，打開一個窗戶，我們看到全世界，與世界一同起伏、呼吸。」¹⁸⁵此外，政府官員也以肯定的「全球化」論述，將台北雙年展納入到全球一體的文化場域中：

相信大家都同意，文化、藝術早已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討論中。雙年展的構成與展現，可說是充分地體現台北作為國際性都會，在當代藝術延展的能力。我認為兩屆雙年展所採取雙策展人策略，是能夠讓台北雙年展突出於亞洲藝壇的利基。透過中、西策展人在文化背景與網絡上的激盪與交織，相信可以在本地、國際上引起更多的討論與迴響。¹⁸⁶

文化局長上述文章的書寫，高度肯定了台北雙年展「台外雙策展人」的「策略」與目標。另外，與之相呼應的，如策展人馬力，則是在其展覽的論述文章中，直接宣告：「『世界』這樣一個原本根深蒂固且充分具體的觀念，彷彿即將消逝於無形。『全球』這一觀念的提出，使得『國際』再也無法被討論。」¹⁸⁷

此屆台北雙年展有一段政治層面的小插曲，引起本地媒體的興趣與報導。遠因是 2002 年三月開幕的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上，主辦單位因中國大陸參展單位抗議台灣館的「國家」規格，而將台灣館標誌上的「Taiwan」字樣拆除。事件經台灣藝術家嚴正抗議，但未獲主辦單位接受之下，由其他六個參展國家發起聲援，各自將本國國家拼字中，拆下一個字母，慷慨捐出送給台灣館組成新的「Taiwan」字樣。¹⁸⁸原本以為已經事過境遷的政治事件，卻在半年後的台北雙年展上演續

¹⁸⁵ 黃才郎，館長序，《北美館 200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

¹⁸⁶ 龍應台，局長序，《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4。

¹⁸⁷ 巴特謬 馬力，語言的雕塑，《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8。

¹⁸⁸ 這六個字母分別來自於：「T」來自 Austria（奧地利），「a」來自 Canada（加拿大），「i」來自 Croatia（克羅埃西亞），「w」是從 Puerto Rico（波多黎各）的「o」橫切成兩半橫著組成，

集，根據媒體報導：「應邀參加 2002 年台北雙年展的大陸藝術家王功新，被台灣攝影工作者張乾琦指責他在巴西聖保羅雙年展期間，參與『打壓台灣』。」¹⁸⁹ 事件真相在雙方各說各話下，未再見到後續報導，而大陸藝術家王功新的作品「紅門」，也如期在此屆台北雙年展中參與展出。

媒體對這一個「兩岸政治事件」的興趣顯然高過於台北雙年展本身，於是紛紛加以報導。在台灣高度敏感的政治氣氛中，這個事件是否導致政府官員對參與此屆台北雙年展有所顧忌不得而知，不過，這應該是歷屆以來，極少數台北雙年展開幕時，市長、文化局長等官員均未出席參與及致詞的一次。

六、雙策展人模式與現實-- 強勢西方的獨角戲：2004「在乎現實嗎？」

2004 年的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Do You Believe in Reality ?)出現了一個大問號！這個問號並不是本屆雙年展主題上的「？」，而是，循例由一位外籍策展人與台灣策展人所共同策劃的 2004 年台北雙年展，在眾所期盼的展覽開幕之後，大家遍尋不著台灣策展人的身影，不論是在記者會場、開幕晚會上，還是在雙年展的館方出版品論述文章，台灣策展人消失地無影無蹤。

本屆台北雙年展，由比利時籍的策展人芭芭拉 范黛琳(Barbara Vanderlinden)與台灣策展人鄭慧華擔任雙策展人，來自全球各地，包括有東南亞、南美、非洲、歐洲、日本、中國大陸等地三十多位藝術家作品參展，作品形式許多是以今日全球當代藝術主流的錄像媒材表現，共同探討「真實」與「現實」的當代意涵。開幕晚會一如往年，仍舊是一片喜慶，貴賓與藝術家寒暄問候，官員到場行禮如儀；市長致詞表示：「『國際化』、『都市化』與『多元化』為台北市擁有的城市文化特質，『台北雙年展』不僅成功地將台北納入全球藝術網絡，也開拓了文化深度與廣度。」¹⁹⁰於是，在歡樂的搖滾樂聲與美酒佳餚中，2004 年台北雙年展開幕了。

另一個「a」是 Singapore（新加坡）所捐出。而最後一個字母「n」，則是從 Panama（巴拿馬）國家館所捐出。

¹⁸⁹ 黃寶萍，「聖保羅雙年展中打壓台灣？王功新：不談政治請看作品」，《民生報》，2002 年 11 月 29 日，A12 版。

¹⁹⁰ 馬英九，市長序，《2004 年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4。

至於不見蹤影的台灣策展人呢？原來是台灣策展人鄭慧華因為某些原因，而刻意選擇從台北雙年展以「缺席」來表達態度。因此在展覽開演之後，我們所能看到的，所能聽到的，包括關於本屆 2004 年台北雙年展的主題論述等，都由另一位比籍的策展人范黛琳一個人大唱獨角戲。對於為何原本「台外雙策展人」制的合唱組合，開場後成為形單影孤的獨唱，館方的態度均輕描淡寫地以「溝通方式」出現問題帶過，並認為 2004 年台北雙年展仍舊是一次成功的在地國際大展。對此比籍策展人范黛琳不願意在任何訪談中公開發論，只強調以外來策展人與本地策展人的合作模式，仍然是一種可以促進溝通對話的方式，不過，她也對台北雙年展的雙策展人模式提出警語，認為台北雙年展太重視形式策略，而忽略了建立知性對話的重要。¹⁹¹范黛琳強調「對話」的重要性，同樣也寫在她的本屆策展論述中，她說：「讓對話開始吧。」¹⁹²

另一方面，「缺席」的台灣策展人鄭慧華，則明白地為文指陳，整個狀況肇因於「另一位策展人」以強勢主導的作風凌駕了整個展覽的決策過程與內容，在這之中我們面臨壓倒性的『文化輸入』，她擁有決定什麼是我可以談論的，什麼是不該談論的『權力』。¹⁹³當然這僅僅是鄭慧華的片面之詞，真實狀況如何局外人其實無從置喙。只是，兩方的焦點，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對話」；外籍策展人認為台北雙年展忽略了「對話」的重要性，而本地策展人則抗議外籍策展人缺乏「對話」的尊重。

「對話」是今日全球化文化核心議題。它提供了文化全球化裡對抗「文化侵略」與「歐美化」的正當性。「對話」一語象徵著文化主體間的尊重共處，因此也免除了相對弱勢文化主體的焦慮。鄭慧華表示，在接受 2004 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任務之初，即「希望從這樣的合作關係與彼此學習的過程中，發展出我們自身

¹⁹¹ 參見吳金桃，台北雙年展應該包含更多的過程及非正式性——專訪 2004 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人范黛琳，《典藏今藝術》，2004，147 期，頁 82-83。

¹⁹² 范黛琳，在乎現實嗎？，《2004 年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4，頁 32。

¹⁹³ 鄭慧華，我們如何面對現實？，《典藏今藝術》，2004，146 期，頁 67。

文化主體的觀點，甚至產生提出『問題與議題』的能力。」然而，「合作過程中，我們面臨壓倒性的『文化輸入』，當這種輸入已經威脅到自身文化主體存在的位置時，我們若沒有足夠的自覺，便輕易地被抹除而不自知。」本地策展人認為如此缺乏「對話」空間的狀況，引起的是對於文化主體的危機。因此，她認為當整個事件過後，「我們應當繼續思考我們需要怎麼樣的雙年展？它對於我們的文化主體的意義為何？」¹⁹⁴

第二節 策展人與國際化/全球化身份認同策略

一、「跨界」、「交流」、「對話」、「融合」-- 策展人的角色象徵

以往美術館的展覽，除了館方展出收藏的藝術品之外，較特別的大概就是一些「主題展」，主題可以是人物、派別、時代，或者是媒材、對象素材等。例如「莫內大展」、「新古典主義特展」、「文藝復興時期展」等，或者是「素描」、「油畫」、「人體」、「聖經故事」等主題。儘管看似種類繁多，但這所有的種類，都有一個共通性，就是一律出自於美術館的策劃。也就是說，展覽的一切包括形式、內容、以及展演風貌等，均操之在美術館的手中，好壞與成敗，自然也必須由美術館承擔。

許多較具規模的美術館對於運作展覽，本身都具備某種機制，例如組織編制內的展覽策劃人、或者是如北美館的展覽組等。因此，在這裡要討論的「策展人」一語，主要是依近年來的概念用語，應排除掉美術館館方人員職銜，或者必須更嚴格地界定，此一詞語在本文中等同於「非直屬於展覽事務單位的『外來』、『獨立』的展覽策劃人」。

策展人介入美術館與展覽，明顯地造成原本美術館體系的開放，原先屬於美術館的權力與義務，也得以釋放出來。透過策展人的介入與媒介，美術館與外界

¹⁹⁴ 鄭慧華，我們如何面對現實？，《典藏今藝術》，2004，146期，頁67。

有了交流與對話，也打破了原本屬於美術館一元的知識論述場域。一份針對美術館與獨立策展人現象的研究，即認為「過去公部門美術館展覽的推出，無非是一種『由上而下』所交辦展覽業務的體現。當展覽策劃的主動性移轉至美術館體制之外的獨立策展人時，其所被賦予的權力與正當性便成為博物館學學界所討論的議題。獨立策展人的介入也象徵了美術館長期掌握的知識論述權力已然解構。」

195

台北雙年展在 1998 年首度「引進」了「策展人」制，立刻引起藝術界一片廣泛討論。對於北美館這樣的創舉，除了為台北雙年展贏得「國際化」策略成功的盛譽之外，其中也不乏如「引清兵入關」等的對抗聲音。對於一個封閉體系的開放，能開闊視野、增進交流，應該是會有更活潑的生機。然而，在一片「國際化」策略成功的成就氣氛中，反對與質疑衝激的聲音，常常被視為是「不適應國際潮流」甚或故步自封的表現。自從 1998 的台北雙年展首次採用「策展人」制，即都是外籍，且主要都是歐美體系裡的策展人，所以難免令人聯想到，除了美麗誘人的「跨界」、「交流」、「對話」、「融合」等優點，台北雙年展是否會淪為西方策展人的「西方當代藝術台北分部」？

北美館一向清楚地標舉著「國際化」，乃至於近年來的「全球化」。1998 年台北雙年展開始的「策展人」制，以及其後縱貫 2000 年到 2004 年的「雙策展人」制，都明白地表示，「策展人」制不但已經是台北雙年展必走的世界潮流，邀請外籍策展人策畫台北雙年展，以提昇其國際形象與知名度，更是台北雙年展國際化目標的重要策略。在一篇對於近年來台北雙年展運作策略的分析報導中，就提到「2000 台北雙年展在林曼麗仍是擔任館長時候，她個人在有了 98 年成功經驗後，深知以亞洲體系的策展人牌是不能再玩下去，想要再將北美館帶到另一山峰，唯有結合歐美體系的策展人才能奏效。」¹⁹⁶

¹⁹⁵ 吳岱融，〈台灣美術館中的獨立策展人現象〉，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¹⁹⁶ 鄭乃銘，〈誰讓「2000 台北雙年展」真正的「無法無天」？〉，《CANS 藝術新聞》，2000，37 期，頁 78。文中所謂的「2000 台北雙年展在林曼麗仍是擔任館長時候」之語，是因為當時北美館館長經歷長期籌備 2000 台北雙年展，發生了人事政治風波。原任的林曼麗館長，在展

台北雙年展的這項「外籍策展人」策略，初期運用相當成功，許多的好評也都是針對北美館「開放」的「外籍策展人」而來。許多媒體評論認為，「以台北雙年展為例，1998年打響在亞洲國家的聲望，2000年則更拉拔成國際視野的格局，光是預展當天，台北已經不像台北，它成為國際藝術人交相往來的地方。」¹⁹⁷這些媒體報導中的好評，是台北雙年展國際化策略轉變後的明顯成績，也成為了外籍策展人對台灣藝術界「跨界」、「交流」、「對話」的貢獻證據。但在此同時，相對於「外來」的「主體性」、「自主性」等疑慮，未曾歇息。這些質疑的聲音，伴隨著許許多多現象的出現，越來越響亮。例如1998台北雙年展的「慾望」主題，高千惠即言，以外籍策展人所帶來的展演主題，被「自由解讀」後所呈現的在地面向，往往失之偏頗。她說：「以台北大都會一角的慾望，替代了台灣其他鄉鎮、環境空間的其他流動空氣。如果台北市立美術館與台北藝壇人士都同意台灣在亞洲這個『慾望場域』中的形象，台灣情色之島的國際形象，將更明確地加蓋一枚正字標記。」¹⁹⁸

1998年首次出現的外籍策展人，打開了台北雙年展的國際知名度，也成為台灣藝術界論辯「開放」與「主體性」的題材。2000年前，策展人是「外來的」，關於諸多質疑，可以較清楚地放在一種「二元」的框架下討論；2000年起，台北雙年展開始實施「台外雙策展人」策略後，將質疑與討論的層次，進一步帶到更複雜的境地。

二、「台外雙策展人」的形式策略與主體性

2000年台北國際雙年展首度嘗試的「台外雙策展人」制，標舉台灣與國際的接軌、在地與全球的對話，在一片好評聲中，成為其後台北國際雙年展的重要特色，也是繼續「與國際接軌」、「與全球對話」的重要策略。從2000年開始，包

覽即將開展前夕「卸職」，館長由原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黃才郎暫代，旋於此屆雙年展開幕在即之際真除。

¹⁹⁷ 鄭乃銘，誰讓「2000台北雙年展」真正的「無法無天」？，《CANS藝術新聞》，2000，37期，頁79。

¹⁹⁸ 高千惠，《當代藝術思路之旅》，台北：藝術家，2001，頁156。

括 2002 年與 2004 年，台北國際雙年展歷經三屆「台外雙策展人」制，除了檯面上的合作與交流，這項雙年展國際/全球化重要策略，卻一直擺脫不了許多關於「位階」、「主從」、「形式/真實」等的質疑。

許多流傳的質疑，多數指向表面上的「台外雙策展人」制，事實上就是以西方遠來的外籍策展人為主，至於「雙策展人」之一的台灣策展人，則並非佔有同等份量與地位。尤有甚者，更是將「台外雙策展人」制視為是一項場面形式，台灣策展人的被選擇，才華固然重要，但與遠來和尚策展演出的「配合度」亦是關鍵。種種疑慮，在許多私下場合，同樣也曾得到雙年展相關業務人士或多或少、相當程度的證實。¹⁹⁹觀察發現，歷年來很難在有關台北國際雙年展的報導裡，看到這一個層面的消息，除此之外，在許多專家學者的論述與著作中，同樣少見隻字片語。為何如此？大概可以歸因於：報章媒體對於這方面的題材缺乏興趣，再者，台灣的藝術圈規模有限，且人際與權力網絡交織綿密，所以在「以和為貴」的氣氛下，公開言論中，專家學者們不願在這個點上著墨。也因此，只有當這項制度的運作的「和諧」氣氛出現變化之際，這項問題才能有些公開討論。

2000 年的台北雙年展，由於首屆「台外雙策展人」制議題新鮮，關於「雙策展人」「位階」的疑慮，曾經引起少數媒體的好奇。在以下報導內容中，可以窺見端倪：「林曼麗感嘆挑選雙策展人猶如作媒般的辛苦，北美館先蒐集國內外策展人名單，從中篩選，找出理想的雙人制；先敲定了傑宏 尚斯，再尋覓另一夥伴，由於徐文瑞資質佳，也認識傑宏 尚斯，理念較易溝通、契合，三方遂達成合作的共識。」²⁰⁰；另一篇報導發問道策展人產生的過程為何？台灣策展人得以「出線」的考量為何？「林曼麗說：『過程非常曲折複雜。』 選擇國際策展人為北美館為「在國際異軍突起」的策略之一，採取雙策展人的政策，必須顧及

¹⁹⁹ 2002 年台北國際雙年展期間，筆者曾經有兩次機會，分別在不同教授所帶領的北美館參訪過程中，針對此疑慮，向兩位前後任展覽組組長發問。兩次經驗中，兩位負責雙年展籌劃業務的主管，均相當程度地證實了這項疑慮，表示現實使然；但也都都不約而同地要求，不得作為具名正式發言。

²⁰⁰ 張伯順，台北雙年展 策展人選出爐，《聯合報》，2000 年 2 月 20 日，20 版，

兩位策展人的溝通協調，『所以事前我們百分之八十心中有底，誰會出線。』北美館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李玉玲事後則再補充，館方經過長期蒐尋，與不同的國外策展人聯繫，最後決定聘請傑宏 尚斯；然後他們列了台灣各策展人的策展資歷供傑宏 尚斯參考。」²⁰¹

上述報導內容雖然婉轉保留，但的確多多少少點出了，在北美館的策略上，台、外籍策展人選的產生，是以組合出的「形式」為主要考量。只是既然是「策略」，為了運作成效，有些事檯面上當然是不能說的。至於在「形式」之外，實際上「台外雙策展人」是否存在著「主從」疑慮，是否存在有外籍策展人為主角主導，台灣策展人成為服務於「形式」陪襯等，一直到多年後，事過境遷，才從歷屆幾位台灣策展人的直率言談中，得到明確的答案。

2004年台北雙年展的台灣策展人「出走」事件之後，在一篇歷屆台灣策展人的訪談報導中，對於台北雙年展「先有國外策展人，其後產生台灣策展人」的運作機制，是否已隱含了某種「權力的主從關係」，做出了正面不迴避的揭露。報導中引述2002年台灣策展人王嘉驥的話：「所謂權力關係，北美館先敲定國外策展人再找國內策展人，這已經說明很多事，不需刻意強調這是不是一個差別待遇或失去平衡的問題，重點是台灣策展人在接受這樣的安排時，心裡應該要很清楚這個結構就是如此。」而2004年的鄭慧華則表示：「在地策展人是站在比較像是需要『獲得國際策展人青睞』的位置上，這不只是潛在主從關係的問題，還是我們自己設下的文化如何溝通的一種基礎和模式。」她更進一步以此為鑑，認為這「反映了我們自身與國際之間的關係位置。」²⁰²

對於外界將討論焦點放在「台外雙策展人」策略中，人選選擇的「主角/配角」、「主體/附屬」與「形式/真實」等問題，費大為則認為，這是台灣與亞洲諸新興國家藝術界所面臨的現實，不但無需遮掩或迴避，反而「就是要『引狼入室』，來沖破本地的自我封閉 夜郎自大的心理。」對於以活躍的西方策展人來搭配「一

²⁰¹ 黃寶萍，2000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人亮相，《民生報》，2000年2月20日，4版。

²⁰² 參見簡子傑，歷屆台灣策展人談台北雙年展機制，《典藏今藝術》，2004，147期，頁84-87。

位資歷不算深的台灣年輕人」，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階段」；「因為我覺得臺灣現在正需要這樣一個把西方組織展覽的方式和觀念引進台灣的學習過程。 台灣 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建立一個從技術上能夠跟西方接上軌的運作系統。」²⁰³

如費大為等許多肯定台北雙年展國際化形式策略的人，認為台灣擁有具備潛力的藝術家與策展人，也有很好的藝術作品，但他們缺乏發揮的空間與展現的舞台。因此，諸如舉辦「國際性」展覽，以及採取「台外雙策展人」策略等，來提昇台灣藝術界的能見度和國際知名度，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如果不這麼做，台灣的藝術家與藝術作品，將會被拘限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缺乏進一步開拓發展的可能。因此，這類論述不避談「主體性」等問題，而是認為，面對台灣藝術界的生存困境與發展限制時，只有採取「開放」，以及思索如何「開放」等策略，才是最重要的著手點。「通過引進西方的模式，我們不僅是在學習技術和系統的組織結構，而且主要是學習西方當代藝術的開放態度， 引進外來力量的最終目的是讓本地的人材得到靈感和發展，但不經過這個階段是絕對不行的。」²⁰⁴ 另外一份觀察了台北雙年展「雙策展人」現象的研究也認為，這些策略性作法對台灣的當代藝術產生了一定正面的影響，它使得交流與對話發生，做到了「國際網絡之鋪設的初步工作等。」²⁰⁵

另一種不同的聲音，從「台外雙策展人」主從地位延伸而來的討論，則是將關注焦點放在「文化主體性」與「全球化意涵」等問題上。這一類的聲音若被簡單歸類為反對「台外雙策展人」策略，則有欠公允。因為許多關於台北雙年展「主體性」議論，並非反對「台外雙策展人」等策略，而是透過展覽所宣告的「國際化」、「全球化」，或者是藉由對於「台外雙策展人」等策略的討論，來反思「形式正確」背後的深層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有關這些形式的強調，是否等於真

²⁰³ 費大為語。見余小蕙，引狼入室-- 和費大為談台北雙年展，《CANS 藝術新聞》，2000，31期，頁54。

²⁰⁴ 費大為語。參見余小蕙，引狼入室-- 和費大為談台北雙年展，《CANS 藝術新聞》，2000，31期，頁55。

²⁰⁵ 呂佩怡，後九零年代台北市立美術館國際策展的「本土/國際」策略探討，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此論文在台北雙年展研究部分，主要分析範圍為1998與2000年兩屆。

正的「國際化」與「全球化」？而真正的「國際化」與「全球化」又是什麼？以及如此的「國際化」與「全球化」，跟在地以及主體性的辯證關係如何？主體性會不會消融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形式當中。這些問題在陳界仁的一席話中，看得到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見解：

我們常有一個概念——接軌，可是我們到底跟什麼東西接軌？跟誰接軌？又或者是我們常常談「國際」，常常指的就是「西方」。我們不太去跟第三世界接軌，我們也不太會去跟東南亞或中南美洲等的問題接軌。所以我常有一種感覺，我們所謂的「全球化」，其實就是西方、媒體告訴我們的那種「全球化」；所有的訊息不斷地從媒體單方面提供給我們，我們只是訊息跟消費的接收者。我們的國際其實不怎麼「國際」，我們的「全球化」只集中在消費、影像或者是西方中心的生產者所提供給我們的。²⁰⁶

陳界仁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意涵上，而非滿足於以往的諸多「形式」。這些問題其實也存在許多人的心裡，只是當理念與現實環境的操作交錯時，往往會出現許多無法得兼的困擾，這時候，礙於主事者的環境與限制，還是會以「形式」作為主要的「策略」，而無法兼顧到更深層與複雜的「內涵」層面。這種矛盾處處可見；早在1996年，有一段北美館館長林曼麗的發言，可以與前述報導中，北美館徵選台外雙策展人的操作態度，作一關於理想與現實的對照。她說：「長久以來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宰制之中，所謂的『國際』常被等同於西洋或歐美，而在二十一世紀，多元文化社會價值觀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國際視野』，是一種更寬廣、更包容也更對等的國際觀。」²⁰⁷

²⁰⁶ 陳界仁語，「2002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座談會記錄），《現代美術》，2003，108期，頁37。

²⁰⁷ 林曼麗，國際化、專業化、普及化——美術館十三週年館慶展望，《現代美術》1996，69期，頁26。

有關於台北雙年展「國際化」與「全球化」等諸多策略形式，呂佩怡將其形容為「後九零年代」北美館策展的「輸入式」國際化策略。在她的研究中，對這些觀察有一清晰簡要的分析與批判：

經分析探討之後發現在這些國際展覽中國際政治延申至文化範疇是明顯易見的。再者，整體的展覽運作是依賴西方結構與價值標準進行，並策略性的結合西方評審或策展人的「共犯結構」，其背後的理由在於台灣主體性的匱乏與信心的不足。我們與國際評審或策展人共同架構展覽，用一種文化想像去想像一個國際大展的需要，並依賴國際評審、策展人等來決定我們該提出什麼樣的菜色，才能在此一國際饗宴之中被關注。

而這些策略性作法對台灣的當代藝術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正面影響方面，(1) 透過交流帶來新的刺激與想法，並達成國際網絡之鋪設的初步工作；(2) 在美術館內部也因這些大展而有結構性的改變。台灣的當代藝術也因這些短期策略而產生一些副作用，包括(1) 以大展架接國際，使資源過度集中，對其它類型展覽自然產生排擠效應，造成內部成長遲滯的現象；(2) 由於美術館大展的選件作法，製造台灣當代藝術的「類典範」，引導藝術文化走向窄化。²⁰⁸

歸納分析各界對於「台外雙策展人」等策略的檢討及論議，可以發現一個趨勢；無論是站在支持或者質疑的立場上，大致上都可以接受台北雙年展進行「台外雙策展人」這樣一種國際化形式策略。不同的是，有些人將它視為是台灣與國際/全球接軌必要的「手段」，有些人則擔憂這些「手段」會嚙食了原本的主體性，最後反客為主，成為「目標」。

²⁰⁸ 呂佩怡，〈後九零年代台北市立美術館國際策展的「本土/國際」策略探討〉，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台北國際雙年展的策略，經由消費國際知名策展人，繼之以消費「台外雙策展人」的對等形式，將台北國際雙年展從原本的「國際化」身份認同，帶入到另一個新階段——更強調多元、對話、溝通的全球化文化消費場域。

第三節 結語

從「2004年台北雙年展」選擇「出走」的台灣策展人，在整個展演框架就緒之際，用靜默地消失，積極地參與了這次雙年展所建構出來的論述場域。很多人遺憾這次雙年展的不完美，議論紛紛。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次的台北雙年展不但未少了一份原本該有的策展人論述，還多出一件參展作品了；這份策展人論述是一篇大家心裡有數的無字天書。而多出來的作品呢？那是一件肉眼看不到的、沒有影像的觀念藝術作品。這件與本屆雙年展主題同名的作品，也名為「在乎現實嗎？」。作品內容充滿主體與認同的矛盾辯證，台外雙策展人共同發揮最大的巧思，為它進行佈展裝置，讓它一如馬克思所言的幽靈般，瀟灑遊蕩在「2004年台北雙年展」的各個角落。

「2004年台北雙年展」「出走」的台灣策展人，以一種最特殊的身份，在屬於「台北雙年展」歷程最特殊的時間點，發問出多年來被「台北雙年展」歡愉文化消費所迷惑的問題：「我們需要怎麼樣的雙年展？它對於我們的文化主體的意義為何？我們該如何繼續往下走？」²⁰⁹

表面上是雙年展雙策展人制出現了問題，但事實上，雙策展人策略固然需要檢討，一旦調整了「戰術」與「策略」，是否還是要朝向原封不動的「戰略目標」向前邁進？這個層面的問題一直如同一個命定的天職，不論發生任何狀況，都從未被觸及，所有的問題都如同從一個離地的距離開始生長，一旦想要追溯系譜，到了某個層面就會陷入五里霧中，誤以為霧中就是根植之處，於是又不加思索地回頭出發。

²⁰⁹ 鄭慧華，我們如何面對現實？，《典藏今藝術》，2004，146期，頁067。

無意否定「台北雙年展」的「藝術成就」。在這裡要探討的，是以「台北雙年展」現象作為台灣主體認同問題的旁徵個案。「台北雙年展」的歷程，在台灣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層面裡，就是一路以文化消費追逐著主體認同的歷程。「台北雙年展」現象是個值得深掘的文化消費與消費文化現象。多年來透過舉辦「台北『國際』雙年展」，我們賣力地消費歐美當代主流藝術，積極地交換著各種資本，讓自己取得國際社會結構上的身份認同，讓台灣擺脫世界結構中邊陲與附庸的角色，讓台灣穿上名牌高貴的潮流服飾，買張入場券，進入昔日稱為「國際」，而今日更擴大規模的「全球化俱樂部」裡，讓全球化國際社會中的結構地位，來肯定台灣茫然而惶惶不安的自我認同。

第六章 結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權力技術

全球人簡直就像「在塵世之外」，但和基督教世界裡的天使相提並論，他們在常人世界上翱翔的美姿更加耀眼，每日每夜，讓你逃不了的影像：如此地遙不可及，卻也是如此清晰可見，如此高尚，卻也世俗，如此高不可攀，卻也為所有的下等人提供了閃亮的榜樣，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他們令人景仰，也叫人豔羨——他們這樣的貴族，給人們的是指引，而不是統治。

Zygmunt Bauman²¹⁰

一、「同觀樓」的誘惑

傅科的權力論述裡，最著名的是分析「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對監獄犯人的監視效率，來說明權力的運作。²¹¹這種「全景樓」被矗立在環形監獄所包圍的廣場中央，藉由高度與環景的視線優勢，持槍的獄卒得以獨自或少數人，監視控管著所有犯人的一舉一動。在這種監視環境控制之下，不管監視的獄卒是否正盯著你，犯人無法辨識，這種無時無刻都受到監視，也無時無刻都可能受到懲治的心理威脅，漸漸地在犯人的心中紮根深竄，於是形成一種自我規訓的優異效果。傅科指出，「他所致力的並不在於分析權力關係的現象，或是為了替權力分析建立基礎；而是為了鋪陳人性如何墮入複雜的權力關係之中，成為權力的主體。」²¹²傅科的「全景樓」描述，成為現代性社會權力運作最佳的寓言，在現代

²¹⁰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玖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54。

²¹¹ 參見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城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台北：桂冠，2003，頁 195-227。

²¹² 引自劉千美著，《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台北：立緒，2001，頁 148。在此所謂「成為權力的主體」，應是指「不自知地成為建構權力與進行權力運作的一份子。」

社會權力結構中，掌權者只要隨時保持著懲戒的姿態，繼以許多制度的運作，讓人民相信，自己隨時隨地都受到無所不在的監督，任何的違失或不軌，隨時將受到懲罰，人們自然自動規馴於權力的規劃與掌控。

Thomas Mathiesen 將傅科的「全景樓」一例，描述為現代社會「少數觀看多數」²¹³的權力運作機制。這是現代社會結構中，少數主掌權力人物操控多數人的主流作法。Mathiesen 進一步提出一個當代世界權力結構的新樣態，他認為當代大眾媒體的興起，產生了一種新的「權力技術」。這種新興的權力技術，與「全景樓」式的發展相反，它的權力運作方向，是由「多數在觀看少數」，而且他還強調，這是歷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多數」。Mathiesen 將這種新的權力運作模式，對照傅科的「全景樓」一詞，命名為「同觀樓」(Synopticon)。

Mathiesen 的「同觀樓」，是以大眾媒體的效應為本，所開拓出來的當代權力技術論述。在「同觀樓」的處境裡，萬民仰仗樓中發出的訊息思考與行動，同時更仰望著樓中的少數人的風采——一種知識與品味的主流權威。Mathiesen 講的是大眾媒體的權力效應，同時也是今日全球化時代的新權力運作隱喻。對此 Zygmunt Bauman 就認為，「『同觀樓』在本質上就是全球化的；觀看的動作本身把全世界各地的觀眾連結在一起——至少在精神上，把他們都引領到電子空間，即使他們的身體留在原地，距離也已不再重要。」²¹⁴他們的身體其實可以「留在原地」，也可以四處遊走，只要仰望著同觀樓，看著樓中人的翩然身影與他們所傳播的誘人訊息，全世界各地的多數人就能提供這套知識權力機制運轉源源不絕的能源。

「如今在『同觀樓』中，在地人觀看著全球人。權威就建立在他們的遙遠；全球人簡直就是『在塵世之外』(out of the world)。」²¹⁵在生活文化層面，這項新的權力技術，早已超越武力與脅制，轉而將「需求」與「欽羨」內化到絕大多數

²¹³ 轉引自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63。

²¹⁴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65。

²¹⁵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65。

人的知識體系內，成為追尋自我認同的關鍵來源。Bauman指出，全球化中的新媒體「互動性」(Interactivity)，「只是誇大之詞；還不如說是『一種互動性的單向媒體』(Interactive one-way medium)。」²¹⁶互動性的單向媒體，直接點明了全球化時代裡所謂「全球一體」的平等互動假象。Bauman認為，多數人註定是要做「純粹的觀看」的；

多數觀看少數。被觀看的少數就是名人。他們可能來自政界、運動界、學術界、演藝界，或只是備受愛戴的資訊專家。不管他們來自哪裡，所有出現的名人都在展現一個屬於名人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最大特徵就在於被觀看--被很多人觀看，來自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觀眾：他們的全球特質乃是繫於他們被觀看的能力。透過電視，他們不論在何時說了什麼，都傳達了一種全新生活方式的訊息。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²¹⁷

「同觀樓」的譬喻說明了今日全球化下，新的權力運作技術，正以更精密的、更合理的、更鋪天蓋地的方式，統攝今日的知識體系；知識就是權力，我們從沒能離開過傅科的魔咒。全球化的確是歐美的「第二現代」，但絕非全球平等共榮的希望與許諾；在新的「全球化知識圖式」中，多數人仍然是在新權力框架中的被統治者。

二、「他者」身份卸除？

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與「全球化」策略，分別展現在「國際策展人」、「國際藝術家」，以及「台外雙策展人」的作法上。台北雙年展本質上就是一種徹徹底底的文化消費樣態。市民藉由消費台北雙年展，得到文化與象徵性資本；而台

²¹⁶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64。

²¹⁷ Zygmunt Bauman 著，張君玫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2001，頁 65。

灣消費台北雙年展，同樣是為了要換得到相對的社會資本，使台灣能在今日全球化知識場域裡，取得自我與世界場域裡的身份認同。同樣是文化消費，今日的文化消費者進入到台北雙年展的會場，觀看這個「同觀樓」的瑰麗景象，感染著身處全球化當代藝術氛圍的「幸福意識」；而另一個層面，仰望著偉岸聳然「全球化同觀樓」的台灣，也同樣因為消費了台北雙年展的「國際化/全球化」形式，而沉醉在晉身全球化身份認同的滿足感中。雖說後現代身份認同原本就充滿游移變異，但是如果無法辨明其中的知識與權力結構，一味盲從「同觀樓」中所傳遞的訊息，久而久之，將連自己的臉孔都無法辨認。

台北雙年展的國際策展人，就如同全球化「同觀樓」中天使的信差，持續地為台灣藝術界與知識界捎來新的信息，帶領我們欣悅地迎向前去，接受這榮耀的新生命，成為全球化神國的選民。「同觀樓」沒有以往強制地壓迫面貌，它只是散發出信息誘惑人們，讓人們景仰與追隨，無法自己。或者說是催眠，全球化「同觀樓」的信息香氣迷人，讓人忘了自己，想像在全球化的夢境王國中與天使們共舞。

但欣賞了美麗平靜的波光潋洵，更應該知道，水面下洶湧的暗流才是危險的。全球化的美好許諾使大家迷醉，大量訊息的全球瞬息溝通所產生的臨近感，以及全球消費文化所帶來的一體感等，加強再加強了人們對於地球村「平等交流」與「相互尊重」的信心。只是，面對難以具體指認的所謂的全球化文化與藝術樣態，如果無法辨明自己的處境與位置，一股腦地迎向前去，前方可能正是那水面下潛藏的洶湧暗潮。身處全球化權力場域邊陲位置，想要晉身全球化的「權力內圈」(Inner Circle)，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自知邊陲，卻對於形勢毫無覺知，那接下來所採取的「戰術」、「策略」等，不但可能徒勞無功，更令人擔心，會不會「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具有台灣當代藝術指標性意義的台北雙年展，評價與成績見仁見智，但歷年來的努力則是有目共睹的。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目標下，台北雙年展「外籍策展人」與「台外雙策展人」策略形式，究竟帶來的「開放」，是「引清兵入

關」，還是真正達到了「溝通」、「交流」與「對話」呢？許許多多的官方說法，斬釘截鐵地以「在地/全球」「對話」這個時髦語彙爭取合理性與掌聲。在當代藝術的模糊怪異身影中，只要是理直氣壯的語氣，又有誰能反駁什麼呢？可是如果只是一句「在地與全球對話」，就以為能夠躍升全球化「同觀樓」裡，與天使們相擁共眠，那會不會太「天真無邪」了？

外來的策展人真正與在地對話了嗎？如果外來的西方策展人能夠真正地與在地對話，那麼為什麼 1999 年的台灣 921 大地震，這個對台灣如同世紀末天啟般的重大殤慟，在 2000 年的台北雙年展裡頭絲毫不見蹤跡？不要忘記了，這場名為「無法無天」的台北雙年展，在歐美策展人和台灣策展人「對話」後，共同創造成的面貌，是如何地歡愉與慶樂！

當時全世界透過全球化媒介，看到了台灣 921 大地震的災情，也紛紛對台灣伸出溫暖的援手。不過全球化媒體將台灣震災影像「真實地」傳送到世界各地時，這些影像所構築的「擬真」(Virtual)，誰都知道那不是「台灣自己」真正的殤慟。直到紐約「911 事件」發生的前夕，西方世界的「全球化」仍是一條邁向應許之地的光明大道。這時的「全球化」包括了歐美對世界未來的歡愉想像與榮景企盼，但不包括回教世界的惶然騷動，也不包括台灣的 921 殤慟。2000 年時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是喜樂的，於是西方策展人將其時歡慶喜樂的世界樣貌帶到了台北雙年展，而台灣的策展人也欣然的以「全然的全球化」加以回應；於是，本土與國際、在地同全球，共同「對話」出這場喜樂的歡宴-- 2000 年全球化的台北雙年展。

許多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理解，無法接受簡單分明的「全球一體」與「交融欣象」，對於今日當代藝術的全球化風貌也難逃如此質疑聲音：「當代藝術已發展到形同『群眾運動』，且如超級流行性感冒般散佈成全球化的景象。不參與這『群眾運動』幾乎成不了藝術家，或只是『主流價值』的前衛藝術外的『邊緣人』。在策展人魔棒指揮之下奮力向『國際』（其實是西方強勢文化）接軌，一味以此為得計，『台灣』只是西方藝術『跨國公司』委託承製的『產地標籤』而已。」

²¹⁸台灣的藝術界為求取得「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身份認同，所採取的策略，無論是「國際化大展」、「國際策展人」等形式，都只能發揮消費西方當代藝術的作用，身為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品質與設計，除了繼續消費，其實是沒有發言權的。當代藝術一如其他在全球化裡的文化消費品，被台灣用來當做確認全球化身份的認同象徵，只是，不論面貌再怎麼神似，這終究只是一種認同的「建構」與「想像」。至於被我們所「建構」與「想像」的認同對象，真實的面貌究竟是如何呢？「網路、麥當勞、旅行、好萊塢，或藝術的雙年展等似乎說明了這個全球一體的現象。似乎在文化邊界之上有一個魅影隱約顯現著，我們通常給予了一個含混不清且醜陋的字眼去概括上述的現象：全球化。別忘了所謂的全球化往往只是歐美化(Euro-Americanization)的另一個代稱。因為我們也不會是藉著全球化而更非洲了一些，或是更伊斯蘭了一點。」²¹⁹的確，在我們的台北雙年展裡，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國際」與「全球化」，也許我們也認為自己已經躋身於其中了，於是我們繼續將自己裝扮得更「全球化」；可是，在這個「全球化」裡，我們將如何辨識自己的面孔？這其中所出現的「台灣」，或者是「伊斯蘭」，到底是誰所看所說的「台灣」與「伊斯蘭」呢？

三、自我奇觀化的新後殖民樣態

數百年來，台灣經歷過許多不同國家的殖民統治，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追求，自然是殷殷切盼。不同的時期，變幻不定的身份與歸屬，讓台灣在文化的身份認同上，顯得缺乏信心。有一段關於香港殖民處境與文化樣貌的批判，也許可以作為台灣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借鑒；

²¹⁸ 何懷碩，評藝評，《藝術家》，2002，322期，頁106。

²¹⁹ 林宏璋，前進到邊界之外的反應，《藝術家》，2001，318期，頁135。

五、六 年代有一句流行語：英文加西裝等於教授。這雖然是一句調侃、開玩笑的話，裡頭卻含有兩個非常符合歷史性的符號：英文與西裝。英文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的標幟，幾乎沒有太多人去質疑。如果說，英文已經成為世界語、國際用語，說去追求它學習它是一種自然發展的需要，這也正好說明了美國強權滲透力之普及。至於西裝(包括女性的洋裝)，作為一種外來文化的符號，及穿在身上多多少少代表的某種認同，已經毫不受到抗拒地被內在化。²²⁰

葉維廉以「無形的殖民文化」，稱呼香港殖民處境下「文化原質的失真」樣貌，如果說「英文」與「西裝」可以使昔日被殖民地香港感受到身份認同，那麼同樣曾經是歷代列強殖民地的台灣，情況有沒有更好呢？在台灣，除了「英文」與「西裝」之外，近年來台灣無論是在文化或藝術上，西方與「歐美化」的面貌越來越明顯，不但大量引進西方形式的藝術，更為了配合「世界潮流」與「全球化趨勢」，紛紛將所謂的「本土」、「在地」等質素，以全然西方面貌扮裝，將自己自我「奇觀化」，所謂的在地化之於全球化，成為了一件件「沒有文化氣味的產品」²²¹，被用來滿足今日的「全球化」藝術生態口味。昔日殖民統治的武力，剝奪去被殖民者的文化主權，而今日的后殖民景況，卻在西方所建構的「全球化」知識場域中，更發揮出望風披靡的驚人威力。

1990 年代蘇聯瓦解之後，昔日全世界的共產國家紛紛垮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大獲全勝，西方資本主義也如秋風掃落葉般地席捲全球。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強權挾經濟、軍事與政治等優勢，使西方文化與藝術一躍而為全球的主流風潮。昔日的冷戰世局，在文化與藝術表現上，除了主要對抗的兩大陣營各領風騷，還有多元紛亂的第三世界等，也許不能說這是美好的，但卻是多樣的。然而

²²⁰ 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當代》，1990，52期，頁47。

²²¹ 語出岩淵功一，日本文化在台灣 - 全球本土化與現代性的「芬芳」，《當代》，1998，125期，頁14-39。

今日的全球化樣貌，表現於外的看似繽紛絢爛、百花齊放，但所有的一切，卻都不自覺地以歐美主流品味認定為尚，成為一種「單向度的當代藝術」。

「今天多數亞洲的國際策展人，身處物質大環境的浪潮裡，往往不知不覺地『屈從』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Hegemony)，試圖展現合乎西方潮流的藝術品，而且理直氣壯認為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如果不順著西方的主流，就被歸為傳統的、地方性的、甚至是落伍的。」²²²「強大的西方，如何在全球化論述下，將電視媒介『無害地』送入諸第三世界，而其中又隱藏著若干優勢的論述。而第三世界 在力求再現的過程中，又不知覺地落入西方圖景之中，以為在自我呈現的同時，提供西方更多賞玩的空間。」²²³無法否認，從台北雙年展的策略目標看起，台灣的當代藝術界，正是亦步亦趨地在循著西方主流軌跡學步。所以必須要「國際化」，一定要「全球化」。至於什麼是「全球化」的意涵？為什麼要「全球化」？這些全都不是問題，問題的根部長在一片太神聖的土地上，我們有幸攀附其上，不能也無能褻瀆。我們所能思考的，是一個被恩賜的範圍，在這個範圍裡，就是不停地想著，我們如何「全球化」？要用什麼樣的「策略」使自己看起來更「全球化」？還有什麼國際名牌可以消費，讓自己的身份能更上一層樓？一定要「全球化」，就是要「全球化」！「全球化」就對了。JUST DO IT！

也不是沒有反省的聲音，但所有的聲音都只能在底層無力地獨白；至於實際掌握權力者，手上拿到資源者，關心的卻不是這些。「最近這十年來，多少藝術工作者或公部門主管經常『傳頌』的一句話，要不是『進軍國際』就是『推上國際舞台』。一方面為其理想與抱負感到興奮，另一方面也憂慮 會有『底層斷裂後遺症』的無力感。公部門與藝術工作者都一廂情願的追求『國際舞台』，忽略了經營『本土』(社會實力)的重要性與對策，長期累積了這麼嚴重的斷層現象不察」²²⁴。這種身份認同的茫然，不正就是台灣今日的處境嗎？

²²² 陸蓉之，慾望的生與滅-- 看一九九八台北雙年展：慾望場域，《藝術家》，1998，278期，頁331。

²²³ 郭志榮，後現代的媒介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²²⁴ 王福東，假如台灣就是「國際舞台」從巴文中心主任廖仁義的一席話談起，《藝術觀點》，

一味追求晉身「全球化」「國際舞台」的「形式績效」，大力歌頌「全球化策略」，並以「策略」與「形式」為成績，是今日世界上如台灣等，許多昔日第三世界國家追求認同時，彷彿無力抵抗的宿命。「藝術上國際主義的成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等後文化上的一項勝利。他們將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藝術納入其流刺網中。許多弱勢國家的自我性格在不自覺下被消融，而成為其邊陲旁系。」²²⁵台灣在這項勝利的征服之下，不但繳械投降，更進一步地改換軍裝，拾起新的身份認同，敲鑼打鼓地加入征服者的行列中。這種情況不但抬面上掌權者如此，就連原本批判擲地有聲的藝術界、學術界人士，一旦站上了台，掌握了麥克風，也立刻就被結構與體制資源以柔克剛，自動繳械了。社會權力結構與全球化權力結構就是如此神奇，資本主義的內部運作邏輯，就像是個太極拳高手般，總是借力使力；更像是一手蘿蔔一手棍棒的主人，使得有糖吃的人柔柔順順，至於吵吵鬧鬧的人，拿到糖之後那樣滿心歡喜的容顏，是後人「有為者亦若是」的好榜樣。

台北雙年展以追逐「形式」作為策略的例子，讓我們彷彿看到今日台灣社會裡，某一個缺乏自信的小伙子，用消費名牌來實踐自我身份認同；也讓我們看到，在台灣社會一片歌詠「全球化」的身份認同聲浪中，背後隱然存在的後殖民文化消費樣貌。

2002，15期，頁5。

²²⁵ 陳英德，台灣美術的本土和他者——自體性和被影響，《藝術家》，2001，310期，頁223。

參考書目

- 于奇智，《傳科》，台北：東大，1999。
- 王寧，《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2003。
-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 王受之，《世界現代美術發展》，台北：藝術家，2001。
- 王振寰，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9，34期，頁 69-112。
- 王福東，假如台灣就是「國際舞台」從巴文中心主任廖仁義的一席話談起，《藝術觀點》，2002，15期，頁 5。
- 王嘉驥，從影子魔術到傳媒奇觀，《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24-31。
- 尤傳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政治 權力》，台北：文建會，2003。
- 巴特謬 馬力，語言的雕塑，《2002 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 8-14。
- 余小蕙，藝術無邊無界-- 專訪 2000 年台北國際雙年展策展人之一：傑宏 尚斯 Jérôme Sans，《CANS 藝術新聞》，2000，36 期，頁 74-76。
- 余小蕙，「2000 台北雙年展」從亞洲躍入國際化格局，《CANS 藝術新聞》，2000，37 期，頁 79-82。
- 余小蕙，引狼入室-- 和費大為談台北雙年展，《CANS 藝術新聞》，2000，31 期，頁 54-57。
- 余思穎編輯，《2002 台北雙展：世界劇場》專輯，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
- 呂佩怡，《後九零年代台北市立美術館國際策展的「本土/國際」策略探討》，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所，1997。
-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2003。
- 李維菁，《台灣當代美術大系-- 商品 消費》，台北：文建會，2003。

- 李鵬程主編，《當代西方文化研究新詞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吳金桃，「打造一個根植於城市的「雙年展」——專訪利物浦雙年展執行長路易士 比格斯」，《典藏今藝術》，2004，147期，頁96-99。
- 吳金桃，「台北雙年展應該包含更多的過程及非正式性——專訪2004年台北雙年展策展人范黛琳」，《典藏今藝術》，2004，147期，頁82-83。
- 吳岱融，《台灣美術館中的獨立策展人現象》，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何懷碩，「評藝評」，《藝術家》，2002，322期，頁106。
-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2002。
- 林宏璋，「前進到邊界之外的反應」，《藝術家》，2001，318期，頁135。
- 林曼麗，「國際化、專業化、普及化——美術館十三週年館慶展望」，《現代美術》，1996，69期，頁26-29。
- 林惺嶽，「評審後話」，《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4，頁12。
- 林曼麗，「一九九八台北雙年展」突顯亞洲觀點，《現代美術》，1998，78期，頁2-3。
- 岩淵功一，「日本文化在台灣——全球本土化與現代性的「芬芳」」，《當代》，1998，125期，頁14-39。
- 范黛琳，「在乎現實嗎？」，《2004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4，頁29-32。
- 南方朔，「讓樂觀的實踐從此開始」，《帝國》，台北：商周，2002，頁11-22。
-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與馬克思主義》，台北：創世文化，2001。
- 徐文瑞，「以「小而精」策展理念展現國際展的「無邊無界」——台北雙年展「無法無天」」，《藝術家》，2000，305期，頁306-310。
- 高子矜，《間隙中的否定性思維——評「2002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臺南藝術學院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高千惠，《當代文化藝術澀相》，台北：藝術家，1996。
- 高千惠，《當代藝術思路之旅》，台北：藝術家，2001。
- 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2002。
- 馬英九，「市長序」，《2004台北雙年展：在乎現實嗎？》，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4，頁11。

- 郭志榮，《後現代的媒介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陸蓉之，慾望的生與滅- - 看一九九八台北雙年展：慾望場域，《藝術家》，1998，278期，頁330-333。
- 陸蓉之，飛越領空- - 誰代表誰的雙年展？，《藝術家》，2002，321期，頁228-231。
- 陳玉燕，《台灣美術本土化批評意識之研究：1990-1999》，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陳光興，《帝國》與去帝國化問題，《帝國》，台北：商周，2002，頁23-42。
- 陳光興主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2000。
- 陳英德，台灣美術的本土和他者- - 自體性和被影響，《藝術家》，2001，310期，頁220-223。
- 陳淑鈴記錄/整理，「2002台北雙年展- - 世界劇場」（座談會記錄），《現代美術》，2003，108期，頁32-49。
-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
- 黃光男，館長序，《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4。
- 黃海鳴，談第一屆雙年展，《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2，頁8。
- 黃海鳴，「世界劇場」的雙面思考- - 2002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之初探，《藝術家》，2002，332期，頁500-507。
- 黃才郎，前言，《2000年台北國際雙年展：無法無天》，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0，頁4。
- 黃才郎，館長序，《北美館2002》，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4。
- 黃寶萍記錄/整理，台灣當代藝術的國際空間（座談會記錄），《藝術家》，1998，279期，頁350-357。
- 楊雪冬，《全球化》台北：揚智，2003。
- 葉啟政，《社會學與本土化》，台北：巨流，2001。
- 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當代》，1990，52期，頁40-60。
- 趙剛，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 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44期，頁49-146。
-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
- 蔡源林，譯者序：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0，頁16-25。

- 劉千美著,《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台北：立緒,2001。
- 鄭乃銘,誰讓「2000台北雙年展」真正的「無法無天」?,《CANS藝術新聞》,2000,37期,頁78-79。
- 鄭慧華,我們如何面對現實?,《典藏今藝術》,2004,146期,頁67。
- 漢姆 斐利德,一九九四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評審感言,《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1994》,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4。
- 劉寶貴,館長序,《1996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4。
- 瞿海源、王振寰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2002。
- 謝東山,《殖民與獨立之間：世紀末的台灣美術》,台北：北美館,1996。
- 簡子傑,歷屆台灣策展人談台北雙年展機制,《典藏今藝術》,2004,147期,頁84-87。
- 龍應台,局長序,《2002台北雙年展「世界劇場」》,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2,頁4。
- 羅秀芝,《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文化殖民》,台北：文建會,2003。
- 大前研一 李宛蓉譯,《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台北：立緒,1996。
- Anderson, Benedict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2000。
- Bauman, Zygmunt 張君玖譯,《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台北：群學,2001。
- Beck, Ulrich 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Was ist globalisierung),台北：台灣商務,1999。
- Bendix, Reinhard 劉北城等譯,《韋伯：思想與學說》(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台北：桂冠,1998。
- Blaut, J. M. 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
- Blau, M. Peter 孫非等譯,《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台北：桂冠,1998。
- Bocock, Robert 張君玖等譯,《消費》(Consumption),台北：巨流,1995。

- Bourdieu, Pierre 蔡筱穎譯,《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élévision), 台北: 麥田, 2000。
- Brooker, Peter 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辭彙》(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台北: 巨流, 2003。
- Burger, Peter 蔡佩君等譯,《前衛藝術理論》(Theorie der Avantgarde), 台北: 時報, 1998。
- Chalumeau, Jean-Luc 陳英德等譯,《西方當代藝術史批評》(Histoire Critique de l'art Contemporain), 台北: 藝術家, 2002。
- Davis, John 敖軍譯,《交換》(Exchange), 台北: 桂冠, 1998。
- Durkheim, Émile 許德衍譯,《社會學方法論》(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台北: 商務, 2000。
- Ellwood, Wayne 王柏鴻譯,《全球化反思: 粉碎假面經濟榮景》(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lobalization), 台北: 書林, 2002。
- Featherstone, Mike 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Consumer Cultural and Postmodernism), 南京: 譯林, 2000。
- Friedman, L. Thomas 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Olive Tree), 台北: 聯經, 2002。
- Foucault, Michel 劉北城等譯,《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台北: 桂冠, 2003。
- Foucault, Michel 劉北城等譯,《瘋顛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台北: 桂冠, 1992。
- Fukuyama, Francis(福山) 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台北: 時報, 1993。
- Giddens, Anthony 鄭武國譯,《第三條路: 社會民主的更新》(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台北: 聯經, 1999。
- Giddens, Anthony 許家豪譯,《第三條路及其批評》(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台北: 聯經, 2002。
- Giddens, Anthony 陳其邁譯,《失控的世界: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台北: 時報文化, 2001。

- Giddens, Anthony 李惠斌、楊雪冬譯,《超級左派右派：激進政治的未來》(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台北：聯經，2000。
- Hardt, Michael & Antonio Negri 韋本、李尚遠譯,《帝國》(Empire), 台北：商周，2002。
- Hirst, Paul & Grahame Thompson 朱道凱譯,《全球化迷思》(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台北：群學，2002。
- Horrocks, Christopher 楊久穎譯,《麥克魯漢與虛擬世界》(Marshall McLuhan and Virtuality), 台北：貓頭鷹，2002。
- Huntington, P. Samuel & Peter L. Berger 王柏鴻譯,《杭亭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台北：時報文化，2002。
- Huntington, P. Samuel 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台北：聯經，2001。
- Huntington, P. Samuel & L. E. Harrison 李振昌、林慈淑譯,《為什麼文化很重要》(Cultural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台北：聯經，2003。
- Jenks, Chris 俞智敏等譯,《文化》(Culture), 台北：巨流，1998。
- Joll, James 石智青譯,《葛蘭西》(Gramsci), 台北：桂冠，1994。
- Kennedy, Valerie 丘彥彬譯,《認識薩伊德》(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台北：麥田，2003。
- Klein, Naomi 徐詩思譯,《NO LOGO》(No Logo), 台北：時報，2003。
- Klein, Naomi 林淑媛譯,《破窗》(Fences and Windows), 台北：時報，2004。
- Kaldor, Mary 陳世欽譯,《新戰爭：全球性的組織化暴力》(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台北：聯經，2002。
- Marcuse, Herbert 劉繼譯,《單向度的人 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台北：桂冠，1990。
- Merquior, J. G. 陳瑞麟譯,《傅柯》(Foucault), 台北：桂冠，1998。
- Miller, Toby 馮建三譯,《全球好萊塢》(Global Hollywood), 台北：巨流，2003。
- Mills, C. Wright 王逸舟譯,《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台北：桂冠，2002。

- Nash, Kate 林庭瑤譯,《全球化 政治與權力:政治社會學的分析》(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Power), 台北: 韋伯, 2004。
- Palmer, E. Richard 嚴平譯,《詮釋學》(Hermeneutics), 台北: 桂冠, 1992。
- Ritzer, George 林祐聖、葉欣怡譯,《社會的麥當勞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台北: 弘智, 2001。
- Ritzer, George 馬康莊、陳信木合譯,《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 台北: 巨流, 1995。
- Said, W. Edward 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台北: 立緒, 1999。
- Said, W. Edward 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台北: 立緒, 2000。
- Schech and Haggis 沈台訓譯,《文化與發展: 批判性導論》(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台北: 巨流, 2003。
- Seabrook, Jeremy 譚天譯,《階級》(Class, Caste and Hierarchies), 台北: 書林, 2002。
- Sim, Stuart 蔡偉鼎譯,《德希達與歷史終結》(Derrid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台北: 貓頭鷹, 2002。
- Soros, George 張逸安譯,《索羅斯論全球化》(Soros on Globalization), 台北: 聯經, 2002。
- Stiglitz, E. Joseph 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台北: 大塊文化, 2002。
- Story, John 張君玖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台北: 巨流, 2001。
- Tomlinson, John 鄭榮元等譯,《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台北: 韋伯文化, 2003。
- Wallerstein, Immanuel 郭方等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三卷)》(The Modern World- System 、 、), 台北: 桂冠, 2000。
- Wallerstein, Immanuel 彭淮棟譯,《自由主義之後》(After Liberalism), 台北: 聯經, 2001。
- Warnier, Jean-Pierre 吳錫德譯,《文化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 台北: 麥田, 2003。
- Waters, Malcolm 徐偉傑譯,《全球化》(Globalization), 台北: 弘智, 2000。
- Wuthnow, Robert & James D. Hunter & Albert Bergesen & Edith Kurzweil 王宜燕等譯,《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 The Work of Peter L. Berger, Mary Douglas, Michel Foucault and Jürgen Habermas), 台北: 遠流, 2002。